

アジア日本研究

第1号

【論文】

白桦派与自然主义文学—以志贺直哉及私小说为中心	謝崇寧	1
香港の上級の日本語生涯学習者の動機づけ —学習者の日本語ヒストリーから動機づけを探る—	瀬尾匡輝	11
「忠」の意味の再考： 忠臣蔵 1／47 とレッドクリフとの比較研究において	邱淑婷	26
童話に見る犀星の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力	劉金拳	42

【研究ノート】

マカオ人日本語学習者の日本語作文過程における 広東語・英語使用の事例研究	石毛順子	55
視覚教材からジェンダーを考える	畑澤桂子 青山玲二郎	64

【実践報告】

中国総合大学における第二外国語としての 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	韓 冰 江 春華	73
香港におけるピア・ラーニングの実践 —大学及び生涯学習機関での取り組み—	水戸淳子 瀬尾匡輝	83

【書評】

小川誉子美著 『欧州における戦前の日本語講座 ——実態と背景——』	徳永光展	93
何志明著 『從日語看日本文化』	高橋李玉香	97
論文執筆基準		98
編集後記		102

白樺派与自然主義文学

——以志賀直哉及私小説为中心

The Shirakaba School and Japanese Naturalism:

Focusing on Shiga Naoya and the I-novel

謝崇寧 (Xie Chongning)

中山大学外国語学院副教授

Sun Yat-Se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要旨】

白樺派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に、自然主義の文学原理に反発する姿勢で文壇に登場してきた。ところが、その後の文学展開を考えると、両者の間には両義的な問題が介在するという現象も注目すべきだと思う。というのは、私小説の本質には両者の異同への考察を抜きにしては語れないからである。私小説論の中には、私小説を「破滅型」と「調和型」に分けて考えるという見方もあるが、そのような区分によって、私小説全体を考察しようとする、その本質的な問題を説明しきれないところもある。

私小説が自然主義文学と白樺派文学から生まれてきたものだとすれば、それは一種の形式的統合にすぎないのである。実のところ、両者がそれぞれ求めようとした文学表現は次元を異にするものである。白樺派文学と自然主義文学とが独自の文学原理で展開されるプロセスに、「自分を語ろうとする」という形で重なってきたのである。だが、その作品に内包された諸問題を取り上げてみる場合に、「自我意識」の確立を志向する白樺派のいわゆる「自己小説」は、もともと自然主義系の私小説とは異質なものであると言ってよい。

西洋思想の受容による「自己肯定」や「自己解放」の問題をめぐって、志賀直哉は白樺派の一員として、「近代的自我意識の確立」を文学のテーマとして展開すると同時に、方法として自然主義の唱えた「客観描写」にも強く反発していた。が、私小説形成の初期では、自然主義にしても白樺派にしても、その文学展開に「自己表白」の意識が見られる。ここで「思想と方法」という問題提起は、白樺派と自然主義との接点における志賀文学の特異性を浮き彫りにしている。

私小説から心境小説への展開に、白樺派と自然主義文学との諸問題を解明する視点が見出されると考えられ、西洋文学受容への観点から、志賀直哉文学と田山花袋文学との比較を中心に、私小説の形成・展開における白樺派と自然主義の異同を解説してゆく。

白樺派与自然主义文学 ——以志贺直哉及私小说为中心

二十世纪初叶，受西欧近代文学的影响，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理论构建方面，自然主义文学倡导的正视现实、客观描写，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其文学理念缺乏真正意义的社会性和彻底的批判精神，结果是逐渐走向衰落。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近代文坛相继出现了余裕派、唯美主义派、白樺派、新现实主义，这些文学流派具有一个共同点：摒弃自然主义那种狭隘的视野及呆板的描写方法，重建与近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学理念，探索新的创作方法。其中，白樺派又与当时新登场的文学流派有所不同，其文学主张不是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简单否定，他们所追求的人道主义、新理想主义文学，可以说是对自然主义文学的一种超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长谷川天溪曾说过：“自然派的特点，就在于真实地观察人生。……要而言之，自然派不满足于以前的文艺所表现出的那种对人生的解释，它要如实地描写自己新近看到的人生；说这就是发展自我和表现个性，那也未尝不可。不过它是想丢掉一切传统，如实地表现自己的感觉——这就是大致的方向。”¹由此可见，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下，追求个性，表现自我意识成为了自然主义和白樺派的一个文学主题。在这一前提下，关注现实生活，描写自我的真实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其创作过程。尤其是，在私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志贺直哉的文学创作与自然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因此，解读这一问题对于探讨日本近代文学的思想与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作为文学方法的“自我表白”

一般认为，日本私小说的形成与发展，自然主义文学和白樺派文学在其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两个文学流派在人生观和文学观上却又一直都有着各自的独特理论和表现形式。正如文学评论家濑沼茂树所指出的那样，在《白樺》创刊的当初，这个团体的作家群虽然表现为“‘十人十样’（柳宗悦『発刊に際して』）”，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出生于上流阶层，对人生抱有疑问，具有对社会不公感到愤恨的正义感，要打破旧的价值观和秩序，立志要从自己的生活中创造出新的价值体系，发挥自由的思想，打破厌世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那种沉闷的空气。为这一自由之思想而“打开了文坛的天窗，吹入清新爽朗的空气”（芥川龍之介『あの頃の自分の事』），他们将这种解放感传达给了同时代的人们”²。

在迈入日本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着“自我肯定”以及“自我解放”的诸重大问题，志贺直哉的文学创作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白樺派的文学思潮。与此同时，他虽然是以白樺派基本的文学观作为立足点，但通过个人的努力实践，创造了其独特的文学世界。在当时，志贺直哉和所有《白樺》的同人一样，都是以反对自然主义的文学原理为前提来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在小说创作方法的建构上，武者小路实笃就极力否定过田山花袋倡导的“平面描写”。然而，与武者小路同声气的志贺直哉，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白樺派的文学理念时，其在小说的结构和形式上，却又不自觉地与自然主义文学发

生了合流的现象。

笔者认为，就这一现象而言，它自然是日本近代私小说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背景。事实上，在武者小路等人强烈批判自然主义文学的另一面，白桦派所谓的“自我小说”，也就往往演变成了如同自然主义文学作品那样的私小说形式。对于武者小路的言论和创作，红野敏郎曾作过如下的分析：

如果不对自然主义展开攻击的话，（白桦派）最终将无所作为。因此，考虑到要凝聚更大的战斗力，就要发出批判的声音。这样，事实上白桦派也就由此而打开了走向末路的文坛的天窗。然而，我们也应该首先关注的一点是，（武者小路）到了晚年却对（田山）花袋抱有一种亲近感。出乎意料的是，这意味着与其说自然主义和“白桦”是相互对立的文学流派，还不如说它们是盾的两个面，成为事物表里的这么一种关系。³

早在此前，平野谦更明确地指出：“人们通常都认为，私小说的风潮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归结。然而，表现不俗的‘白桦’派，以其特有的大胆直率的自我表白文学，事实上已成为在媒体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个流派。……在日本，所谓的自然派与白桦派，无外乎都演变成了自我觉醒史上互为表里的两个产物。”⁴ 祖述平野氏的论述，红野氏的批评毫无疑问也是有其充分的理由。反言之，以私小说的文学体裁、形式风格来看，自然派的理论和白桦派的理念未必有必然的关系。事实上，两者都存在所谓的“自我表白”或“自我觉醒”那样的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则仅仅是创作私小说的开端和契机。在这里，可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对于所谓的“自我表白”问题，自然主义作家与“白桦”的作家在理解上却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在表现方法上两者也是异彩纷呈。因此，尽管同为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创作的作品在包含有私小说元素的同时，也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从明治到大正时期，西方文学对日本文坛的影响日渐深远，同时这种影响又随着世态变化而发生不断的变化。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主义运动应运而生。近代的作家已无法回避这一现实，关于人生的探讨和诠释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自然主义派的作家大都出身于地方的没落士族家庭，他们首先是通过“自然”的观察，用散文的形式描写生活的“真实”。然而，要将这些创作活动变成文坛的主流，最重要的还是文学思想及方法的构建。

随着西方哲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各种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兴盛起来。受之影响，田山花袋在理论构建方面执了自然主义派的先鞭，他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发表了《露骨的描写》一文，其主要观点就是从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发现了描写人生的基本方法，即“任何创作都必须是露骨的、真实的、自然的写照”。这种文学方法成为自然主义提倡的“客观描写”的雏形，它也为自然主义文学脱变为私小说文学打开了一个通道。

另一方面，自然主义主张尊重现实，倡导“无理想、无解决”，这一文学理念如何通过“客观描写”来实现，则又是另一个问题。就此，花袋在《〈生〉中的尝试》一文中提出了“平面描写论”，为“客观描写”的定义作了具体的诠释，即“不掺杂任何作者的主观意识，不介入客观事物的内部，也不涉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只是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和田谨吾在《自然主义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在文学表现方法的探讨上，一贯主张“艺术即实行”的岩野泡鸣与田山花袋争锋相对，提出了“一元描写”的方法，主张把描写的焦点集中在作品的某个人物身上，可以描写其心理世界。按照“一元描写”

的方法，当描写对象为作者本人时，其作品就会演变成后来的私小说⁵。虽然花袋没有表示赞同“一元描写”论，但其代表作《棉被》的创作方法与岩野的观点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在描写人生的“本质”和生活的“真实”时，除了“客观描写”，“自我描写”同样也是作家难以回避的问题，而这种“自我描写”必然与“自我表白”联系起来，最终走向文学表现中的主、客观之统一。

关于“私小说”的语意及内涵，魏大海先生指出：

……关系到“私小说”一语中“私”字语意的问题意识，来自日本“私小说论”的诸般影响。在日本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中，令“自我”发生确切之意义变化的无疑正是“私小说”作家——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等重要的自然主义作家或“私小说”代表作家，他们也正是日本近代或现代“自我”（“私”）意识的启蒙者。当然，“自我”或“私”意识的发展也是所有“私小说”得以存在的前提或根本。⁶

由此可见，除了描写方法外，近代的“自我”这一视点解读私小说的形成及发展的重要课题。白桦派在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将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引入文学创作，这本身也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彰显。与自然主义作家不同，《白桦》的同人们出身于上层特权阶级，面对西方文化以及社会变化的冲击，首先要思考的是精神的归宿问题。对他们来说，生存的关键在于“自我”的定位，因此其文学创作体现了“绝对自我肯定”之意识。武者小路等人心仪托尔斯泰主义，从中探寻尊重“个人”和发展自我人格的思想源泉；而志贺直哉则成为宗教家内村鉴三的门下，接受基督教的思想。他从内村的人格中感悟到“真、善、美”的内涵，孕育了自己精神世界中的正义感，这一思想过程使志贺的自我意识与文学创作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主体意识与客观世界的融合。志贺的文学描写中所体现出来的“反抗、纠葛、和解、和谐”等主题正是其文学历程的真实写照。

二、从“私小说”到“心境小说”

长期以来，关于私小说的评论，诸多学者似乎都认为，它是从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开始展开论述的。在初显私小说倾向的时期，武者小路创作的《天真的人》和《没见过世面的人》之类的作品，其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描写手法，都曾给白桦派的同人带来过极大的影响。不过，从作者与主人公贴近的视角而言，作为私小说的本质特性，志贺直哉创作的作品则比之特点更为鲜明。作为一个作家，在资质和观念意识上，志贺直哉虽然都与自然主义流派的私小说作家有很大的不同点，但他很早就对私小说作品颇感兴趣。关于近松秋江的《致前妻的信》，志贺直哉曾加以评论，其云：“以通俗的观点来看，此作品的主人公似乎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但我认为其内心世界决不是平凡的。其描写也许没有深刻的含义，却不落俗套。其笔下的人物就象浸泡在水里的厚纸一样，光是观其言行，多少会令人生厌，但作者始终如一地描写其内心世界，因此，并没有粗俗之感。”⁷由此可见，志贺直哉对当时自然主义作家的具体作品，不但没有持完全排斥的态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产生了共鸣。

也许，志贺直哉对近松秋江作品的看法是个例外。然而，从中我们却看到白桦派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之间的距离在缩小，其中志贺文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如上所述，

构成私小说的基本要素是，首先就要把作者设定为主人公，情节事件固然重要，但它必须在展开作品内容的时候，要不折不扣地完成“自叙”这一创作意图。就此意义而言，它是要强调，比起作家身边的事实，对主人公的生活体验和内心世界的描写更为重要。综观志贺直哉的文学作品，我们从中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创作精神的。

自然主义流派的私小说作家似乎不太使用所谓“心境”一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往往和志贺文学一样，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就要归结于两者都具有相似的创作态度，那就是以“自我表白”和“自我张扬”作为创作精神的出发点，而且在创作过程中密切联系自身的生活体验。

过去，关于私小说的讨论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据小笠原克的考证，“私小说”一词作为文坛术语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在大正九年（1920年）⁸。这样看来，志贺的创作活动的确是私小说风潮俱进的。关于私小说的诸多评论，应当说学界都一致认为，将“自叙”的意识转化为私小说的创作形式，作者要从身边事物的表层，最终深入到其内在的世界。也就是说，一开始，人们就将私小说的理念定位于心境小说的完成。事实上，我们试追溯志贺的文学创作轨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作品的私小说性，无外乎都是在刻意追求描写自我的内心世界。

志贺文学所具有的特征都体现在《暗夜行路》的构思上，也就是说，《暗夜行路》的创作完成，事实上是把从《某天早晨》、《天津顺吉》到《和解》这一系列作品包含的文学方法和精神意识都融入了其中。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里，志贺是将确立“自我意识”作为主旋律来加以铺陈。而且，这个所谓的“自我”之内涵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要素。在表现形式上，他也浓笔重彩地描写主人公的“心境”。这种表现手法，早在志贺的处女作《某天早晨》中已初露端倪。关于这部小说的写作，志贺本人曾有回顾：

《某天早晨》是我27岁时写成的作品，当年正月十三日是已故祖父去世三周年的忌辰，我在下午就把当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写了出来。也许可以说，它就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我一直打算要写小说，可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在脑海里构思了故事情节，但一下笔就写不成；有时想一气呵成，它就变成光有骨干的粗糙物；慢慢地写时，笔头又游走在琐碎的事件中，难以写出像样的作品。然而，《某天早晨》尽管内容平淡，却写得非常顺手，当时就觉得自己终于会写小说了。⁹

这是一篇平常的创作感言，但它却道出了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志贺的创作理念就是通过《某天早晨》的写作过程不断地浮现而出。对志贺而言，“光有骨干的粗糙物”或是“琐碎的事件”，这类东西是不能成其为小说的。换言之，志贺文学的艺术性体现在“骨”与“肉”的相互融合。志贺的小说几乎都是取材于自身体验过的现实生活，然而，要将其转化为真正的艺术品，他要反复花费怎样的心血，这都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事情。

一般认为，私小说都是取材于作者身边的事件而构成的。然而，象这样的创作对志贺而言是不可能存在的。如同在《某天早晨》中所见，他的文学造型尽管是与日常生活的事件有关，但它必须是艺术的表现。我们将这种艺术表现作具体分析的话，就会察觉它最重要的还是要披露作者的内心世界。就此而言，所谓内心的“郁闷”，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主人公心境来刻意表现的创作意识。因而，可以认为，作为处女作的《某天早晨》，就清晰地展现了志贺文学的表现手法。

另一方面，志贺留给读者的作品确实不多。这其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过，我们若从白桦派的文学观以及志贺的资质、性格切入的话，就可以察觉到这是很自然的

结果。如志贺本人就宣称过：“所谓工作，就其结果来说，它不过就是其人生活的手段；既认为是手段，干这种工作本身就是不惬意的事情。”他又强调：“我们必须首先清醒意识到，工作并非手段，而是目的。”（『青臭帖』）志賀直哉的创作态度，始终是将探究藏于自我内部深层的人生问题作为文学的主题来加以表现。这样一来，他的文学观念就得以确立，那就是紧密将艺术与人生结合，创作出直抒自我的作品。他总是将日常生活体验到的东西，作为人生问题艺术化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志贺一贯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的确，我们将志贺的生活与作品结合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他和家中女佣的恋爱事件，就不会产生《大津顺吉》那样的作品；同样，如果没有他和父亲的和解，他也写不出《和解》一书；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前期的创作历练，他要写成日本近现代的名著《暗夜行路》，也是不可想象的。

三、“私小说”的形式与思想

胜山功曾就私小说的谱系提出过这么一种看法，其云：

人们往往认为，私小说可分为破灭型和和谐型两类，前者是属于自然主义文学系统，后者则属于白桦派。我认为，这仅仅是局限于捕捉表面现象的观点，我担心这种简便的分类会对探讨私小说的本质特性产生误导的作用。而且，这种分类到底是否是就事论事也是令人怀疑的。¹⁰

笔者认为，上述批评十分尖锐地触及到了私小说评论的基本问题。不言而喻，私小说的形成并非偶然的文学现象。关于这一点，因为小林秀雄等人已作过缜密的研究，此不赘述。然而，如果在此想要探讨一下志贺文学与私小说的关系，就理应要弄清楚白桦派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的异同。

正如胜山氏批评所言，人们往往抓住私小说的叙述内容，就把它区分为破灭型与和谐型两类，这是欠妥的学术观点。要说私小说是从白桦派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派生出来的产物，它不过是一种小说形式的合流。事实上，两个流派的区别，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各自所要追求的是不同层次的文学精神。

可以认为，白桦派和自然主义逐渐走近，与其说在文学史上曾产生了私小说，还不如说是由于心境小说的出现。后者一直被称为前者的极致，可以说，这是私小说作家将“自叙”作为创作观并加以发挥的必然结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产生的诸多问题中，白桦派反对自然主义的创作原理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不仅如此，而且从那些“自我小说”的内容观察，可以发现它们和自然主义流派的私小说也都具有完全不同的要素。说起来，自然主义文学也是从作家自身或其周边摄取题材，尽管从形式看它是私小说，但还不能说这是私小说理念的形成。这是笔者对两者区别的理解。

对于私小说而言，其最为重要的内涵，就是要将直录作家身边的现实转变成文学艺术性的心境描写。在这一点上，私小说是把作者变成“我”的形式，并围绕着这个“自我的形成”去揭示人的意识的深层，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心境的表白。“它要将‘我’浓缩——融合、过滤、集中、搅拌，而且使之浑然再生，同时还需要真实无误的心境。”（久米正雄『『私小説』と『心境小説』』），因此，“心境小说”才会被称为私小说的最高阶段。可以说，白桦派和自然主义文学运行的轨迹在此点上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合。

例如，在田山花袋的作品中，许多描写都是直录现实事件，故事展开一直贯穿着所

谓的“客观描写”方法。其典型的作品就是被称为私小说的滥觞——《棉被》，这是一部基于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原理而完成的作品。花袋在《小说作法》一文中曾谈到过《棉被》的创作动机，其云：“我写的《棉被》，它既没有作者思考的东西，也不是忏悔，也并不是特意选择丑恶的事实来写，它仅仅是自己把人生发现的某些事实，将其铺展给读者观看罢了。”我们细细体会花袋的言论，再来回顾志贺关于《暗夜行路》的创作谈，也许会得出新的结论。

关于《暗夜行路》的创作，志贺曾在《续创作余谈》（1938年）中说道：“主人公谦作，可以说大体上就是作者自身，所描写的是，在那种场合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或是打算采取那样的行动，或是实际采取的行动，总之，它是描写诸如此类事物的集合体。”由此不难看出两者的异同。就《棉被》而言，其取材与作者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其写作手法则贯穿着“客观描写”，它终究是反映了自然主义文学主流形成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它又以“自叙”理念作为创作的前提。在这一点上，田山花袋客观地描写了自己的心理。与此相比，志贺的描写则表现为：“在那种场合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或是打算采取那样的行动”。由此可见，两者在文学方法的思考上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写作手法上，花袋虽然倡导的是“客观描写”，但他曾担心地说过：“作者能把自己发现到的事实写到何种程度呢？能写得多真实呢？”（『小说作法』）事实上，考察其作品，作者的主观意识仍然是不能隐藏的。尽管田山花袋特别强调自己“并不是特意选择丑恶的事实来写作”，并排除“忏悔”、“告白”那样的表现方法，但岛村抱月还是从读者的立场来批判花袋的创作，明确指出：“这部小说是赤裸裸地大胆暴露个人肉欲的忏悔录”。“它只描写丑恶之事，而不写人的心灵”；“只写丑恶的心灵，而不写事件”¹¹。

田山花袋多少有些自我发现的意识，但在其精神世界里，我们就看不到什么对生存的认识或探究。“他在作品中仅仅是给人带来人生发现的喜悦”（福田恒存语），却不能在自我内部捕捉到本质的东西。尽管花袋宣称“要叙述自由自在的心境”，实际上，他的作品一直都未曾接近过这个世界。从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过渡到私小说的形式，作为小说的手法，在此过程中已包含了“忏悔”或“告白”之类的要素，可以说，由此到私小说理念的形，成，《棉被》的创作只是停留在“告白”的阶段。然而不论怎么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棉被》的创作，其实质还是反映了私小说形成的一个侧面。总之，从自然主义文学到私小说，从私小说到心境小说的展现，它们的存在都必定有其必然性。可以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棉被》表现出来的“告白精神”，作为一种文学方法和创作意识，它与“叙述自我心境”这一理念的形，成还是有关联的。

小说家安冈章太郎在《志贺直哉我见》中指出：“在私小说的形成中，作家们是以自己的感性来理解《忏悔录》¹²的，也就是从接受所谓的‘告白精神’而开始的，这应当是不能否定的事实。”¹³我们阅读花袋的《棉被》时，就感觉到所谓的“告白”理念，它最终还是被限定在外来思想的范畴之内。在日本私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外来思想的“告白意识”，它后来也逐渐地改变了原有的性质，这一看法似乎已成为学界的定论。卢梭曾说过，“在告白方面，坦言卑琐不足道的事情，要远比陈述大罪恶更为困难，将谁也不察觉的卑微小事直书，这必须要比坦白大罪恶鼓起不知多少倍的勇气！”（《忏悔录》）那么，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们是如何理解其言之意的呢？首先，《棉被》的构思就与这种“告白精神”不无关系。花袋的创作态度大概就是源自卢梭的思想，是将其转化成了一种文学手法。同时，它给描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赋予了深意，并完全有可能使之升华为具

有艺术性的心境小说。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如何解读“私小说”的形式与思想时，必须将作者的文学思想作彻底的剖析。志贺文学与花袋文学都显示出从私小说走向心境小说的倾向。然而，纵观自然主义流派的私小说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们大都停留在自身日常琐事的描写上，其展现出来的不过是走向“破灭”人生的个人世界。与其相比，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田山花袋的文学创作有其独到之处，他从“日常”的描写深入到“内心”的披露，确实给自然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创作元素，但它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是极其有限的。而志贺的“心境”描写具有一定的寓意性和思想性，那就是他将自己的创作放在“近代与自我”这个文学思想框架来展开的。因此，志贺的心境小说使“自叙”这一方法获得了广阔的文学空间。

筑波常治曾指出，“白桦派的哲学，其核心就是主张‘伸张自我意识’。”¹⁴构成自我意识的元素，包括人类社会的种种欲望。白桦派虽然倡导人道主义，同情弱者，但当他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还是选择保全自己的人生哲学，这不免带有利己主义的色彩。透过《天津顺吉》等作品的描写，可以看到志贺有意识地将“自我本位”作为文学表现的内容，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正如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志贺最终离开内村鉴三，没有融入基督教的世界，这与他的感性及其思想矛盾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并最终与“自然”的意志融为一体，这正是志贺从传统文化的熏陶，走向接受近代思想的人生历程。他不受传统思想及宗教信仰的束缚，以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将西方思想的本土化变成一种精神实践。志贺文学的近代性体现在这一文学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它与自然主义作家那种逃避现实，执着于“自我告白”的文学创作之区别也在于此。

余论

不言而喻，尽管同是白桦派的作家，但他们因个人的资质不同，在文学创作上也都会有各自的不同表现。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上流阶级的子弟，他们都接受过西洋式的教育，那么，白桦派作家掌握的基本思考方法在形式上也都是相似的。要说他们有何共通点，那就是根据自己吸取的西方思想及精神意识，并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矛盾为背景，都要力图去探索以自我存在问题为中心的文学表现。具体地说，他们一贯追求的文学主题，总是以确立“近代的自我意识”来作为表现文学思考的问题。志贺也不例外，他的作品也总是表现为要力图思考自我存在的方式，这几乎是其作品不变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和作家在探究志贺文学与外来思想的关系时，又往往认为，“志贺谁的影响也不接受，他只是从自我出发去培育文学的人。”（安冈章太郎语）这样，在这一观点上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志贺的创作中，思想意识与文学方法未必始终保持一致。首先，对志贺本人而言，其作为日本知识分子而拥有的所谓近代思想，它只能是来源于西方的社会观念及其宗教意识。那么，将这些思想元素引入文学创作之后，其安住于日本固有精神风土的人生观及文学观也会显现出来。由此可见，志贺在接受西方思想方面，却又与自然主义作家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武者小路曾从白桦派的立场说过，“我如果不是日本人的话，……我们的阶级要不是象现在那样一直对社会感到恐惧的话，我就不会强调“为自己”到今天这种程度。”¹⁵

显然，他是要深刻思考生活在近代社会的自身阶级的问题。通过文学创作去认识自我，不仅是武者小路，它对志贺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描写内心世界的“郁闷”等问题，它一开始就以确立“近代的自我”而被表现出来。笔者认为，这也是同夏目漱石在《从此以后》中所描写的代助的精神状态是相似的。然而，志贺并没有打算要将它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问题来加以展开，而是始终贯穿着“为自己”的意识，把探究生存的问题封闭在自我狭窄的世界里。

如上所述，白桦派与自然主义流派的关联性，可以说集中体现在西欧文学思想及方法的接受以及使之本土化这一层面上，他们都从各自的文学立场出发，最后在“自叙”的归宿上合流，由此也完成了私小说世界的构建。然而，若从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考察，“作为形式的私小说”和“作为思想的私小说”这一问题也确实存在的。一般说来，所谓私小说的主题，就是“希冀对生存危机意识的拯救”（平野謙『私小説の二律背反』）。相对于自然主义作家主张的“无理想、无解决”，志贺实际上是在向追求自我拯救的方向迈进。因此，围绕私小说的形成过程，从“自叙”的视角去考察志贺文学的本质，这无论如何都是很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

- 1 长谷川天溪“自然派是认真的”。转引自[日]西乡信纲(1978)《日本文学史》，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82 页
- 2 瀬沼茂樹(1979)「白樺派の人たち」、伊藤整ほか編集『日本現代文学史』(二)、講談社、22-23 頁
- 3 紅野敏郎(1966)「私小説における白樺派の役割」、『国文学』昭和 41 年 3 月号
- 4 平野謙(1935)「私小説」、藤村作編『日本文学大辞典』別巻、新潮社
- 5 和田謹吾(1972)「自然主義の文学」、紅野敏郎ほか編『明治の文学』、有斐閣、185-186 頁
- 6 魏大海(2010)《私小说——以差异性“私”字概念为中心》，谭晶华主编《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455 页
- 7 志賀直哉(1910)「創作月評」、『白樺』明治 43 年 8 月号
- 8 小笠原克(1969)「私小説・心境小説論の根太」、長谷川泉編『講座日本文学の争点』近代編、明治書院、233 頁
- 9 志賀直哉(1928)「創作余談」、『志賀直哉集』(1954)、筑摩書房、401 頁
- 10 勝山功(1966)「大正期における私小説の系譜」、『国文学』昭和 41 年 3 月号
- 11 島村抱月(1907)「蒲団を評す」、『早稲田文学』明治 40 年 10 月号
- 12 指卢梭的《忏悔录》。
- 13 安岡章太郎(1976)「私小説の成立」、『小説家の小説論・志賀直哉私論』、読売新聞社、298 頁
- 14 筑波常治(1957)「白樺派のオ坊チャン性」、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1974)『白樺派文学』、有精堂、248 頁
- 15 武者小路実篤(1912)『自己の為』及び其他について、『白樺』明治 45 年 2 月号

【参考文献目录】

- 片岡良一(1979)『日本自然主義文学研究』、中央公論社
勝山功(1980)『大正・私小説研究』、明治書院
紅野敏郎編(1981)『鑑賞日本現代文学⑦ 志賀直哉』、角川書店
小林秀雄(2001)『私小説論』、『小林秀雄全集』第3巻、新潮社
高橋英夫(1982)『志賀直哉 近代と神話』、文藝春秋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1970)『志賀直哉』、有精堂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1975)『自然主義文学』、有精堂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1974)『白樺派文学』、有精堂
平野謙(1977)『志賀直哉とその時代』、中央公論社
町田栄編(2001)『志賀直哉『暗夜行路』作品論集』、クレス出版
山崎正和(1986)『不機嫌の時代』(講談社学術文庫)、講談社
山本健吉(1979)『私小説作家論』、審美社

香港の上級の日本語生涯学習者の動機づけ ー学習者の日本語ヒストリーから動機づけを探るー

Motivation of Advanced Japanese Life-Long Learners in Hong Kong: An Investigation of Motivation through the Background History of Learners' Language Learning

瀬尾匡輝 (SEO, Masaki)

香港大学專業進修学院 学院助理講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PACE, College Assistant Lecturer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ree advanced Japanese life-long learners' motivation through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ie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Japan Foundation (2008), about 70 percent of learners in Hong Kong are life-long learners. However, most studies on Japanes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focus on college/university learners (e.g. Sakai, 2000; Yorozu & Murakami, 2009).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life-long learners in Hong Kong, considering the prevalence of this particular group of learners. Especially, as these learners have no regular examinations or classrooms to compel their continued language learning,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what motivates them to study Japanese and sustains their efforts.

While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learners' motivation (e.g. Kurahachi, 1992; Ayabe, Karino, & Ito, 1995; Li, 2003) these have been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that failed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al changes of an individual's learning over time. Given the view of motivation advanced by Dörnyei (2003) and Deci and Ryan (2002) as a process that learners *go through*, it i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individual histories of target language learners.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using life history (Tani, 1996) and narrative inquiry (Pavlenko, 2007) to investigate learners' individual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ies. By analyzing each learner's individual history, the research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that motivate life-long learners through their continuing studies.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research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not learning Japanese for the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and/or occupational purposes, but they were learning for fun. Thus, their intrinsic motivation was higher than extrinsic motivation. Most importantly, those learners found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Japanese by connecting with other people, such as their peers, Japanese employers, Japanese friends, and friends in Hong Kong who do not speak Japanese.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offering opportunities for learners to network in the community through a foreign language.

1. はじめに

国際交流基金(2008)の調査によると、香港の日本語学習者数は 32,959 人と世界で7番目に多く、その約7割が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機関以外で学ぶ生涯学習者であるという。これらの生涯学習者の多くは、社会人学習者で、会社帰りに趣味の一つとして、旅行目的や日本の大衆文化への興味から学習している(山口, 2003)。しかしながら、香港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研究は主に高等教育機関、特に大学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を対象としており(例えば 坂井, 2000; 萬・村上, 2009)、社会人教育機関¹や生涯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た研究は筆者の知る所では極めて少ない。だが、香港の生涯学習者の割合から鑑みると、社会人教育機関で学ぶ日本語学習者や生涯学習者に焦点を当てた研究は不可欠であろう。特に、生涯学習者は、学校教育のように試験や教室といった強制力が少なく、学びたいと思った本人が誰からも強制されることなく学習する(Knowles, 1968)。そのような学習者がどうして日本語を学習し始め、日本語を何年も勉強し続けるのかといった動機づけを探ることは、香港の生涯学習者について知る上で重要ではないだろうか。本研究は、香港の上級の日本語生涯学習者の動機づけを探り、日本語学習が生涯学習者にとってど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るのかを探る。

2. 先行研究

2. 1. 動機づけ

第2言語を身につけようとする動機づけ(Motivation)に関する研究はこれまで様々な角度から行われてきた。第2言語習得の分野においては、1950年代以降 Gardner & Lambert(1959)らによる社会心理学的な立場による動機づけの研究が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きた。Gardner & Lambert(1972)は動機を統合的動機づけと道具的動機づけに分けている。統合的動機づけとは、目標言語を話す人々の集団に社会的・文化的に帰属し、その中で自己を確立したいと願い、目標言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である。一方、道具的動機づけとは、試験や報酬のために目標言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を指す。一般的には統合的動機づけのほうが長期的に学習意欲が持続することが多く、道具的動機づけは短期的には有効だと報告されている(Gardner & MacIntyre, 1991)。しかし、学習者の文化的背景、学習環境、言語能力によって結果が異なることも多い(Brown, 2000)。また、これらの研究は第2言語学習によって得られる文化的、社会的意義の認識が国によって異なる²ため、客観性を欠くのではないかと(Au, 1988)と指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して、1990年代に入ると、動機づけには Gardner & Lambert のような社会的、文化的側面だけではなく、より多様な側面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が指摘され始めた(Crookes & Schmidt, 1991; Dörnyei, 2001)。

教育心理学的な立場をとる Deci & Ryan (2002)は自己決定理論を提唱し、内発的動機づけ、外発的動機づけの観点から動機づけの研究を行っている。内発的動機づけとは目標言語に対する興味、関心といった自分自身の内面から来る動機であり、外発的動機づけとは強制や報酬といった自分の外面から現れる動機である。これまで動機づけというものはそれぞれ独立したものとして取り扱われてきたが、自己決定理論では連続したプロセスとして説明され、内発的動機づけと外発的動機づけが連続体の両端に位置するものだと捉えられている。

表 1 自己決定理論における動機づけのプロセス

無動機	外発的			内発的
非調整	外的調整	取り入れ的調整	同一視的調整	内発的調整
低	←自己決定の度合い→			高

無動機の状態では外発的にも内発的にも動機づけられていない。「日本語が嫌いで勉強したくない」と考えている学習者がこれに該当し、行為者は何も自己決定をしていない。次に、外発的動機づけは3段階に分かれている。外的調整段階では「日本語が大学の必修科目だから勉強する」など動機が個人の外側から来る状態で、自己決定の度合いも他の段階と比べて低い。取り入れ的調整段階になると「日本語ができないと恥ずかしい」など外的な要因に対し自己価値を見出してはいるが、自尊心や罪悪感から動機づけられている状態である。外発的動機づけの中で最も内発的動機づけに近い同一視的調整段階は「将来日本の会社で働きたい」など遂行する行動を個人的に重要な物として捉え、価値を認めた上で行動を起こす。そして内発的動機づけでは「日本語が好きだから勉強する」や「勉強するのが楽しい」など行動そのものへの興味、楽しさを感じ行動するのである。

Dörnyei (2001)も動機づけをプロセスとして捉え、Deciらの自己決定理論を核に据え、論じている。Dörnyei & Skehan (2003)では、動機を3つの段階(1. 人はなぜ何かをすることを決めるのか, 2. 決めたことをどのくらい維持できるのか, 3. どのくらい強くそれを求めているのか)に分けている。しかし、Dörnyei & Skehanによると、これまでの動機づけに関する理論は第1段階の「人はなぜ何かをすることを決め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ばかり焦点が当てられ、第2段階、第3段階に関する理論は少なく、また研究も進められていないのが現状であるという。

2. 2. 日本語学習における動機づけ研究

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機づけ研究はこれまで質問紙調査によるものが大多数を占めている(Dörnyei, 2001)。日本語教育でも同様のことが窺える。質問紙調査を用いて動機づけを調査した倉八(1992)は、アジア系の学習者は道具的動機づけが強いと指摘している。綾部・狩野・伊藤(1995)は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大学生に質問紙調査を行い、外発的動機づけが内発的動機づけへ移行することで、外国語学習と自己の生活との関わりを実感し、認識しやすくなると報告している。また、李(2003)では、第2言語環境(日本, 以下 JSL 環境)と外国語環境(韓国, 以下 JFL 環境)にいる韓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に動機づけの比較をしているが、JFL 環境の学習者が JSL の学習者より動機づけが高く、特に道具的動機づけが高かった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る。その結果を受け、李は日本語や日本文化との接触機会を増やししながら、統合的動機づけを高め、最終的に内発的動機づけを高めることが望ましいと述べている。また、動機づけを維持するため、日本語能力が伸びているという達成感を味わえるような方針が必要ではないかと述べている。

このように、これまでの動機づけの研究は質問紙調査による量的研究が大部分を占めている。しかし、動機というものが連続したプロセスで、学習者個人の中で変遷していく物であるのだとすれば、学習者の微妙な内面の変化を調査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本研究では香港の日本語学習者の動機づけの変遷を質的研究の手法を用いて分析し、学習者の内面を探ることにした。

3. 調査と結果

3. 1. 調査

本研究では、学習者の動機づけの変遷を調査するため、ライフ・ヒストリー法を用いた。谷(1996)はライフ・ヒストリー法を「個人の一生の記録、あるいは、個人の生活の過去から現在にいたる記録のこと」(p. 5)と定義し、その方法を「一つの事例から策出された仮説を他の事例と突き合わせ、強化、修正、棄却、あらたな発見などを繰り返しながら、より信憑性の高い仮説に仕上げていく」(p. 23)としている。本研究では、調査協力者が自らの日本語ヒストリーを語る方法として Pavlenko(2007)のナラティブ手法を取り入れながら、ライフ・ヒストリーを生成していった。

調査協力者は、香港の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機関以外で日本語を学ぶ生涯学習者のアニー、クリスティー、サラの3名である。この3名を調査協力者として選んだ理由は、彼らの日本語学習歴が長期にわたり、上級日本語話者に達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これまでの日本語学習経験を過去から現在にいたるヒストリーとして語ることができる考えたためである。また、筆者の元学習者であり、すでにラポールが形成されていたため、質的調査に必要な内容の濃いデータが集められることが期待できた。以下に協力者達の簡単なプロフィールを記す。

表2 協力者のプロフィール

協力者	性別	年齢	職業	日本語学習歴
アニー	女	20代後半	日系企業勤務	10年
クリスティー	女	30代前半	英語学校勤務	15年
サラ	女	30代前半	香港企業勤務	7年

ライフ・ヒストリーを生成するために、半構造化インタビューを行った。インタビューでは、日本語を学習し始めたきっかけに始まり、これまでの日本語学習の経験や考え、これからの目標などを聞いた。インタビューは1人1時間半から2時間程度実施し、日本語で行った。インタビューデータの引用箇所は斜体で表記してある。なお、本研究ではプライバシー保護のため、全ての人名、教育機関名を仮名とする。

3. 2. 結果

3. 2. 1. アニーさんの日本語ヒストリー

アニーさんは中学5年生(日本の高校2年生)の時から日本語を勉強し始めて、10年間勉強している。日本へ旅行したことはあるが、日本で勉強したことはなく、ずっと香港で日本語を学んでいる。「最初は *Kinki Kids* のアイドルが好きで」日本語を勉強し始めて、「直接彼らの言葉をわかりたいから、翻訳とかじゃなくて、自分で感じたいと思って、勉強が始まった」。

最初の5年間は香港人の先生が開いている1クラス5人くらいの小さな日本語教室で勉強した。先生は「試験の成績より実際にどのくらい話せるか」ということを重視し、「教科書は使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方針だった。

全部先生が言って、自分で書きなさいと言われました。文法とか先生がホワイトボードに書いて自分が書いた。先生は今書いてる物を今集中して聞かないと、後で先生が書いた文型が使えなくて、つらいからと言いました。いっぱい書いて、すぐ使うんですね。

日本語の学習は大変だったが、日本語を勉強し始めて1, 2年経った頃に日本語でオンラインチャットをし、日本人の友達ができて楽しくなった。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1年か2年くらいの頃は、日本のチャットをやってたんですね。そこに日本人がいて、日本人の友達ができて、そこから毎日チャット行く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ね。毎日3, 4時間くらいチャットして。大学生ですから、今よりも時間がありました。

その後、実際にその日本人の友達に会った。

最初友達に会ったときは1年、もうちょっとかなあ、日本語を2年勉強して、日本人の友達と会ったんですが、最初全然日本語が話せなくて、書いて会話を交わしてたんですね。チャットで結構日本語を使ってたんですけど、最初はチャットのように書いて、簡単な「食べます」とか書いて。話せないんです、その時は。まだ日本語が上手じゃなくて。

読み書きで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はいたが、話しながらやりと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ず、「もっと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強くなった」。

大学時代は保育士になるための勉強をしていたが、日本語の勉強が好きで、保育士にならず香港の日系企業で働くことにした。

保育士の仕事は、毎日忙しくて、休みもなくて、いろいろな準備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すごく大変です。私はすごく日本語が好きだから、もし保育士になれば、勉強する時間もなくなっちゃうし、だから悔しいと思って。

「日本に憧れて、入った」会社だが、その憧れは変わっていった。

私日本に憧れて、入っ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く日本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って言ったら、向こう(会社の人)が「将来きっと日本を嫌いになるんですよ」って言われたんですね。で、その時はそんなことない、そんなことないんですよって思ったんですけど、今比べたら、やっぱり前よりそんなに憧れがなくなっていました。

アニーさんは日本に対して「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すごくいいイメージ」があり、「人や物とか、いろんな、人がすごく丁寧で優しい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が、そのイメージは日系企業に勤めて変わった。

今はやっぱり上司とか見ると、やっぱり同じ人間ですね。香港と変わらないなという風に。前みたいにそんなに夢みたいなもの、届かない物じゃなくなりましたね。

現在転職し、3つ目の日系企業で勤めているが、日本語を使う機会が少なく、会話の練習ができないと考えている。

香港で勉強していると、あまり会話ができませんね。あんまり練習する機会がなくて、会社で日本語を使っているけど、あ、う、メールとかで、あんまり使わないですね。しゃべるのが、話すのが。

アニーさんの今の仕事は、「(日本人の)お客様と接する機会がある仕事ではなく」、工場や上司などに「メールを送る」ことが多い。「(日本人のスタッフとは)だいたい意味がわかってくれればもうオッケーなので」、日本語の練習ができるという実感はない。しかし、時々上司が日本語を修正してくれるとうれしい。

上司は私、日本語しゃべったら、メモを取って、赤ペンで修正してもらったり、「これは『を』じゃなくて、『は』を使った方がいいんですよ。」とか教えてくれたりしましたね。

「言ってくれ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から、「使うだけじゃなくて、正しいかどうか教えてもらいたい」。

しかし、「会社は日本語を勉強する場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で、今は社会人教育機関で週1回3時間、さらに日本人のプライベートチューターと週1回1時間、日本語を学習している。社会人教育機関では「15人くらい学生がいて、人数が多い」と感じるから、「会話の練習をするためにプライベートチューターの先生に教えてもらっている」。しかし、「プライベートの先生だと正しい日本語とかフォーマルな日本語が勉強できませんね。香港日本語学校(という社会人教育機関)みたいな正式な物が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て、これからも」続け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アニーさんにとって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ことは、「生活の一部」になっている。「勉強しないと(日本語を)忘れてしまう」という不安もあるが、「日本語を続けていて楽しい」から勉強している。日本への憧れが小さくなった今も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のは、日本語を学習し、いろいろな人と繋がるのが楽しいからだ。

友達がたくさんできました。私の(社会人教育機関でできた)友達はほとんど、40オーバーです。(アニーさんは20代後半)、あ、う、私が日本語を勉強しなければ友達になるチャンスがなか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ね。

そして、日本語や日本について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ない友達に説明することが楽しい。

英語とかみんな香港で勉強しているから、どこに行っても英語だから、逆に日本に旅行行く友達がいて、ね、あ、う、場所とか聞かれると、答えられる。(友達のために情報を)調べるのがうれしい。

しかし、日本語能力試験やテストのための勉強はしたくない。

日本語がたくさん勉強できたら、資格とかどうでもいい。だから(日本語能力試験)1級どうしても受けたくないですね。

現在アニーさんは日本語能力試験の2級に合格しているが、1級はまだ受験したことがない。アニーさんと一緒に日本語を勉強する友達からは「そろそろ(1級の)試験を受け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と言われるが、「試験のために勉強したくないし、(試験は)実際あんまり生活に使える物だと思っていて、受験する気はない」。試験のためではなく、一緒に日本語を学ぶ友達と過ごしたり、日本語を話せない香港人の友達に日本旅行の手助けをしたりすることが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て楽しい。

3. 2. 2. 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の日本語ヒストリー

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は子どもの頃から日本に興味があった。小さな頃から手芸が好きで、日本で出版された本を見ながら、日本語がわからなかったけれども絵や写真に従って作成していた。

日本語がわからないけど、たくさん日本語の本を買って、手作りの美術(手芸)の本を香港のデパートで買って、よく Follow して(本の通りに従って)、自分で作った。

日本や日本語に興味があったから、1995 年に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大学へ進学したときに日本語を専攻科目として勉強し始めた。「単語や文法を覚える事は大変」だったが、専攻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がんばった。

大学の資格を取る。最初は大学で勉強した。もちろん、卒業できるのは、一番大きい目標、その時。

大学を卒業するときには、「みんなもやるから、私も」日本語能力試験 2 級を受けて、合格した。2 級に合格したからといって、「日系の会社で働くとか、そういうのは全然関係なかった」。元々興味として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たにも関わらず、大学で専攻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語は大学を卒業するために必要な単位としてしか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た。卒業後は、仕事として日本語を使うのではなく、旅行や手芸といった趣味のために日本語を使いたいと思い、日本語を使った仕事に就くことに抵抗があった。

大学を卒業した後は香港の銀行で働き始めた。銀行に入ってからには日本語を勉強しなかった。「仕事が忙しい」という理由もあるが、銀行に入ってからには「銀行についてのことを勉強してた」。

銀行の仕事をしながら、この、バンキングとビジネスとカンパニーのこと勉強した。

しかし、銀行の仕事は「おもしろくない、つまらない、毎日同じ事をやる」という理由から、銀行の仕事を辞め、オーストラリアへ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に行った。その後、再び香港へ戻って来て、日系企業で働くことになった。日系企業は「残業代がいい」と友達から聞いたのと、今度は「日本語を使った仕事がしたい」と考えたからだ。大学卒業時は日本語を使った仕事には就きたくないと考えていたが、趣味として日本語を続けていく中で、日本語をもっ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中で使いたいと考えたから、日系企業で働きたいと思った。そうすれば、働きながら日本語も勉強できると考えた。でも、「上司は英語と中国語が上手」ということから、職場で日本語を話す機会は少なかった。

日系の会社へ行ったとき、日本語は E メールだけ。話すは、必要ない。会社で日本語を使うのは、E メール書くとか、読むだけ。もう少し日本語で話したかった。

2007 年に日系企業で働いているときに、もう一度、「仕事と旅行のために日本語を勉強し」始めた。日本語能力試験 2 級に合格していたので、社会人教育機関の上級コースに入学した。この学校を選んだのは「友達の紹介」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たが、家から「バスで 8 分くらい」で「場所が便利なこと」もあった。通った学校は「人数が多い」し、「会話の練習も少ない」ので、日本語の勉強に役立っているかという疑問が残った。それに、働きながら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ことは大変だった。

発表が嫌い。(準備に)時間がかかるよ。試験とクイズも嫌い。

「最初は(日本語能力試験)2級で十分だと思って」いたが、「友達はまだ1級とるから」という理由で、2008年に1級を受験し、合格した。

友達はまだ、1級取るから。能力試験を受けてよかったことはない。同じ、変化がない。

能力試験に合格した頃、体調を崩し、入院した。今までのように働けなくなった今は、香港の英語学校で「日本人の主婦、子どもを対象して英語とかピアノを教える」でいる。今までは週末や夜に開講される社会人教育機関の日本語クラスに通っていたが、週末や夜に働くことが増えたので、日本語の勉強を続けられなくなった。今は香港人のプライベートチューターから日本語と北京語を週1回2時間勉強している。日本語能力試験1級に合格した今も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のは日本語の今のレベルを「キープするため」だ。

日本語をキープしたい。もし勉強しないと、だんだん下手になる。

また、日本語で「まだわからないことが多いから」、勉強を続ける。

会話が難しい。会話の中で、日本の曖昧な文化がある。難しい。今、生徒さ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ときも時々失礼した言葉も言っちゃった。

そんな時、生徒からの質問や生徒にどう伝えればいいのか、プライベートチューターに聞く。

例えば、説明したいこととか。レッスンの時にちゃんと説明してないことを、また(プライベートの)先生に聞いて、生徒さんにもう1回説明する、ちゃんと。

また、「生徒さんから香港の文化を聞かれる」こともあり、それを「説明するための日本語」をプライベートチューターに聞くこともある。

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は今の仕事は前の会社に比べ「残業もないし、時間が自由に使える。休みを取る、簡単に取れる」から働きやすい。それに以前の日系企業に比べ、生徒と日本語を使う機会が多く、「日本語を使って仕事ができるのはうれしい」。生徒とはいろいろな所へ一緒に行ったりする。

今生徒さんはだいたい友達みたいな関係。時々、生徒さんとイベントやる。

食事したりとか、香港の名所行ったりとか。

「生徒さんは日本語の間違いを指摘してはくれない」が、「プライベートレッスンで教えてくれる」から大丈夫だ。「正確な日本語を使う事よりも、生徒さ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が楽しい」。

3. 2. 3. サラさんの日本語ヒストリー

サラさんは7年前から同じ社会人教育機関で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日本へ旅行したことはあるが、留学したことはない。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きっかけも日本の旅行からだ。

最初は興味で勉強しました。実は何年前、日本に旅行しました。あのときは、デパートで買い物しました。でも、セールスマンは英語は全然わからない。

私は日本へ旅行することは大好きだから、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い。

勉強し始めた頃は大変で、難しかった。

発音は、その時、わからなかった。カタカナも覚えていなかった。単語も覚えていなかった。今はだいたい覚えている。でも、前は難しい。それでも、日本語の勉強を続けたのは、「日本に興味」があったからだ。

ドラマが好き。木村拓哉と玉木宏が大好き。それに、アニメ、ワンピースもよく見る。

「香港人は日本語が好き」で、「日本のことも好き」で、「今香港で(日本語の勉強が)流行っていること」から、たくさんの人が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でも、「(勉強に)たくさん時間がかかる」から「みんなやめる」と思う。そんな中でも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のには「興味が必要」だ。

(興味が)ないなら、続けることは難しい。たくさんの方は1年、2年で日本語を勉強する後はストップ。興味があまりないから。

サラさんは勉強を続ける中で、日本語がわか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った。うれしかった。

(テレビで木村拓哉と玉木宏の言っていることが)半分わかりますよ。楽しいなあ。楽しい！

また、日本語のアニメもわかるようになった。

私は毎日、ワンピース、アニメを見ています。今は会話はだいたいわかるはともううれしい。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くと、仕事でも使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った。サラさんは日系企業ではなく、香港の会社で働いている。そのため、会社で日本語を話せるスタッフはサラさん以外にいない。英語だけの方が他のスタッフとのやりとりしやすいが、個別に日本語で顧客と会話することがあり、そのことはサラさんにとって幸せだ。

本当は(今の仕事は日本語を)使わないも大丈夫。その(日本人の)お客様は英語もできるよ。いつも英語でメールしています。他の同僚も私は日本語を書くなら、他の同僚はわかりませんからです。

(日本語を話すことは)楽しいです。

日本へ出張することも多く、その時にも「日本語を使って、買い物はうれしい」が、仕事ではあまり使わない。

私は仕事から、毎年日本へ行きます。毎年1回。それは(仕事でおもちゃの)展覧会へ行きます。その時、ボスはいから、いつも英語を話します。みんな英語で。もちろん日本語を使いたい。けど、ボスは日本語がわからない。でも、お客様は、2人の時は日本語で話します。

「日本語を使わなくてもいい仕事」だから、サラさんの「ボスは、私(サラさん)の勉強は本当は、好きじゃない」。

勉強の日は早く、会社を出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日本語ができないも私の仕事は大丈夫。

それでも転職しようとは思わない。「今の仕事はオッケー」だし、「給料もオッケー」だから、働き続ける。そして、仕事に必要なじゃなくても日本語の勉強を続けるのは、「日本語が楽しい」からだ。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て、日本語を勉強する仲間ができた。

ステファニーさんと(日本語を勉強する)前は知り合いじゃない。香港日本語学校から友達になりました。1年生から。いつもじゃない、でも、時々教室の外で、会ったりします。一緒に玉木宏のコンサートへ行きました、香港で。友達もいるし、「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ことは楽しいことと思う」。そして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て、クラス内だけではなく、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でも友達ができた。

そのゲームと一緒に、たくさんの人は一緒に遊ぶの時、交換の機会もある。それから、友達になります。会ったことはない。でも、毎日インターネットで話す。Facebook³で、私の日本人の友達は英語で書く、私は日本語で書く。間違い事はあるなら、教えて。

「ゲームは全部英語」だから、日本人の友達がサラさんに聞くことの方が多い。まだ一度も会ったことはないが、日本人の友達と「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は「楽しい」し、「日本語の勉強になる」。いつも「忙しい」けれども、「日本語のテレビを見る」のと「Facebookをする」のは毎日の日課だ。

今は日本語能力試験2級だが、将来は1級に合格したい。「1級はエンディングポイント」だが、それはテストの「エンディングポイント」であって、「もし1級に合格しても、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い、忘れないから」。それに「日本のことは大好きだから、アニメと漫画も大好き。日本語の勉強は楽しいこと」だから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テストのために勉強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試験で「いい成績をとるなら、とてもうれしい」し、「大変だけど、楽しい」が、「能力試験は自分がどのレベルか知りたいから受ける」ものだ

4. 分析と考察

本研究で紹介したアニーさん、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サラさんは全員日本語上級学習者であり女性であるという点では共通しているが、年齢、職業、日本語学習経歴などはそれぞれ異なる。しかしながら、本研究で紹介した3人の学習者は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になんらかの意味を見出し、学習を続けている。つまり、動機づけが保た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本節ではまず3人の個々の日本語ヒストリーを簡単に振り返り、動機づけの変遷と彼女らにとっての日本語学習の意味について考察したい。

4. 1. 動機づけの変遷

まず、本研究で紹介した3人の個々の日本語ヒストリーについて振り返る。

アニーさんは10年前の中学5年生のときに、日本のアイドルへの興味から日本語を学習し始めた。アイドルが単に好きだというだけではなく、アイドルが話すことばを直接理解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た。日本語を勉強し始めて1、2年経ったところにオンライン上で日本人の友達ができ、日本人の友達と実際に会った際にうまく口頭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ができず、さらに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増した。その後、日本語を勉強する時間を確保したいという理由から、保育士ではなく、日系企業で働くことにした。日本への憧れから日系企業に入ったが、働いていく中でその憧れは少なくなっていく。しかし、日本語を通して得られたピア(学習仲間)との関係や日本人の上司とのやりとり、日本語を話せない香港人に日本旅行の手助けをしたりすることが楽しく、今も日本語を学習している。

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は15年前から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最初に日本語を学習し始めたきっかけは、趣味で日本の手芸の本を見ており、日本語や日本に興味を持ったことだ。その後、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大学で日本語を専攻した。大学では勉強する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り、大変だったため、その当時は卒業するのが一番大きな目標となった。大学卒業後、日本語とは関係ない銀行の仕事に就いた。銀行の仕事をしている時は、仕事が忙しく、また日本語とは関係のない仕事のため日本語の勉強はしなかった。しかし、オーストラリアでの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から香港へ帰ってきて、次は日本語を使った仕事をしたいと考え、日系企業で働くことにした。しかし、仕事ではあまり日本語を使う機会は少なかった。体調を崩し、以前のように働けなくなった今は香港の英語学校で日本人を対象に英語を教えている。そこで日本人の生徒に香港の文化を紹介したり、イベントを企画したりと、日本人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に楽しみを覚えており、プライベートの先生から日本語の言い回しなどを学んでいる。

サラさんは日本旅行への興味から日本語を勉強し始めた。日本語の勉強は大変だったが、日本に対する興味があったため、日本語学習を続けることができた。日本語学習を続けていくと、日本のアニメやテレビで話されている言葉を理解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それがさらに日本語の学習を続ける喜びとなっていった。そして、日本語が仕事でも使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が、上司や他の同僚が日本語を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と、日本人の顧客が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現在働いている会社では日本語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ない。それでも日本語の学習を続けるのは、日本語を共に学習するピア(学習仲間)がいることと、Facebook で知り合った日本人の友達と日本語で交流することが楽しいからだ。

4. 2. なぜ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のか

本研究3人の協力者は、日本語を勉強し始めたきっかけも日本語を勉強する目的も異なる。また、Deci & Ryan (2002)やDörnyei (2001)が述べるように、動機づけは連続したプロセスであり、環境や時によって、日々学習者個々によって変遷していることも窺われた。動機づけは学習者によって異なるのは自明のことではある。本研究の協力者たちにもそれぞれ異なる動機の変遷があったが、3人の協力者が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にそれぞれの意味を見出し、学習している。筆者が働く日本語教育機関では、年に約3割の学習者が日本語学習をやめていく。その中には仕事が忙しくなり継続が難しくなった学習者もいると思うが、多くの場合は日本語が難しくなりついていけなくなったり、日本語学習そのものへの興味が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に感じられる。その中で、日本語学習に意味を見出すことは、日本語を学び続ける上で重要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本研究で紹介した3人の学習者には日本語の学習を続ける上で以下の共通点が見出された。

4. 2. 1. 内発的動機づけと外発的動機づけ

本研究3人の学習者は最初日本のアイドルが好き(アニー)、日本の手芸が好き(クリスティー)、日本への興味・旅行(サラ)といった内発的動機づけが強い状態で日本語を学習し始めた。山口(2003)が行った質問紙調査でも「日本文化に興味があったから」、「日本のドラマ、アニメ、漫画を理解したい」など、香港に根付いて

いる日本の大衆文化に影響を受けたと思われる動機が「今の仕事に必要」「将来日本の会社で働く」といった自分のキャリアのために必要な実利的なものを大きく上回っていたと報告しており、本調査とも一致する。

また、学習を継続するプロセスを見ても、仕事や試験といった外発的動機づけは極めて低いことがわかる。まず、仕事という観点では、アニーさんは日系企業で働き、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は以前日系企業に勤めていた。そして、サラさんは日本へ出張したり、日本人と接したりする機会のある会社に勤めている。しかし、アニーさんの会社と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の以前勤めていた会社は日系企業で日本人が多いにも関わらず、日本人の上司は英語と中国語に堪能なため、香港の人が日本語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は求められていない。また、サラさんの会社では上司が日本語ができないという理由から、日本へ出張した際にも上司が理解できるよう英語を使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っている。以上を考慮すると、香港の企業では、日本語を話せるということが必ずしも重要なスキルとなってい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国際化が進む香港ではグローバル言語である英語、経済成長が著しい中国の北京語が主に使われ、日本人社員もそれらを使用しているようだ。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は現在働いている語学学校で日本人の生徒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ために日本語を学習しているが、彼女の場合、外発的動機づけというよりも、日本人の生徒と日本語でやりとりすることに意味を感じ、内発的動機づけが強いと考えられる。事実、「生徒さ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が楽しい」と言い、生徒のために様々なイベントを企画し、日本語を使う機会を自ら積極的に作っている。

次に試験という点から考察する。3人の協力者たちは日本語能力試験のためだけには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ない。アニーさんは日本語能力試験を「生活に使えない物だ」と考え、「試験のために勉強したくない」と言う。また、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も自ら積極的に日本語能力試験を受けようと思ったことがなく、「みんな(友達)もやるから」と自分自身の意思とは関係なく受験している。一方、サラさんはこの2人と比べ、将来は1級に合格したいと日本語能力試験を積極的に受験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かし、自分が「どのレベル(にいるのか)知りたいから」受験するのであって、能力試験に合格し、「日系企業で働きたい」、「日本へ留学したい」といった外発的動機づけからではない。米本(2009)の日本語能力試験の波及効果に関する調査では、日本語能力試験が香港の生涯学習機関で学ぶ初級日本語学習者に自己評価、啓発の機会を与える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と報告しており、同様のことがサラさんにも観察され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次に、学校で行われる試験や評価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は大学時代、「日本語の単語や文法を覚えることは大変」だったというのが、卒業するのが「一番大きい目標」だと言い、外発的動機づけの外的調整段階が強かったことが観察できる。しかし、現在は自らプライベートチューターと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ようになり、テストなどの評価がなくても、日本語を学習する動機がある。生徒と日本語で話すという楽しみがあり、もっと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いと言う内発的動機づけが強く作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だろう。サラさんも「試験は嫌」だと言い、初級時代は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ことは「たくさん時間がかかる」ため、大変だったと語った。しかし、日本語に興味を持ち、学習自体を楽しんでいるため、日本語の勉強も持続でき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は初級の段階からすでに大変だったと本研究に参加した学習者たちは述べている。では、大変ながらも学習を続けたのはどうしてなのだろう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次節で述べたい。

4. 2. 2. 他者とのつながり

本研究で紹介した3人の日本語を学習し始めたきっかけや日本語を学ぶ過程の動機づけの変遷は異なる。しかし、皆日本語を学ぶことに意味を見出し、続けている。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は大変なことだと学習者たちは語る。その中でも、日本語を学び続けようと思ったのはなぜなのだろうか。

3人の語りから読み取れるのは、「他者とのつながり」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ここで言う「他者とのつながり」とは2種類ある。ひとつは日本語学習を通して出会った教室内のピア(学習仲間)である。アニーさんが「友達がたくさんできました」と言うように、日本語を学習する中で同じく日本語を学ぶ人たちとのつながりが広がったと語っている。アニーさんは現在20代後半の社会人だが、社会人教育機関で学ぶ学習者の年齢や職業は様々で、「友達はほとんど40オーバー(40歳以上)」と言うように、普段接することがなかった人ともピア(学習仲間)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た。サラさんも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なかで、ステファニーと友達になり、7年間同じ教室で一緒に学んでいる。授業以外で会うことは少ないが、時々教室の外で会ったりして、親交を深めている。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も「友達も受ける」から日本語能力試験を受験するように、日本語を学習する中でピアの影響が強いことが窺われた。年齢や職業、社会的経験も異なる学習者たちではあるが、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ということを目的に週に1回教室に来るなかで、1つの連帯感が生ま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そして、もうひとつの「他者とのつながり」は自分の実生活のコミュニティーでのつながりである。本研究の3人の学習者たちは、それぞれ自分のコミュニティーで日本語を使うことで人と繋がることに楽しみを感じている。アニーさんは日本旅行に行く香港人の友達に日本の場所について聞かれた際に、調べて教えてあげることが嬉しいと語っていた。クリスティーさんは自身が働く語学学校の生徒と日本語を使っ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が楽しいと言い、積極的に生徒のためにイベントを企画したり、プライベートチューターに生徒から質問される香港文化を説明するための日本語を尋ねたりしている。そして、サラさんはFacebookで知り合った日本人の友達に英語で書かれたゲームの内容を説明したり、ランゲージ・エクスチェンジすることに楽しみを抱いている。3人ともそれぞれ異なる形ではあるが、自分が所属するコミュニティーの中で日本語を使い、人と繋がることに楽しみを感じていると言えよう。日本語が教室以外で使われることのない外国語環境の香港では、なかなか学習者が日本語を使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する機会は少ない。しかし、日本人が集まる職場(クリスティー)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サラ)で積極的に日本語を使うことで、日本語を学び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さらに強くな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また、日本人と接することだけが日本語学習の動機づけを強めるわけではないことも示唆された。アニーさんのように日本語を話さない香港人の友達を手助けすることにより、日本語を学んでいる意義を自ら導き出すこともできるのである。

5. まとめ

本研究では、香港の生涯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の動機づけをライフ・ヒストリー法を用いて分析し、学習者の内面を調査した。その結果、本研究に参加した学習者達は内発的動機づけが強く、必ずしも試験や就職を目的として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ないことがわかった。日本語が好きで勉強する彼女たちにとって日本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は、日々の生活の一部であり、当たり前のように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して、その日本語学習を後押ししているものが彼女たちのピア(学習仲間)や実生活のコミュニティの中での「他者とのつながり」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では、社会人教育機関で働く教師は、このことから何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だろうか。3人の語りから分かるように、香港で学ぶ生涯日本語学習者は日本で生活することもなければ、仕事で日本語を使うことも極めて少ない。そのような学習者に、従来の知識伝達型の日本語教育のみを行っていても、学習者を十分に満足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それよりも、相手とのつながりをより重視した日本語教育が強く必要であろう。教師はただ文法や語彙等の指導に留ま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同士が連携できるような教室活動を設計したり、教室を超えて自身のコミュニティでも日本語を使っていけるよう、また社会へと繋がっていけるよう支援していく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そ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香港の生涯学習者の心の中に生涯日本語を学んでいくための更なる動機が芽生え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注：

- 1 社会人教育機関には民間の語学学校や大学付属の生涯教育機関を含む。
- 2 例えば、目標言語が教室外で使われていない外国語環境では社会への帰属願望はもととないだろうし、目標言語を学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就職に有利になるといったことも国によって異なるだろう。
- 3 Facebook. Incの提供する世界最大のソーシャルネット・ワーキング・システム。

参考文献

- (1) 綾部義憲・狩野富士夫・伊藤克浩(1995)「大学生の日本語学習動機に関する国際調査ー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場合」『日本語教育』86, 162-172.
- (2) 李受香(2003)「第2言語および外国語としての日本語学習における動機づけの比較ー韓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て」『世界の日本語教育』13, 75-92.
- (3) 倉八順子(1992)「日本語学習者の動機に関する調査ー動機と文化的背景の関連」『日本語教育』77, 129-141.
- (4) 国際交流基金(2008)『海外の日本語教育の現状ー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2006年』
<<http://www.jpff.go.jp/j/japanese/survey/result/dl/gaiyo2006.pdf>>
- (5) 坂井美佐(2000)「中国人学習者の日本語学習に対する BELIEFS についてー香港4大学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から」『日本語教育』104, 69-78.
- (6) 谷富夫(1996)『ライフ・ヒストリー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
- (7) 山口敏幸(2003)「香港における正規学校教育以外の日本語教育活動の概況」日本語教育学会編『海外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活動の概況ー現職者研修活動および学校外活

動を中心にして』 27-29 <<http://wwwsoc.nii.ac.jp/nkg/database/2002chosa/02chosa-04f.pdf>>

- (8) 米本和弘(2009)「生涯教育における日本語能力試験の位置づけ-香港の生涯教育の事例研究」『2009年度日本語教育学会秋季大会予稿集』 159-164
- (9) 萬美保・村上史展(2009)『グローバル化社会の日本語教育と日本文化ー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と多文化共生リテラシー』 ひつじ書房
- (10) Au, S. Y. (1988).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Gardner's social-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38, 75-100.
- (11) Brown, D.H. (2000)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4th edition. White Plains, N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12) Crookes, G., & Schmidt, R.W. (1991). Motivation: Reopening the research agenda. *Language Learning*, 41, 469-512.
- (13) Deci, E.L., & Ryan, R.M. (2002) *Handbook of Self-Determination Research*.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 (14) Dörnyei, Z. (2001). New themes and approaches in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1, 43-59.
- (15) Dörnyei, Z., & Skehan, P.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C.J. Doughty & M.H. Long (Eds.),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589-630). Malden, MA: Blackwell.
- (16) Gardner, R.C., & Lambert, W.E. (1959). Motivational variabl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 266-272.
- (17) Gardner, R.C., & Lambert, W.E. (1972).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18) Gardner, R.C., & MacIntyre, P.D. (1991). An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in language study; Who says it isn't effectiv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3, 57-72.
- (19) Knowles, M.S. (1968). Andragogy, not pedagogy! *Adult Leadership*, 16, 350-352.
- (20) Pavlenko, A. (2007). Autobiographic narrative as data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28, 163-188.

Rethinking the Meaning of Loyal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ūshingura 1/47* and *Red Cliff* 「忠」の意味の再考：忠臣蔵 1/47 とレッドクリフとの比較研究において

YAU Shuk-ting, Kinnia 邱淑婷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sociate Professor
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科准教授

<要旨>

「忠」の意味の再考：忠臣蔵 1/47 とレッドクリフとの比較研究において

個人的な価値観や、その国の歴史、文化の差などにより、「忠」という言葉に対する理解は世界各地で異なると考えられる。たとえば、中国の許慎が著した漢字辞典『説文解字』には、「忠」について「心の中」と記されている。即ち、中国人は「忠」を「真心を込めた尊敬と援助、助力である」と捉えているのである。また英語では、「忠」というのは「ある人或は物への確固たる信念」であるという。日本語の場合、「忠」は「真心をこめて国家や主君に仕えること。臣下としての本分を全うすること」を指すとされる。言語的には、いずれもほとんど同じ意味で「忠」を説明しているようだが、歴史的に考えると、日中両国は「忠」について異なった理解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中国では、『三国志演義』中の劉備、関羽、張飛による「桃園の誓い」の場面に兄弟のような友情が描かれており、それは今でも多くの中国人に愛される逸話となっている。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神風特攻隊員は『忠臣蔵』の浪人たちのように主君(天皇)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たといわれる。

『三国志演義』が中国人の「忠」を体現する代表作であるのに対して、『忠臣蔵』は日本人の「忠」を表す作品である。江戸時代以来、『三国志演義』は日本人のあいだで大人気となり、『三国志』ブームが起きることも時にはあっ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中国人は『忠臣蔵』に取り上げられる「忠」が理解できないようだ。たとえば、中国人映画監督の馬徐維邦は『元禄忠臣蔵』(1942/溝口健二)を見たあと、撮影技術は大変素晴らしいが映画のなかで強調される「忠」には同感できないとコメントしている。

本文の主旨は、中国及び日本の歴史における「忠」という概念の変遷について検討し、さらに『三国志演義』と『忠臣蔵』を比較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人と日本人はどのように「忠」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を探ることにある。また、この研究は主に中国映画の『レッドクリ Part I』(2008/ジョン・ウー)と『レッドクリフ Part II』(2009/ジョン・ウー)、そして日本のテレビドラマ『忠臣蔵 1/47』(2001/河毛俊作)を検討対象として取り上げて行う。

Rethinking the Meaning of Loyal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ūshingura 1/47* and *Red Cliff*

Introduction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values and historical-cultural backgrounds,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loyalty. *Shouwen jiezi jiaoquan* (Commentary on Explaining Simple and Analyzing Compound Characters) (Xu 1962-64: 292) describes “loyalty” as the “center of the hear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re valu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loyalty lies in wholehearted respect and support for others. In English, “loyalty” is defined in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Wehmeier 2005: 916) as “the quality of being faithful in your support of somebody and something.” Japan’s *Kōjien* (Shinmura 1991: 1661) defines “loyalty” as “sincerity and faithfulness towards the country and its ruler.” It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three definition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loyalty lies in faithful treatment of others. The term loyalty is applicable in various kinds of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loyalty to one’s country, ruler, family or friends. Loyalty appears to have similar meanings in the above three languages. However, remarkable discrepancies arise when one approaches the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behavior. Some nations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to the ruler, while some tend to emphasize fraternal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Chinese, for example, show great respect for the patriotic general Yue Fei. They also yearn for fraternal loyalty li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Bei, Guan Yu and Zhang Fei, as depicted in *Sanguo yanyi*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ree Kingdoms hereafter). Japanese, on the other hand, volunteered to become *kamikaze* pilots for the sake of the emperor, and like the *samurai* in *Chūshingura* (The Treasury of Loyal Retainers, Loyal Retainers hereafter), they we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their master. Japanese society in general values “country” more than “family,” but the Chinese society thinks the opposite. In other words,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s filial piety rather than loyalty. It may be appropriate to look at such cultural difference as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loyalty, or even regard it as a transformation, or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loyalty that had taken place in Japan. Lord-vassal is not the only vertical relationship of high importance in Japan, as parent-child and elder-younger brother/sister relations are also crucial to Japanese society. In comparison, Chinese people tend to view brotherhood more in the sense of a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loyalty are in fact reflected in literary works in both nation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Three Kingdoms* and *Loyal Retainers* are perhaps the two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on the notion of loyalty. Although both of them carry significant weight in their own country, the destinies of the two classics seem to be complete opposites of each other when they are exported overseas. Since *Three Kingdoms* first arrived

in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Japanese have embraced this example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exceptional enthusiasm.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audiences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to agree with the ideology expressed in *Loyal Retainers*. During WWII, Japanese film critic Hazumi Tsuneo recommended *Genroku Chūshingura* (The 47 Ronin) (1942/Mizoguchi Kenji) to Chinese director Maxu Weibang in Shanghai. Although Maxu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director's skillful shooting techniques, he could not agree with the value of loyalty highlighted in the film ("Author" 2006: 76). Despite the fact that *Loyal Retainers* also centers on the theme of loyalty, it has nonetheless failed to touch the hearts of Chinese people. Arguably, *Loyal Retainers* failed in China because the Japanese story does not match the Chinese definition of loyalty.

This research first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loyal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y. Secondly, interpretations of loyalty b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will be examin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ree Kingdoms* and *Loyal Retainers*. In order to attend to recent social phenome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with reference to recent works, namely John Woo's *Red Cliff* (2008) and *Red Cliff II* (2009), and *Chūshingura 1/47* (2001/Kawake Shunsaku).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yriad historical accounts concern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cluding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history, plays and novels are available, but *Sanguo zhi*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one of those that have been assigned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credibility. Written by Jin Dynasty official Chen Shou, the book documented 90 years of history spanning from the Yellow Turban Rebellion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in Dynasty.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period, Luo Guanzhong created *Three Kingdoms* based on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well as popular folklore of the time, while also adding personal touches to the stories. The novel was edited by Mao Lun and his son Mao Zonggang during the Kang Xi period, when it eventually became the 120-chapter *Three Kingdoms* as it is known nowadays. The story has already been translated into over ten languages. Although Luo's work has been criticized as consisting of "70 percent history and 30 percent fiction," its easily comprehensible style made it popular amongst read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making it more influential than official histories. *Three Kingdoms* expert Yi (2007: 13) states that "the power of literature surpasses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ree Kingdoms* tends to praise Liu Bei and degrade Cao Cao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public's desire for a unified country and pursuit of virtue ethics, that is, *ren* (benevolence), *yi* (righteousness), *li* (ritual), and *zhi* (wisdom).¹ Our belief in these values has in fact been

strengthened by recent adaptations of classic literature, be it John Woo's *Red Cliff I & II* or Daniel Lee's *Three Kingdoms: Resurrection of the Dragon* (2008). Each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ree Kingdoms* possesses a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and outstanding attributes, such as the enigmatic Cao Cao, benevolent Liu Bei, chivalrous Guan Yu, invincible Zhang Fei and ingenious Zhuge Liang. Guan and Zhuge are considered role models of the country; they are even worshiped in Chinese temples. It has been discovered in research that Guan is the most worshiped male figure, putting him on par with ancient China's greatest scholar Confucius (Huang 1967: 1, 6). The *Three Kingdoms* boom, as observed by many, has never subsided.²

The Treasury of Loyal Retainers

Loyal Retainers generally refers to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the Genroku Akō Incident (Akō Incident hereafter). It has been said that “speaking of classic Japanese film, Westerners usually think of *Shichi nin no samurai* (Seven Samurai) (1954/Kurosawa Akira), while Japanese consider *Loyal Retainers* as the masterpiece” (Yomota 2003: 97). The Akō Incident happened in 1701 in the Edo period. Forty-seven *samurai* avenged their master by committing the crime of murder, which eventually led them to the ultimate punishment—*seppuku* (*harakiri*, stomach-cutting). The incident raised controversy in society because the idea of loyalty towards one's lord was shak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kugawa's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incident made *samurai* reconsider the true meaning of loyalty. In 1748, 47 years after the incident, Takeda Izumo created a puppet show titled *Kanadehon Chūshingura* (The Treasury of Loyal Retainers) to commemorate the loyal *samurai*. Japanese obsession with *Loyal Retainers* is apparent since the classic has already been adapted into over 100 films and drama series. Katō ([1975–80] 1995: 110) points out that *Loyal Retainers* exposes the public'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He argues that the story has an intention to disrupt public order (*kōteki chitsujyō*) based on personal sentiments (*shiteki kanjyō*). 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Loyal Retainers* will stand the test of time in Japan because Japanese are also confronted by the “public vs. private” dilemma in many aspects of life.

Chinese People's “Loyalty”

The Chinese definition of loyalty constitutes th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with emphasis on loyalty to a benevolent ruler. However, this version of loyalty failed to materialize because rulers throughout different dynasties had insisted fervently on

unquestioned loyalty towards one's superior (and so the blind loyalty paid by Qu Yuan and Yue Fei are considered virtuous). In the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arena, loyalty even served as a survival tool for opportunists. Coupled with various forms of totalitarianism, a vassal's obeisance was only superfici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ideal lord-vassal relationship and the reality forced the people to create an unusual version of loyalty, brotherhood or friendship. Indeed, there are numerous Chinese stories praising the beauty of friendship, such as the story of Zu Di and Liu Kun from the Jin Dynasty.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also form the basis of Jin Yong's famous martial arts novels. Heroes including *The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s* Zhang Wuji and *The 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 Guo Jing* all put their lives at stake for their bosom friends. Jin ([1981] 1997: 198) once commented that, "[I]n Chinese thinking, law breakers are accepted in socie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are even emblematic of disdain for power and order. Somehow they bear images of a hero. Unfaithful or disloyal behaviors are however strictly forbidden in society." Furthermore, he points out that while Chinese find it acceptable to overthrow a ruling power, they consider betrayal of a friend as absolutely unforgivable (Jin [1981] 1997: 202).

Three Kingdoms in China

Liu Be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vassals can best be described as brotherly. In *Red Cliff*, Cao Cao sighs, "Liu Bei was def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why do his generals still follow him?" Liu treats his followers as brothers. In return, his commanders have no hesitation in sacrificing themselves for him. John Woo repeatedly shows Liu making shoes for his generals, demonstrating how much he loves his subordinates. In contrast, the merciless Cao sees his followers as nothing more than pawns in his ambitious plan,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commanders is thus full of suspicion.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therefore, draw our attention again to the virtue of benevolence, symbolized by Liu.

Red Cliff grossed 26 million US dollars in box-office revenue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Korea and Singapore only a few days into its theatrical release.³ Although superstars such as Tony Leung and Kaneshiro Takeshi probabl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film, support from fans of *Three Kingdoms* cannot be overlooked. To make it more entertaining, the Battle of Changban and Eight Trigrams Formations, along with some comical scenes are included in the adaptation. Nonetheless, these additions have not overshadowed the director's intention to promote loyalty.

Tony Leung reveals that John Woo regards the character he played, Zhou Yu, as the "perfect hero" (Niu 2008: 53). In an interview with *Hong Kong Film*, Woo comments that the modern society lacks noble ideals while personal gain comes before everything. Yet his movies are reminiscent of "something all of us used to have," that is, loyalty, righteousness and commitment in friendship (Niu 2008: 50). In *Red Cliff*, Zhou Yu is portrayed as an

educated, capable and compassionate commander. He and Zhuge Liang are not as treacherous as they are in the original novel. On the contrary, a sense of brotherhood exists between them. *Three Kingdoms* originally contains the story of Huang Gai pretending to defect in order to trick Cao Cao. In *Red Cliff*, however, Zhou terminates the plan because he cannot bear to see the veteran being tortured. In the film, Cao sends the bodies of soldiers who died from typhoid fever to the waters of Eastern Wu in order to spread the virus to his enemy. Yet, Zhou is not intimidated by the risk of infection. His main concern is to bury these bodies properly so they can rest in peace. It is through Zhou's behavior that Woo is able to show his respect for life and peace.

Zhuge Liang (Kaneshiro Takeshi) is a faithful strategist with integrity. His famous quote "Spare no effort in accomplishing the task; striving to the utmost of one's life" expresses his loyalty to the Liu family. The saying had become an aphorism for loyal vassals of later generations. In episodes like "Zhuge Liang borrowing Cao Cao's arrows with straw on vessels" and the "empty city stratagem," Luo Guanzhong portrayed Zhuge as an intelligent man who masters astronomy and divination. Although the true character of Zhuge may have been lost in Luo's supernatural depiction, he remains an irreplaceable symbol of loyalty, integrity and wisdom. In fact, *Red Cliff* also contains a detailed narrative of Zhuge's loyalty and intelligence. When his master Liu Bei struggles with adversity, Zhuge supports him by providing constructive advice. As Yi (2007: 235–6) suggests, Zhuge remains loyal to Liu not only because of Liu's chivalrous image, but also because Liu represents the continuity of the Han Dynasty. Therefore, Zhuge could establish his ideal empire through assisting Liu. His support for Liu also matches perfectly with the Chinese people's aspiration to help the weak. In the presence of an aggressive Cao Cao, Zhuge becomes a hero who fights against unfairness and injustice.⁴

Zhao Yun (Wu Jun) is another outstanding character in the film. Zhao's chivalrous act as described in Chapter 41 of the *Three Kingdoms* "Liu Xuande leads his flock over the River; Zhao Zilong rescues master Liu single-handedly" (Luo 2004: 313) made him a faithful figure in history. In 208, Cao Cao launched an attack on Liu Bei but Liu's people willingly fled with their benevolent ruler. As a result, Liu's troops were slowed down by the refugees and Cao finally caught up with Liu in Changban. When Zhao Yun found that Liu's wives and son were left behind because their carriage had broken down, he galloped towards Changban and defeated over 50 of Cao's men before rescuing Liu's son, Ah Dou. *Three Kingdoms* depicts Zhao's heroic act as follows:

The cornered dragon bathed in red took wing
And cleaved the enemy lines by Steepslope Bridge.
In two score years and two the babe will reign;
Zhao's superhuman might thus earned his fame. (Luo 2004: 320)

When Zhao brought Ah Dou safely back to Liu Bei, Liu instantly threw the infant to the ground and said, “For the sake of a suckling like you, I risked losing a great commander!” (Luo 2004: 322). Zhao picked the young master up and said, “If I cut my heart out here, I could not repay your kindness to me” (Luo 2004: 322). Liu could sacrifice his son for his general, while Zhao was ready to sacrifice his life for Liu. Commitment between the two has, as a matter of fact, surpassed that of a lord-vassal relationship. Through *Red Cliff*, not only is John Woo able to recreate the captivating political treachery in *Three Kingdoms*, he also reinforces the subject of humanism, which he always tries to promote. In summary, the success of *Red Cliff* lies in its ability to appeal to the public with moral values, as well as its depreciation of infidelity.

***Three Kingdoms* in Japan**

It is not clear how *Three Kingdoms* entered Japan but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first Japanese version of *Three Kingdoms* was translated by Ko'nan Bunzan in 1686. After the initial translation, other versions of *Three Kingdoms* were also produced, such as Nomura Aisei's *Sangoku-shi monogatari* (The Tale of Three Kingdoms, 1940). These books facilita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 Yoshikawa Eiji's novel *Sangoku-shi*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1948) again generated the *Three Kingdoms* boom after the war. In his work, Yoshikawa skipped the extended fighting scenes in the original story, and put more effort on portraying individual characters. The novel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public because of its unique insight into the story (Qiu and Wu 2006: 86).

Japanese enjoy *Three Kingdoms* as much as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Watanabe (2009: 87) believes that it is the friendship between Liu Bei, Guan Yu, Zhang Fei and Zhao Yun, as well as the beauty of self-sacrifice that make *Three Kingdoms* such a compelling story. *Red Cliff* grossed 6.6 billion Japanese yen two days into its theatrical release. Moreover, the *Dai Sangoku-shi ten* (Great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t Tokyo Fuji Art Museum since May 2008 has attracted over one million visitors. Cultural products related to *Three Kingdoms* come in various forms including Chin Shunshin's historical fiction *Hihon Sangoku-shi* (Three Kingdoms, 1974), comic series such as Yokoyama Mitsuteru's *Sangoku-shi* (Three Kingdoms, 1971-86), Yamahara Yoshito's *Ryūrōden* (Legend of the Dragon's Son, 1993-), and Ikegami Ryōichi's *Lord* (2004), and video games such as Koei's production *Sangoku-shi* serie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1995-2006) and *Shin sangoku musō* (Dynasty Warriors, 2001). Morita suggests that *Three Kingdoms* has become a spiritual pillar for Japanese during the turbulent post-war period. It was in *Three Kingdoms* which they hoped to find true heroes as well as life philosophies that could pull them through the time of upheaval (Wen 2009).

Another reason that makes *Three Kingdoms* popular in Japan i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era of Three Kingdoms and Japan's Warring States period (1476-1603).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a time that saw the emergence of numerous heroes such as Oda Nobunaga, Takeda Shingen and Uesugi Kenshin. Moreover, Takenaka Hanbē is always described as Japan's Zhuge Liang because Toyotomi Hideyoshi paid three visits to Takenaka to seek his assistance.⁵ Oda and Maeda Keiji are referred to as Japan's Cao Cao and Lü Bu respectively.

Interestingly, Japanese have no intention to praise Liu Bei and degrade Cao Cao. Watanabe (2009) argues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right or wrong between Cao, Liu and Sun Quan but only different ideologies in managing the country.⁶ Yi Zhongtian has been severely criticized for defending a traitor when he tries to restore Cao's reputation in his books. Furthermore, Yoshikawa Eiji even portrayed Cao as a charismatic villain.⁷ Japanese admire Cao because he reminds them of Oda Nobunaga. Both of them possessed striking qualities of a domineering leader and they were the most powerful of all. In fact, Japanese have a unique way of looking at the strong: it is believed that they can transcend moral standards with their mighty power. Dower (1986: 11-13) points out that the typical heroes or gods in Japanese folklore usually have two faces. They can be "protective and tutelary beings" but at the same time potentially destructive creatures. He argues that this two-faced characteristic partly explains why Japan's attitude towards the US changed abruptly once WWII ended. By the same token, Cao and Oda can be compared to Godzilla, a typical character whom Japanese respect and fear.

Japanese People's "Loyalty"

After WWII, Japan came under Allied occupation for as long as seven years. To suppress feudal ideology, publicize democracy and tame the Japanese people's desire for revenge, General MacArthur imposed a ban on the making or screening of *jidaigeki* (period drama). Consequently, *Loyal Retainers* disappeared from the Japanese cinema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⁸ When Yoshikawa'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released, following the long absence of the "chivalrous and martial arts" culture, it came at the perfect time. Today, *Loyal Retainers* is still frequently seen in Japanese media, proving that the 47 *samurai* never die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fter the Tokugawa period, the term loyalty was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Japanese emperor, although it was occas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unwavering commitment of a lord-vassal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Edo period. This commitment is perhaps most promin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amurai* and his feudal lord. A *samurai's* loyalty towards his master originated from the spirit of *bushidō*. Developed in feudal Japan during the 12th century, *bushidō*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samurai's* belief and way of life; it is a moral code

that combines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Shintoism and Taoism (Nitobe [1899] 2004: 11-14). *Bushidō* was originally a philosophy of humanism. It enabled *samurai* to make truthful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s when facing the “loyalty vs. righteousness” dilemma. Although a *samurai* should uphold loyalty to his lord, ideals such a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must not be compromised because he would otherwise become a cold-blooded servant with no individuality. However, *shōgun* and Japanese emperors took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cultural meaning of loyalt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power. The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to the lord and love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samurai’s* loyalty thus applies to authority at the top level. Consequently, *bushidō* was considered synonymous with unconditional and unwavering loyalty to the country, which implied that loyalty existed only at a national rather than a personal level.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officials transformed the *samurai’s* loyalty to his master into absolute devotion to the emperor (Murakami and Sakata 1981: 511). Their intention to do so is scrupulously reflected in *Gunjin chokuyu* (The Imperial Rescript to Soldiers and Sailors) issued in 1882.⁹ Benedict ([1946] 2005: 209) describes absolute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t that time as follows, “[T]hey sought to teach [the people] that in fulfilling *chū* [loyalty] one fulfilled all other duties.” The ruler’s ambition to justify autocracy and imperialism became patently obvious.

Bushidō considers loyalty as a *samurai’s* faith, which means he is allowed to disobey orders issued by a superior in order to uphold virtues like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and loyalty. Nonetheless, the spirit of *bushidō* took on the meaning of unconditional commitment after the original concept was significantly reinterpreted. Emphasis on absolute loyalty to *shōgun* or emperor wa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during the Tokugawa and Meiji periods, which resulted in the suppression of loyalty at the personal level. As a nation that values the ideology of collectivism, individuality has always been stifled. Nowadays, Japanese still suffer from the 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 dilemma. The reason behind the popularity of *Lost Paradise* (1997/Morita Yoshimitsu) amongst middle aged Japanese is the film’s capacity in exposing how collectivism obliterates one’s individuality.¹⁰ These examples illustrate a social phenomenon that has long existed in Japan: when facing the public-personal interest dilemma, Japanese who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uncompromising collectivists, would sacrifice personal interest for the greater good of all.

The Treasury of Loyal Retainers in Japan

Loyal Retainers perfectly illustrates the *samurai’s* dilemma of virtue: they need to remain loyal to their master as well as to the *shōgun* (Benedict [1946] 2005). The 47 *rōnin* execute Kira to demonstrate their loyalty to their feudal lord. Loyalty to the *shōgun*, however, also

remains intact as they commit *seppuku*. In other words, they sacrifice their lives to allow coexistence of the two contradicting ideals. *Chūshingura 1/47* is also based on the Akō Incident, yet the TV drama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version. The title “1/47” suggests that one of the 47 *samurai*, Horibe Yasubē (Kimura Takuya) is being singled ou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revenge was orchestrated by Ōishi Kuranosuke. He is usually the protagonist in *Loyal Retainers* adaptations, such as Inagaki Hiroshi’s *Chūshingura* (47 Samurai, 1962) and Ichikawa Kon’s *Shijūshichi-nin no shikaku* (47 Ronin, 1994). In *Chūshingura 1/47*, however, Horibe becomes the mastermind behind the vendetta, while Ōishi suggests seeking justice through nonviolent measures. These alterations turn Horibe into a remarkable character and add a touch of individualism to the story.

The name Kimura Takuya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belief of “staying true to oneself.” In TV series such as *Beautiful Life* (2000/TBS), *Hero* (2001/Fuji TV), *Good Luck!* (2003/TBS), *The Grand Family* (2007/TBS), *Change* (2008/Fuji TV) and *Mr. Brain* (2009/TBS), he plays an individualist who refuses to go with the flow. These characters contrast sharply with the typical Japanese who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collectivists. *Chūshingura 1/47* is no exception. Horibe says to Ōishi, “Trusting myself was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When his wife asks him why he cannot leave the past behind and start a new life, he replies, “*Samurai* spend their lives looking for a place to die.” The majority of the *Loyal Retainers* films reach an explosive climax when the 47 *rōnin* raid Kira’s mansion, while the *seppuku* scene would only be described by subtitles. In *Chūshingura 1/47*, however, Horibe is shown preparing for *seppuku*. When he kneels down and sets to plunge the sword into his abdomen, he suddenly stops and asks for a piece of tissue because his nose is itching. The camera then shows a close-up of him clearing his nose. The scene not only suggests that Horibe has no fear of death but also voices his disgust for the verdict.

Chūshingura 1/47 is a manifestation of loyalty to one’s heart, which is an idea consistent with the most fundamental teaching of *bushidō* stay true to one’s conscience. This explains why Horibe sees no value in life if he has to break the moral principles. *Chūshingura 1/47*’s revolutionary approach echoes with the growing emphasis on individualism in Japanese society. The new generation’s desire to break away from the group is reflected in Kimura’s individualistic character. As an island country, Japan had experienced long periods of seclusion. In order to survive so many natural disasters, unity among the islanders is required. This in turn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ly collectivist society. The “collectivist mentality” has developed into a national character that takes personal sacrifice for granted. Japanese speak of harmony and they have strong sense of dependence on their group. Deviation from the social norm or any kind of individualism is strictly prohibited. Having to suppress their emotions, Kimura thus becomes the figure that projects their desire for personal will. He is well accepted in such a highly collectivist society because he always takes a judicious line, meaning that he is not a threat to the society.

The Treasury of Loyal Retainers in China

Unlike the popularity of *Three Kingdoms* in Japan, *Loyal Retainers* fails to capture the hearts of Chinese audiences despite its unprecedented success in Japan. Mizoguchi Kenji's *The 47 Ronin* was produced during WWII. Its storyline was largely shaped by the idea of patriotism and loyalty. In the film, Ōishi repeatedly asks himself whether taking revenge for his master means betrayal of the emperor (Satō 1995: 128). Although Chinese director Maxu Weibang was overwhelmed by the lavish Japanese production, he admitted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make sense of some parts of the film. Hazumi Tsuneo commented that, “Maxu was referring not only to the complicated storylines in *Loyal Retainers*, but also our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 (Tsuji 1998: 388). *Loyal Retainers* is a story about revenge and self-sacrifice for one's master. To the Chinese public, however, such a story appeared unconvincing. Okazaki (1996: 12) points out that from the 1920s to 1930s, hero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s neither serve a lord nor possess authoritative power. Instead, they are generally chivalrous heroes from the lower-class. Chinese lost faith in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 Qing Empire was so corrupted that it did nothing to prevent foreign powers from dividing China. Okazaki thinks that the “loyalty to lord” ideology failed to become established in China probably due to this reason.

To the Chinese, loyalty lies at a much more personal level: it is primarily applicable to friendship. Chinese disagree with the *samurai's* act of giving up life, family and friends in the name of loyalty and obedience to the superior. Furthermore, heroes in *Shuihu zhuan* (Water Margin) and *Three Kingdoms* emphasize loyalty to friends rather than the rulers. Master of martial arts novel Jin Yong and president of Sōka Gakkai (Value-Creation Society) Ikeda Daisaku once had a conversation on human relationships in China and Japan (Jin and Ikeda 1998: 203-16). Ikeda notes that Japan is a “vertical society” with an extremely stratified and rigid class syste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uperior-inferior relationships. Equality amongst people in society (friendship) hence barely exists. Due to the lack of friendship, loyalty is directed at the lord, which implies that *samurai* would swear allegiance even to a tyrant or fatuous ruler. Japanese literature is never short of works about vassal-lord relationships such as Mori Ōgai's *Abe ichizoku* (The Abe Clan) and Yamamoto Shūgorō's *Momi no ki wa nokotta* (The Fir Trees Remain), while stories about friendship are scarcely available. In contrast, a “horizontal society”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and equal relationships. Jin believes China is a society that values loyalty to friends. Moreover, friendship is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ha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on many occasions. The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that, “A wife is like a piece of clothing while brothers are like legs and arms; it is possible to mend damaged clothes but impossible to reattach broken limbs.” Putting aside the sexist implication, the saying indeed reflects the Chinese view on friendship. The oath sworn by Chinese when they become brothers echoes the same

logic: “We ask not to be born in the same year, in the same month and on the same day. We merely hope to die on the same day.”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Jin and Ikeda brings out the realization that a people's value system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nation's social structure. “Horizontally structured” China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to friends, while “vertically structured” Japan st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loyalty to one's lord. What *Loyal Retainers* demonstrates is the latter, which is an idea that does not match with mainstream Chinese thinking. In Chinese history, very seldom did any swordsman assassinate high-ranking officials or the emperor to take revenge for his superior. It is, therefore, of little surprise that some critics disagree with the story in *Hero* (2002/Zhang Yimou) in which Jing Ke fails to assassinate Qin Shi Huang because he wishes to realize Qin's dream to unite China.¹¹ In *Loyal Retainers*, however, the 47 *samurai* are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enge their master, hence, the “loyalty to lord” mentality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ideal of “dying for a good friend.” What *Loyal Retainers* presents is a “vertical society” that clearly contradicts with China's “horizontal society.” This is a major reason why Chinese find the story of *Loyal Retainers* unconvincing. Furthermore, Chinese have a preference for heroes who fight against all odds single-handedly, such as those in *Cike liezhuan* (Biographies of Assassins) and *Water Margin*. The story of 47 *samurai* killing one man, however, unavoidably produces an unfair image. Moreover, the purpose of the killing is not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because at the end they willingly commit *seppuku*. The *samurai* portrayed in *Loyal Retainer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image of a hero and this is another reason that can explain the failure of *Loyal Retainers* in China.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justice and personal relations also exists in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unlike Japanese who place the group's interest before everything, Chinese tend to choose personal relations over public justice. In *Water Margin*, for example, Song Jiang and his group of bandits should be punished for breaking the law from the public justice point of view, yet this group of outlaws is actually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which proves Chinese discontent with authority and their support for righteousness.

Conclusion

Three Kingdoms and *Loyal Retainers* reveal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loyalty b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Although *Three Kingdoms* is regarded as a story of loyalty, its emphasis lies in the bond of brotherhood. On the contrary, what *Loyal Retainers* stresses is a vertical lord-vassal relationship. In other words, the former focuses on loyalty to friends, the latter considers loyalty as repayment for kindness to one's superior. *Loyal Retainers* is generally rejected by Chinese because upholding loyalty at both national and personal levels

through one's sacrifice inevitably implies slavish obedience. To Chinese, this obsession simply does not match with their ideal way of life. *Three Kingdoms* is approved of by Japanese because it satisfies their hunger for freedom and noble friend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loyalty and brotherhood remain central parts of the Chinese moral system. It is obvious that one's ultimate sacrifice in the name of loyalty and brotherhood is honored in *Red Cliff I & II*. With rapi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se traditional values come under stress as mammonism starts to take over. Johnnie To's *Election* (2005) raises the question, "Your brother or gold, which one do you love?" Should loyalty give way to greed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or should one's life be sacrificed in order to remain loyal? These are the issues that China needs to reflect on as the country enjoys its economic boom. In Japan, half a century of democratization leads to the awakening of personal will. Loyalty presented in literary works, thus, starts taking on different forms accordingly. *Chūshingura 1/47* attempts to highlight one's aspiration to stay true to the conscience an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llective society. The struggle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us,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provoke debate in Japanese society as well as provide inspiration to writers and filmmakers alike.

¹ The most distinc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ree Kingdoms* and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the former's tendency to praise Liu Bei and degrade Cao Cao. This arrangement contradicts with conventional thinking which considers Wei (Cao's dynasty) the legitimate empire.

² In 1992,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launched a highly acclaimed 84-episode *Three Kingdoms* series. In 2008, famous television director Gao Xixi also started producing a new version of *Three Kingdoms*.

³ In mainland China, the film generated 27 million RMB in box-office revenue on its first-day release. It set a new record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⁴ The theme of chivalry and resistance against totalitarian power is universal. Apart from the famous English outlaw Robin Hood, the courageous stories of Chinese *kung fu* heroes such as Wong Fei-hung and Ip Man are also frequently adapted into films. In Japan, approximately 30 films about the fictional character Zatoichi, the blind swordsman, have been produced since the 1960s.

⁵ Japanese also like to compare Zhuge Liang with their national hero Kusunoki Masashige. Kusunoki was a brilliant strategist born in the late Kamakura period, who died in the battle against rebellious Ashikaga Takauji. The Meiji Emperor built Minatogawa shrine to commend his loyalty and devotion (Qiu and Wu 2006: 29-31).

⁶ According to Watanabe's (2009: 68-67) explanation, Cao Cao was determined to build the Empire of Wei because he saw no hope in reviving the Han Empire. Liu Bei, on the other hand, saw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the symbol of orthodox Confucianism, as his responsibility. While Sun Quan agreed that revitalization of Han would not be possible, he realized his inability to fight against Cao, and therefore the three kingdoms scenario was the most viable option for him. Instead of challenging Cao, Sun opted to silently expand his area of influence and wait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his empire.

⁷ Yoshikawa Eiji describes Cao Cao as “a great man who is hard to come by in [a] hundred years of time,” “erudite, sophisticated, culturally cultivated and militaristically skilled.”

⁸ *Jidaigeki* refers to swordfight film, television drama or theater se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ome famous productions include Kurosawa Akira’s *Seven Samurai* and *Yōjimbō* (The Bodyguard) (1961). The first *Loyal Retainers* film produced after Allied occupation was Tōei’s *Akōjo* (Ako Castle) (1952/Ogihara Ryō).

⁹ *Gunjin chokuyu* is an official code of ethics for military personnel. It is to be memorized and cited on important national holidays and in ceremonies held by the military. The contents caution military personnel “not to be like heroes of old who died in dishonor because, ‘losing sight of the true path of public duty, they kept faith in private relations’” (Benedict [1946] 2005: 210).

¹⁰ The film tells the story of Shōichirō (Yakusho Kōji) and Rinko (Kuroki Hitomi), a couple who start an affair despite being married to different partners. Ultimately, the two have to pay the price once their affair is exposed; Shōichirō is demoted by his company and Rinko’s mother calls her an unfaithful whore. To the Japanese, the biggest humiliation is one’s failure to live up to the group’s expectation and the most severe punishment is abandonment by the group. At the end, the two commit double suicide in order to search for their own “lost paradise.”

¹¹ Director Chen Kaige openly admits that he does not like *Hero* because he disagrees with the idea of “sacrificing an individual for the sake of the group” (Xie and Tan 2003).

References

- Anonymous (2008) “*Chibi piaofang guo yi qiangqian chuang jilu*” [*Red Cliff* box office passes a hundred million, breaking profit-making record], BBC Chinese.com, 15 July,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500000/newsid_7506800/7506827.stm (accessed on 16 October 2009)
- Benedict, Ruth ([1946] 2005)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New York: Mariner Books)
- Dower, John W. (1986)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Huang, Huajie (1967) *Guangong de rengen yu shenge* [Guan Yu's Character as Human and God]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 Jin, Yong ([1981] 1997) “Wei Xiaobao zhe xiao jiahua” [Wei Xiaobao the little chap], Ni Kuang, *San kan Jin Yong xiaoshuo* [Three Revisions of Jin Yong's Novels] (Hong Kong: Crystal Window Books)
- Jin, Yong and Ikeda Daisuke (1998) *Tanqiu yi ge canlan de shiji* [In Search of a Magnificent Century] (Hong Kong: Ming Ho Publications)
- Katō, Shūichi ([1975-80] 1995) *Nihon bungakushi jōsetsu* [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Ye Weiqu and Tang Yuemei (trans.) (Beijing: Kai Ming Publishing)
- Luo, Guanzhong (2004) *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 Complete and Unabridged Part 1 & 2*, Roberts Moss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urakami, Shunsuke and Sakata Yoshio (eds.) (1981) *Meiji bunkashi 3: kyōiku dōtoku* [Cultural History of Meiji 3: Moral Education] (Tokyo: Hara Shobō)
- Nitobe, Inazō ([1899] 2004) *Bushido: Samurai Ethics and the Soul of Jap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 Niu, Er (2008) “Chibi meng” [Red Cliff dream], *Hong Kong Film*, 8: 29-59
- Okazaki, Yumi, Itō Takashi and Urakawa Tome (1996) *Bukyō shōsetsu: Okazaki Yumi ga kataru Honkon eiga gensaku no sekai* [Martial Arts Novel: Okazaki Yumi Talks about the Original Works in Hong Kong Movies] (Tokyo: Hinyosha)
- Qiu, Ling and Wu Fangling (2006) *Sanguo yanyi zai Ri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Japan] (Yinchuan: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Satō, Tadao (1995) *Nihon eiga 300* [Japanese Movies 300] (Tokyo: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 Shinmura, Izuru (ed.) (1991) *Kōjien* [Wide Garden of Words] (Tokyo: Iwanami Shoten)
- Tsuji, Hisakazu (1998) *Chūka Den'ei shiwa: ichi heisotsu no Nicchū eiga kaisōki (1939-1945)* [A Narrative History of Zhonghua Dianying: Recollec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Cinema from a Common Soldier (1939-1945)] (Tokyo: Gaifusha Publishing Inc.)
- Watanabe, Yoshihiro (2009) “Sangoku shi tokubetsu kōza” [Special Seminar 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Reddo kurifu Part II kōshiki bijuaru BOOK* [Red Cliff Part II Official Booklet] (Tokyo: Kōdansha)

- Wen, Ping (2009) “Weisheme Riben ren zui’ai *Sanguo*?” [Why do Japanese like *Three Kingdoms* the most?], *Nanfang Weekly*, 16 April,
<http://magazine.sina.com/nfweekend/20090417/2009-04-16/193870081.shtml> (accessed on 16 October 2009)
- Wehmeier, Sally (ed.) (2005)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Xie, Xiao and Tan Rongrong (2003) “Chen Kaige henpi *Yingxiong yinfa* jilie zhenglun” [Chen Kaige’s harsh criticism on *Hero* sparks heated debate], *Nanfang City News*, 7 August,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ent.southcn.com/movie/200308070536.htm> (accessed on 16 October 2009)
- Xu, Shen (1962-64) *Shuowen jiezi jiao quan* [Commentary on Explaining Simple and Analyzing Compound Characters], Qian Dian (ed.) (Taipei: Wen Hai Press Company)
- “Author” (2006) *Gangri dianying guanxi* [Japanese and Hong Kong Film Industries: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of East Asian Film Networks]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 Yi, Zhongtian (2007) *Pin Sanguo* [Savoring the *Three Kingdom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 Yomota, Inuhiko (2003) *Ajia eiga no daishū no sōzōryoku* [Public Imagination in Asian Cinema] (Tokyo: Seidosha)

童話に見る犀星の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力¹

An Examination of Murou Saisei's Efforts to overcome his Inferiority Complex through a Study of his Fairy Stories

劉金挙 (Liu Jinju)

広東外語外貿大学日本語学部教授

Department of Japanes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Professor

Abstract

After the success of his “Young Trilogy”, Murou Saisei experienced the first creative low of his career. Encouraged by the popularity of fairy tale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and the success of his friend Akutagawa Ryūnosuke in the genre, he began his first period of writing fairy tales. His second creative low came during WWII and again Murou Saisei turned to fairy tales. His fairy tales reflect his main writing principles of seeking compensation through his works and realizing his goal of overcoming his inferiority complex. In this way, Murou Saisei applies poetry and reference to the natural world to express his pursuit of family warmth. We also see uncontrollable wild nature because of his low self esteem within his descriptions of taking care of young life and his love for family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His second period of fairy tales illustrates his great compassion toward the young and weak.

[Keywords] Murou Saisei, Fairytale, Inferiority Complex, Life of Young and Weak

一、犀星の童話創作

句作によって文学世界の市民権を得て、『抒情小曲集』などによって口語自由詩の確立に大いに貢献した室生犀星は、童話創作において大正十年代の「最初の豊熟期」（大正十年～十五年）と戦時下の「豊熟期」（昭和十六、七年頃）²を経て、生涯八十余篇の童話を創作している。「寂しき魚」（大 9. 12）は、大正期の『赤い鳥代表作集 I 初期』（小峰書店 昭 51）に選録され、「鮎吉、船吉、春吉」（昭 16. 4～17. 3 連載。昭 17 年 4 月小学館より単行本刊行）は出版後文部省推薦図書に指定され、さらにほかの作品とともに『日本児童文学大系 9』（ほるぷ出版 昭 52）に収録され、また「オランダとけいとが」（昭 23）をはじめとする四本の童話は、「代表的作家の名作童話」³「日本の名作」として「日本の創作童話の代表作が全て収められている」⁴ことを誇りにした『日本児童文学全集・菜の花と小娘』巻（偕成

社 昭 45・12) に編集され、しかも「著者代表」とされている。それから、「魚介」(原題「人界魚界」 昭 15.1) は『新選日本児童文学 2 昭和篇』(小峰書店 昭 51) に収録され、『動物詩集』(日本絵雑誌社 昭 18) は児童文学の名著とされ、復刻される他、多くの作品は少年少女向きの文学全集に組み込まれている。「犀星の児童文学は、量、質ともに、他の近代作家のそれに比べ、決して遜色がないことは確信できる。ただ、詩人として、又、小説家としての犀星の名声が、児童文学作家犀星の存在を片隅に押しやっ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⁵、と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ない事実がある。

犀星の童話創作に関しては、普通以下の動機が指摘されている。

第一に、創作上の沈滞と芥川龍之介の影響である。「幼年三部作」によって詩作から小説へと華々しい文学的転身を成し遂げ、第一期の小説創作に成功した犀星は、大正九年頃からの濫作が災いして、作品の質が低下し、素材にも方法にも行き詰り、一時文壇に無視されたような存在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た。「大分前に支那の童話とか、今昔物語やらをもとにして書いた時がありましたが、あれは作家の力の衰へた時ですね。」(「古典について・折口信夫との対談」『むらさき』昭 16・6) とあるように、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めに疲れを感じて、この沈滞を苦にしている、新領域を開くことを通して突破口を見つ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た。長い沈滞による古典への沈潜と同時に、芥川龍之介の影響⁶、また長男の夭逝(一歳過ぎ)や親友の相次いだ死などは、犀星をして童話と史実小説の創作を始めさせたと思われる。

第二に、その童話創作には、当時の童話ブームという時勢が挙げられる。大正七年七月、鈴木三重吉によって当時日本童話界の横綱ともいえる『赤い鳥』が創刊された。文学的香気と上品な雑誌を目指す鈴木の主宰する児童文学の芸術化運動に賛同した泉鏡花、小山内薫、島崎藤村など著名な文学作家たちがこぞって児童文学雑誌に名を連ねていて、大正期児童文学のルネッサンスを形成し、その全盛期を迎えた。「犀星が進んで筆をとつたというより、童話勃興の機運にうながされ」⁷たのだと言えよう。

第三に、「童話を描くきっかけの一つは児童文学勃興の気運に刺激されたことだが、一つは作家自身の安定した生活から生まれた、家族あるいは肉親への愛情がきっかけとなっている。」⁸とまとめられたように、駆け出しながら当代の作家でまもなく父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た犀星は、不幸な生立ちであったがゆえに、家族殊に子供への溢れんばかりの愛情に支えられて、童話への資質的な傾きをもって、童話創作を手掛けはじめた。

しかし、「文学の世界は、劣等感に悩まされる青年の唯一の逃げ場所であった」⁹との指摘通り、私見では、出生と境遇の負い目などによってできた劣等感から抜け出すため弛まぬ努力を続けた犀星は、俳句より発足し、抒情詩・初期小説世界を経て、童話創作に至っても、引き続き虚構と美化手法などを通して、自然から求めた幽遠、弱者へのいと惜しみ、家族とりわけ子供への強烈な愛などによって、コンプレックスからの脱出を試みたことこそ、内的な動因だと思う。

二、第一の豊熟期の童話における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力

第一の豊熟期に、犀星は合わせて 37 篇の童話を発表している。

(一) 詩的表現・豊かな抒情性と美化の手法

「未明童話を主流とする大正期メルヘンの世界における詩的、抒情的、象徴的傾向は、犀星文芸の本質的要素でもあり、生来的な説話への嗜好は「史実小説」と相俟って伝承童話の創作へと彼を促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¹⁰ 確かにこの第一の豊熟期の犀星童話は、「清純な詩魂は流れて童話に結晶し、密度濃い文章で興味に富む作品をもって大正期の『赤い鳥』等を飾った」(福田清人)「詩と小説と同様、ユニークな世界」(鳥越信)¹¹である。

「水郭の一林紅し夕紅葉」(明三十七十月八日『北國新聞』)、「夜になつて木の葉を見ると/ふしぎに幽遠な気がする」(『星より来れる者』所収「夜」)、「夕方の光線が机のそばへやつてくる/そのなかで本をよんでゐたりする/懐かしい幽遠な気がした」(『星より来れる者』所収「幽遠」)などのように、犀星の句作・詩作世界は、コンプレックスに苛まれた彼が、静寂を慕う魂を持ち、幽遠哀寂を求める芭蕉をわが文学の先達としていて、その出発において、幽遠を求めた結果だと言える。この抒情的な「幽遠」は、ずっと犀星童話にも底流している。「私もいまは全きまでに、高く幽遠な星族をみあげて自分らがそのかげにすぎないもののような気がした。そして私どもの生活がまた何処かこのまま写真に撮ったように生き動いているようにさえ信じられた」(「星と老人」)。「黒い屋根と屋根とをつらねた町からは、ただ静かな加茂川の流れの音ばかりするのでした。それは、ちょうど、遠いところからして来るような幽遠な音をもっているのです」(「尼」)とあるように、この時期の犀星の意識には「童話イコール詩の一様式」という考えが存在していた。これは、初期の童話「尼」「少年」などは『忘春詩集』に収録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推測できる。つまり、この時期の童話において、「犀星が生涯、詩人として作家として生きた詩精神とか美学とかの凝縮を、そこにひそませていたわけである」¹²。いかにも抒情性に富んだ清浄極まりない世界であろう。

もちろん童話という文芸ジャンルだけに、前の作品より、作者は、初期小説創作における美化や抒情という手法を思う存分に援用し、登場人物に「こうあってほしい」結果を与えることが自由になる。例えば、「禁断の魚」では、母親とその子の興義は互いに頼りあって生活していたが、病気をしていた母の命を救うため、興義はあえて「殺生禁断」の禁令を破って、母に栄養物として魚を捧げた。その後病気にかかったわが子を救うために、母もまた「殺生禁断」を犯して魚を滋養物として興義に与えた。二人の行為は露見するどころか、「池のなかには間もなく、この親子が投げ入れる多くの飼のために、魚は肥り数を殖や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また、原典の「上綏の主金を得る事」(宇治拾遺物語)に比べれば、犀星童話の「上綏の主」と呼ばれる兵衛佐が石のように見える黄金の石を譲り受けるまでの内容は

同じだが、その後のものは全く犀星流に置き換えている。兵衛佐は、持主の女にはその正体が知られていない黄金の石を着服しようとしたが、結局帰りの道中それが川に沈んでしまった。仕方なくて「自分一人で、その石を自分のものとする、いやしい考へを棄てて」、真相を女に告白してからやっと二人でそれを地上に引き上げる。ところがその後また山分けをするのではなく、「女の受け取った半分はずっと小さく、兵衛佐の分はずっと大きかったのです。しかし、あとで兵衛佐の分はやくざな鉱石で、女の持った分は砂金を含んでいる石だということがわかったそうです。」女は徹頭徹尾心の正しいものとして描かれたのに対して、欲に目がくらんだ兵衛佐は、他人の無知に付け込んで相手を欺こうとしたが、結局何の益も得なかった人とされている。

このように、もし俳句・抒情詩・初期小説における犀星の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力に照合すれば、この幽遠や清浄さを求め、何もかも美化し、まるでシャングリラでも築くような手法は、依然として彼の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力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はずである。この意味において、犀星にとっての童話とは、自然と人間との交流における無垢で純粋な世界を表現する文芸様式だと言える。

（二）強烈なコンプレックスからの脱出努力の逆り

犀星文学において、魚は彼の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力の象徴である。童話だけあって、魚の登場はことさら多い。犀星児童文芸中、「魚」あるいは「魚の世界」を素材とした作品は、この第一の「豊熟期」の主なものだけを掲げても、「寂しき魚」「禁断の魚」「水中の園」「感情」「不思議な魚」「水の中の夏」などがある。

ここでは、「寂しき魚」を例にとってみよう。「寂しき魚」は、作者が人間の生をトータルな相で一匹の古い魚に投影し、その魚の生と死を観照する形で展開した物語である。作者は一種のモンタージュ的手法を用いて、昼と夜、一匹の古い魚と若い魚たち、空と沼、水面と水中、都会と田舎（山中）と、対比的な構造を作り上げることを通じて、古い魚のイメージを鮮やかにした。この蒼くてどんよりとした古い沼に住んでいた古い魚は、「その大きなからだを水面とすれすれにさせながら、いつも動かず震えもしないで、しずかに、ゆっくりと浮き上がって」て、まるで「水中の王者」みたいで、しかも「いつも何かしきりに考えている（中略）何かを考えあぐんだように、間もなく沼の底を深く眺め込むのでした。」と、哲学者じみた相貌が与えられている。

では、なぜこの古い魚は考え続けたのかといえ、この沼から三里ばかり離れた都会を「あそこには何もかもある。おれが永い間考えとおしたふしぎな国」と思い、自分の住んだ沼を「この土のあじわいさえも、いまはおれをくるしめるばかりだ。おれは一日も早く明るい地上に出てゆきたいのだ。不思議な地上、まだ見たことのないものが数限りなくある地上――。」と、未知の世界（都会或いは地上の世界）へ強い憧れを抱いているからで

ある。残念なことに、ついに志を成し遂げず、念願した地上のものを何一つ知らないままに、魚は安らかな死を迎えた。この童話を読んだ後、

逆境に育った地方の少年の、はるか彼方に輝く未知の自由と栄光の世界を憧れる心情と、望みとどこかぬ悲しいあきらめとが、この詩には見事にうたわれている。脱出することのできぬ水の中と、その上にかがやき亘る広大な空という対照も巧妙である。¹³

という評論と、「性に目覚める頃」に挿入された犀星の「いろ青き魚/ひねもすそらを仰ぐや/そらは水の上にかがやき亘りて/魚ののぞみとどかず。/あはれ、そらとみずとは遠くへだたり/魚はかたみに空をうかがふ。」(明治三十七年七月)という無題詩に関する奥野の評論を思い浮かべる。文学創作を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手段として選んだ若き日の犀星は、この沈滞期に入り、都会の光を慕い憧れ、沼を脱出して地上へあがることを図る古い魚のように、皆に理解されぬのを苦にして、またここからの脱出のため精魂を尽くして努力し続けているが、中々思うままにならず、「天上のうごきをからだに受けながら、その意志を継いでゆ」き、大往生的な「安らかな死」を迎えた魚に自らの運命を重ねたのである。

この時期の「魚」は、苦悶、煩悩に苦しんで、コンプレックスを抑えきれず、

ときには烈しい日光をせなかに受けながら、沼の岸の方からだをすりよせ(中略)じとじとになった岸の土をぱっと飲みこんでは、くるしそうに吐いていた。泥にぐりした水が乱れた汚い水脈をつくっては流れた。(「寂しき魚」)

と、その現状に悶えて、とうとうそれと格闘するため烈しい「小爆発」を繰り返したりする。これは、「幼年三部作」における「小爆発」を受け継ぎ、後の「復讐の文学」において巷を彷徨う「市井鬼」に繋がるのである。

ほかに向上志向の作品も多くある。例えば、故郷の城下町金沢にゆかりのある人物や事件などの伝承話から素材を得て、技巧の向上を憧れる作品で、箒箒を吹く技能を高めるため、何時も野山に登り稽古して、最後に自分の優れた技を用いて集まってきた蛇達を眠らせたり、山賊の刃を洩らせたりするように上手になったことを描いた「箒箒師用光」、芸道一筋に己の生命を燃焼させた金沢の著名な文化財九谷焼の名人九谷庄三を描いた「九谷庄三」、魚を描くことに一心して、結局鯉となり、「自分でこれまで描いた遊魚の図面のことごとくが拙く、そして恥ずかしい劣作であることを、いまさらのやうに」恥じた「魚になった興義」などがそれである。これらの作品は、文筆家の道への一徹な求道心と執念を燃やし続けた作家犀星と深く響きあい、渡り合うものであるとともに、文学創作によってコンプレックスを脱出する熱意に燃えた彼の心の描写でもある。

(三) か弱いものへの愛惜と家庭的雰囲気への憧れ

不幸な出生・生立のせいでコンプレックスを抱いた犀星は、幼少時からか弱いものに限りない慈しみや愛着を持ってきた。この時期の童話は、抒

情詩・初期小説から伝承した抒情ばかりではなく、『抒情小曲集』の「蟬頃」などの詩篇に一脈相通の、しかも童話だけに、か弱くて小さなものをいとおしむ優しさ、哀憐が目立っている。

「老人と星」では、「病的な蒼白い羽根をよわよわしく微かな音を立てながら、ひろひろと震わしながらいた。それが弱い生まれかけの優しさに満ちていた」「殻から半分ばかりからだを脱け出した一疋の蟬」に微を極めた観察を施したり、「獵師」においては、石つぶてに打たれ、翼が折られてしまい、「ばたばた羽搔をやって幾度も立とうとしたが、ただ砂ぼこりを立てるだけで、すぐに平伏ってしま」った雀を救うため、いたずらな子供にいろいろと諭した坊さんを借りたりして、小さい命を哀れんだ。か弱いものへの愛惜は、「寂しき魚」「竜宮」(大 11・4)を生ませ、「こおろぎの話」(大 12・9)に至っては、魂がこおろぎになった子供にさらに限らない同情や憐憫を寄せたのである。

それから、犀星は引き続き家庭的雰囲気追求している。「禁断の魚」においてもさることながら、「尼」の中の「少年」も、尼さんと会うこと「そればかりを毎日待ちくたびれていた」。小僧の実体である黄金の仏像を入手して、「仏像は輝いて彼女の白い胸のところに温められたまま、寺にかえりました。」という表現から、この「待ちくたびれ」た原因は、「はからずも犀星の深層に秘められた欲求、願望」¹⁴にほかならないとわかる。

もっとも一番印象的なのは、子供への溢れんばかりの愛である。

(四) 子供への溢れんばかりの愛

子供への果てしない犀星の愛は、幼少時に欠けていただけに湧き出た熱烈なものである。

この最初の豊熟期より、「なるべく品のあるお話にしたのです(中略)良く読んでゆくと味があると思ひます」(『翡翠』の「序」)とあるように、教育に恵まれなかった犀星にとって、子供に読ませる童話のあるべき姿は<品のあるお話>で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である。とりわけ、大正十年代に「史実小説」と平行して執筆された伝承童話には、史実小説と共通の、あるいはそれと類似の典拠、素材により、

真、善、美、聖、といった絶対的価値を追究する求道的な生、生
 活的次元での教訓、人間の生死、子供、動物との関わりの如き、深
 く高い内容が盛られている(中略)作者自身の人生観、問題を追究
 する「再創造」の方法によるものがあり、「人生的内容」を盛り込ん
 だ童話は、再創造によるものが多い。¹⁵

と、普遍性、教育性、興味性をたくさん盛り込み、その一部を後に成人向けの短編小説集や詩集に収録したこともある¹⁶。それゆえ、「子供不在の児童文学」だと批判されたこともある。その延長線に創作した第二の豊熟期の童話は、教育者的立場に立ったものが多いのは、当然な成り行きである。

三、犀星における第二の豊熟期の童話

太平洋戦争が激化し始めた昭和十五年から、第二の沈滞期に入った犀星は、いよいよ第二の童話の豊熟期を迎える。最初の豊熟期に比べれば、この時期の犀星の童話創作は、依然として創作の沈滞を打破する転機を求めようと、コンプレックスから脱出する努力に貫かれたことも挙げられるが、戦争の影響と相次いだ親友の死が、この時期の犀星の童話には、か弱いものへの哀れみを強め、死への凝視という特色を持たせたのである。

(一) 引き続き詩的表現・豊かな抒情と美化的手法

まず理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粗暴』で『みにくい顔』の生き物は、戦争や侵略に通ずる醜さよりもむしろ、若き日の犀星の素行や顔面コンプレックスに通底するものであり、犀星自身の投影として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¹⁷との指摘通り、醜い「うじ」や「毛虫」にも美しさを認め、お喋りな「雀」や行儀の悪い「冬の蠅」にも愛らしさを発見する犀星は、自らのコンプレックスのもとを度重ねて振り返って、詩的表現・豊かな抒情と美化の手法によって築き上げた「こうあってほしい」童話世界において、自分の生立において最も欠落していたものを追求し、補償を求め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もっとも代表的な例は、「鮎吉、船吉、春吉」に描かれた自然と家庭の懐でのびのびと成長していく子供達、彼らを取り囲む暖かい家族の愛と親子の絆、またその後の「続鮎吉、船吉、春吉」に描かれた先生と児童たちの親しい交流などである。

「鮎吉、船吉、春吉」は、「続鮎吉、船吉、春吉」と正・続の関係をなしており、コンプレックスを紛らわすために人一倍に自然の動植物に心を寄せた犀星が、幼少時の体験をベースにして書いた作品である。「川の王様」である鮎吉、船や機械を愛する船吉、「虫の博士」である春吉は、「その一人一人が作者の分身である（ただし船吉については疑問があるが）」¹⁸。それぞれ個性的な生き方をした三人の主人公達は、四季を通して余暇の大半を野原や川原で過ごし、鮎釣り、なまずや川えび捕り、虫捕りや船遊びに時を忘れて興じる。三人はそれぞれ得意な知識、技能、趣味を持っていて、それぞれの場で互いに主導的になる。また、勉強や労働を分かち合う子供同士の生活の場として、三人は「三吉の家」、「三吉工場」を持っている。その愉しさをリアルに描きながら、作者は「いのちあるものとの対話」こそ、人間らしい心を育てる基盤であることを訴えている。この物語には、犀星は「本当はかくあるべきなのだと考えた、理想の世界」¹⁹として、幼少時の環境とは全く異なる理想的な家族・友達同士の人間関係を描いている。「続鮎吉、船吉、春吉」は、「三吉の家」で三人が互いに助け合い、綴り方を勉強したりするのを基礎に、久本先生の指導と支持のもとで『綴方少年』という同人誌を作ったことを描いたもので、俳句や詩作の同人誌を編集した犀星の幼年・青年時代の影が濃い。この正・続の二篇は、まさに「こうあってほしい」世界に、魚捕り、虫捕り等作者の最も得意としたものをない混ぜにして構成した生活的メルヘンであると言える。

他にも犀星の過去の生活を匂わせるものもたくさんある。例えば、「唱歌室」は、小学校生活に題材をとった作品である。小学校在学中、「成績は何時も半分以上が朱で点を入れられ、七点の唱歌のほかは六点とか五点とか、落第点であつた」(『憑かれた人』)と、犀星は自述したが、なぜ唱歌だけがうまかったのかと度々不思議に思ったことがあるが、この童話を読んでから、ほかの先生や学友から疎まれた犀星にとって、この唱歌担当の「大沢といふ先生は、今でも少年の時分のことを、考へるごとに、全く優しい、いゝ先生だと思ふ」とあるように、灰色の学校生活の中であって、この先生は「さびしい教室に春らしい色を着けるよう」な存在であつたに違いない。そこで、唱歌だけは格段にうまかったのも当然なことだと思える。

(二) 生命への凝視とか弱いものへのいと惜しみ

犀星の動物文学が、「人間と動物をおなじ生命の連続体としてとらえ、人間と動物の区別を絶対的なものとししない」アニミズム的思考に基づく「生きものの共同体の理念」²⁰という日本児童文学の理念に合致しているのは、深いコンプレックスを克服しようとする犀星が、ずっとか弱いものへ並々ならぬ同情やいと惜しみを寄せ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当時、中国侵略及び太平洋戦争の泥沼に陥ってしまい、幾多の尊い「いのち」が惜しげもなく犠牲にされたことによる反発を抑えるため、日本国内では思想に対する統制が厳しく取られ、言論の自由も徐々に奪われていった。こんな中で児童文学であっても、戦争や天皇を讃美し、戦死があたかも素晴らしいことのように描くことを強いられていた。しかし、コンプレックスに苛まれた過去に由来する従来のか弱いものへの慈しみに加えて、昭和十七年五月相次いで親友朔太郎と佐藤惣之助に死別した事件は、犀星に大きな打撃を与えた。こんな状況のもとで、犀星は「山の動物」等生命の尊さをテーマにした一連の動物物語をまとめ、命を見つめなおしていた。朔太郎と惣之助を題材にした「我友」(博文館 昭18)という小説の「序」に「命を粗末にした人間に対する抗議が彼の上に私が加へ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のがあつた。」と書いたのは、この心情の吐露にほかならない。さらには昭和十九年に戦争の激化に従い、日本は緊急学徒勤労動員方策要綱を決定したり、疎開命令を出したりした。しかし、不義な戦争は失敗の一途をたどり、インパール作戦、サイバン決戦、マリアナ沖海戦、レイテ沖海戦に相次いで負けた日本は、人間魚雷「回天」や「神風特攻」を登場させたり、国民総武装を決定したりした結果、現実社会では人間の命は虫けらよりも低く見なされてしまった。犀星童話の「作中の人物は、悉くが動物である。本能的生理によつて衝動的に行動する動物である(中略)すべての登場人物を動物へと還元してしまへば、彼の小説の目的は達せられるのだ。」²¹と指摘されたように、生命軽視の世相の中で、詩人として常に生命の尊厳にこだわってきた犀星は、おびただしいほどの生命への究極的な関心を寄せたものを創作し、微小で取るに足りない<野の生き物>を見つめ、大事にすることを通して、人間の世界に存在する生きた真実とそれへの思

いやりを描出しようとしたのである。それがために、「戦時中の犀星児童文学には、動物文学とも称すべき素材的特色が認められ」、「犀星にとっての動物文学、児童文学とは、彼自身の「いのちのありか」を深く観照する＜自照文学＞であったと言える」²²。とりわけ、「戦争や皇国イデオロギーや報国的生活にも関係のない文章、むしろ虫の醜さから戦争、侵略の醜さ、殺人の醜さを表現した文章を『文学報国』に発表することで、非人間的な世に対する秘かな文学的抵抗を示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²³との指摘どおり、一言で言えば、これは、犀星の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力と彼の「避戦」²⁴態度の表れである。これこそ作者をして動物文学的童話文学に向かわせた原動力だと言えよう。

野山の獣、魚や虫等の小動物、又それとかかわる子供の生活を描いた『山の動物』（「山の動物」と「続鮎吉、船吉、春吉」収録）、『動物詩集』などは、犀星の動物文学の代表的なものである。

「山の動物」は、人間社会の内部の明と暗の二面性を、動物達の生々しい葛藤の形を借りて描いたものである。作品では、のらねこかんべえという強い悪者に対して、いたちの親子やりこうな子ねこ、ねずみ、たに川のかに、かめ、やまねこ、りすが協力して立ち向かう様子が描かれていて、いたちの親がこどもを必死に守ろうとする姿が印象的である。思うに、犀星はこの童話で自分の戦争に対する態度を示している。かんべえに対抗するため、それまで敵対関係にあった小さな生物たちが助け合ったりすることと、最後にかんべえはやっつけら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く、みんなに受け入れられたことは、非常に意味深いことであろう。

『動物詩集』は、戦時中に出版され、装丁・内容ともに時代背景とは程遠く、楽しく明るい詩集であり、対象となる動物は小は昆虫類から大は馬や白熊に至るまで多種に及んでいる。「いろいろな動物の生活を見てみると、どういふ生きものにも私たち自身の生きてゐる有様が、ところどころに見られる。」と、「序文」に書いてあるように、作者は動物の生活と人間生活の類似性に目を留め、生命尊重と生命保護への痛切な願いを込めて、尊い命を大切にするように呼びかけている。三木サニア氏は、『動物詩集』には、「種類別に統計すると、虫類（両生類、爬虫類を含む）は三十五種、魚介類は十四種、鳥類は十一種、獣類は七種、無生物は一種で、計六十七種類の動物が歌われていることになる。数量的には、虫類が圧倒的に多く、全体の 52%を占めている。」²⁵としている。このか弱いものや「虫の生命にすべてを捨てて眺めた眼」²⁶、換言すれば「滅死奉公」や「一億玉砕」のスローガンの下、「天皇陛下」のために「お国」のために生命を捧げることが最高の榮譽とされた当時の風潮の中で特異なもので、「境涯の詩人としての作家の根底に大きく横たわっている生命の尊厳、生きとし生けるものに対する限りない愛、そして、特に小さなか弱い生きものによせる憐憫の情がその深淵にあるといえる。」²⁷「人間が人間以下のものの生命に対する独特の思いやり」は、かつて彼を苛ませたコンプレックスに由来した生命の尊厳と人間愛を尊ぶ気持ちであるとともに、「避戦」しようとする犀星の反抗でもあろう。

この時期のほかの児童文学においても、犀星はおなじテーマを歌い続けている。例えば、「魚介」において、地方長官のお嬢さんの礼子は、その女中のきみえが、川中のことや樹木などに関する多くの知識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に度々驚かされ、小さい生命に憐れと美しさを感じたり、冬の間の食糧として桶に生かしておく鮎の生命を奪って食べる人間の習慣を悲しみ、「哀れな魚の命を魚だけの命とは思えない」と、対象への感情移入をしたりしている。その原題の「人界魚界」は、作者の意図が人間生活と魚族の世界とを並列させ、両者を平衡的に描くことにある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

総じて言えば、犀星は、童話をもって人間を含むすべての生き物の限りある生命と死を直視するとともに、生命の輝きと生きることの楽しさ、幸せを謳歌して、はかない「生きもののいのち」を慈しみ守ろうとする「いのちのうた」こそ、同じ生を享受する人間の持つべき大切な感情だと信じ込んでいた。昭和十八年六月『新潮』掲載の岡田三郎、高見順、伊藤整らの執筆による「小説月評」で、岡田は「動物、生物に対する観察の執拗さ、そこから自分の主観で引出して来る生物の心理表現といふ点に於いては現在彼の右に出る人はいないでしょうね。」と指摘している。これは犀星の命への態度に対する最大の賛歌だと思える。

(三) 子供への溢れんばかりの愛に立った教育者の立場

児童文学には、一般的には＜児童性＞、＜興味性＞、＜教育性＞の三要件が求められる。国民の育成が強く叫ばれた戦時下には、これはなおさらのことであった。自己の芳しくない教育と悲惨な幼年体験を踏まえ、犀星は、＜教育性＞を考慮しながらこの時期の童話を創作した。例えば、

私はこの「動物詩集」で（中略）詩というものや、文章というものは、こんなふうに見たり書いたりすればいいのだと、いうように諸君にも詩を書いたり、考えたりして貰いたいのである。思ったままをそのまま正直にかけばよい。（『動物詩集』の「序文」）

と、自ら教えると共に、

小川鮎吉のようなじっさいのことを、ぶんしょうに書くように（中略）じぶんで、へいぜいから見ていたものを、そのまま、うそをくわえずに、ぶんしょうに書く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綴方というものにも、正直な書き方が一等たいせつなのです。正直に書いてさえおれば、綴方はひとりでできあがるのであります。（「続鮎吉、船吉、春吉」）

と、久本先生の口を借りて、犀星は幼い人達の詩作と作文教育に強い関心を持っている。学生の作文を指導し、クラスのメンバーを誘って夏休み中に作文集を作らせ、自分も詩を書いて皆に披露する久本先生はまさしく犀星の分身だと言えよう。

童話作家といふものは子供と対等の位置にゐて、子供を子供としないで話をすすめるといふことに、真実があつた（中略）自分のものとして製作にしたがひ、少しも童話といふ特別な世界をつくらうと

しなかつた。彼が面白ければ子供も面白いであろう、子供が面白く読めばそれではじめて童話と名づけられ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ある。（「蟲寺抄」）

とあるように、「犀星の童話は、大人の立場で書かれていない。子どもの立場で書かれている（中略）見ようによっては、子どものころのあだを、大人になって、作品をとおして、うっているともいえる」²⁸。この意味では、犀星の児童文学は、「決しておとなから児童を見下ろした文学で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し、単におとなのノスタルジアの文学であってもしない」「児童の主体性尊重のうえに成立」した「すぐれた児童文学だ」²⁹。

こんな立場に立って創作された「犀星の童話には、その小さいもの、弱いもの、無抵抗なものに対するいと惜しみの気持というか、愛の精神というか、思いやりの精神というか、それが直截的によく出ている」³⁰ ゆえ、子供の学校教育に適用できる。文部省推薦図書に指定されたり、少年少女向きの文学全集に組み込まれたりする理由は、まさにここにある。

四、犀星の童話創作の意義

文学創作を劣等感コンプレックスを克服する手段として選んで、幼年三部作により華々しい文学転身を成し遂げたが、いろいろな原因で沈滞に陥り、文壇に忘れられそうにな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心配していた犀星は、創作上の新領地を開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き、日本文壇における童話ルネッサンスという時流に乗り、芥川龍之介の童話や歴史小説に啓発を得て、持ち前の物語や童話創作の資質と、子供への溢れんばかりの愛に支えられ、童話創作を開始したのである。

当然、犀星にとっての童話創作も、依然としてコンプレックスから抜け出すための道具に過ぎないがゆえ、彼は、何でも自由に設定できるという童話の特色を利用して、「こうあってほしい」世界をよりいっそう完璧に築いた。したがって、彼の童話創作は、自らの生活経験を踏まえ、抒情・美化という手法を取り続け、家族とりわけ子供へ愛を注いだり、か弱い生命をいと惜しんだりしていた。

もちろん、童話創作は文壇作家の「余技」とされていた時代において、童話創作はあくまでも彼が素材と創作の突破口として求めた窮余の一策ともいふべき新領域であり、決して彼の創作の中心的位置を占めてはいないが、第一の豊熟期の童話創作は、同時並行に行われたほかのジャンルの創作とともに、「私の文学周辺の雑草が刈り取られた精神風景の清掃が行はれ」、「やはり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八年間」（「私の履歴書」）と、彼本人が自ら述べたように、犀星の小説創作の決心を固め、第二の昂揚期の創作を方向付けた。様々な人生体験や年齢の積み重ね（32～37歳）によって心境は著しく沈潜し、俳諧的なわび、さびの境地に入り、小動物（虫や魚など）を慈しむ観照的な心を深めた結果、犀星は、段々と抒情・美化離れをし、ことさら生臭い人間世界へ回帰し、自分のコンプレックスのもとに真正面から切り込み、いわゆる「市井鬼物」を通じて、その解消に努める土台を

築き上げたわけである。しかも、「犀星の小説の展開上の意義は必ずしも小さくはない。昭和十六年前後の王朝物の先駆をなすものであり、ひいては『かげろうの日記遺文』（昭 43・11）への道を拓いた」³¹。

殊に第二の豊熟期に入ってから、犀星は、政治とはかけ離れた童話において虫・小動物をいと惜しみ、自然の奥より幽遠を求める一方、「王朝物」を描くことを通じて、自分なりの文芸世界を通して頑なに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努力を続け、第三期の小説創作の基礎を固め、『蜻蛉の日記遺文』や『杏つ子』のような名作を誕生させたのである。

注

[1]室生犀星のコンプレックス及びその脱出努力については、一連の拙稿「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犀星文学」『室生犀星研究』＜以下『研究』と略す＞第22輯）、「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の試み」（『研究』第23輯）、「＜市井鬼＞による中途半端な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神戸女学院大学論集』＜以下『論集』と略す＞第48巻第3号）、「＜コンプレックス＞から＜自己実現＞まで」（『研究』第24輯）「＜市井鬼＞による中途半端な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論集』第48巻第3号）、「コンプレックスの解消」（『論集』第49巻第1号）、「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への持続的試み」（『研究』第26輯）、「芥川と犀星との交友について」（『研究』第27輯）、「犀星の詩から小説への転身に見る立身出世主義」（『研究』第28輯）、「犀星における娼婦愛」（『研究』第30輯）、「犀星文学における＜死の体験＞の働き」（『研究』第31輯）、「犀星における芸術的退行」（『論集』第56巻第1号）、「犀星文学におけるコンプレックス脱出努力の形象としての魚」（『研究』第32輯）、「犀星文芸の母胎たる句作について」（『論集』第57巻第1号）など参照。

[2]三木サニア（1989）「室生犀星の児童文学（六）」（『方位』第12号）は、犀星は、第一の豊熟期には伝承童話19篇、創作童話11篇、童話劇7篇を、第二の豊熟期には昭和15年に5篇、16年に14篇、17年に25篇、18年に8篇、19年に1篇発表（連載ものは回数で数える。詩篇は除いた）したとしている。

[3]高山毅ら編（昭45）「刊行のことば」、『日本児童文学全集4・菜の花と小娘』、偕成社

[4]川端康成（昭45）「推薦の言葉」、高山毅ら編『日本児童文学全集4・菜の花と小娘』、偕成社

[5]三木サニア（1984）「室生犀星の児童文学（二）」、『方位』第8号、23

[6]犀星の童話創作における芥川龍之介の影響に関して、例えば「大正九年以降にみられる犀星の芭蕉受容の深化、史伝小説や童話への傾斜、また、風流趣味・文人趣味の傾向などが芥川龍之介の影響によるものである」（星野晃一＜平4＞『室生犀星——悠遠・愛惜の世界——』、明治書院、103）、「芥川龍之介を真似て、歴史的な題材に活路を見いだそうとしていた」（笠森勇＜1997＞『犀星のいる風景』龍書房、142）などと、すでに多くの指摘がある。

[7]久保忠夫（1990）『室生犀星研究』、有精堂、338

[8]黒崎真美（2000）「犀星の童話」、大森盛和・葉山修平編著『室生犀星寸描』龍書房、55

[9]中野重治・福永武彦編（昭42）「室生犀星年譜」、『日本詩人全集15・室生犀星』、新潮社、323

- [10]三木サニア（1989）「室生犀星の児童文学（六）」、『方位』第12号、68
- [11]室生犀星著、室生朝子ら編（1978）『室生犀星童話全集』、創林社、刊行際の帯の言葉。
- [12]赤座憲久（1981）「室生犀星の童話」、『大垣女子短期大学研究紀要』N014、09
- [13]奥野健男（昭42）「青き魚——室生犀星の詩的故郷」、『季刊芸術』10月号、20
- [14]三木サニア（1987）「室生犀星の児童文学（五）」、『方位』第11号、58
- [15]三木サニア（1985）「室生犀星の児童文学（三）」、『方位』第9号、51
- [16]例えば「尼」「音楽時計」は『忘春詩集』に、「塔を建てる話」は『肉の記録』に収録してある等。
- [17]高瀬真理子（2006）『室生犀星研究——小説的世界の生成と展開』翰林書房、82-83
- [18]三木サニア（1994）「室生犀星の児童文学（九）」、『方位』第17号、69
- [19]久保忠夫（昭52）「解説」、紅野敏郎ら編『新版児童文学大系9』、ほるぷ出版、519
- [20]横谷輝（昭49）『横谷輝児童文学論集』第一巻、偕成社、52-53
- [21]小林英夫（昭15）「現代作家の文体——芥川龍之介と室生犀星」、岩波『文学』第八巻第九号、253
- [22]三木サニア（1994）「室生犀星の児童文学（九）」、『方位』第17号、70
- [23]奥野健男（昭61）「解説」、奥野健男・室生朝子編『室生犀星未刊行作品集』第四巻、三弥井書店、293
- [24]伊藤信吉（2002）「続室生犀星」、『すばる』10月号。
- [25]三木サニア（1995）「室生犀星の児童文学（十）」、『方位』第18号、121
- [26]桶谷秀昭（昭45）、「北方的湿潤の抒情と思念」、『短歌』十七巻九号、35
- [27]和田義昭（1993）「室生犀星」項、大阪国際児童文学館編『日本児童文学大事典』、大日本図書
- [28]久保忠夫（1990）『室生犀星研究』、有精堂、334
- [29]原昌・浜野卓也共著（昭46）『新版児童文学概論』、樹村房、16-17
- [30]久保忠夫（昭52）「解説」、紅野敏郎ら編『新版児童文学大系9』、ほるぷ出版、529
- [31]久保忠夫（1990）『室生犀星研究』、有精堂、202

マカオ人日本語学習者の日本語作文過程における
広東語・英語使用の事例研究
**A Case Study on the Usage of Cantonese and English by a Macanese
Student of Japanese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Composition in
Japanese**

石毛順子 (Ishige Junko)
国際教養大学助教
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reveal the ways in which a student learning Japanese uses his or her native language and another second language, learned prior to Japanese,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The participant in this study was a native speaker of Cantonese who is studying Japanese and who has been learning English since preschool.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thought processes involved in writing, we drew up a talk-aloud protocol using the think-aloud method, thereby analyzing the subject's cognitive activity.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subject's native language, Cantonese, was being used as a metalanguage for considering how to proceed with the composition and determining its content while the subject's second language, English, was used to assist in conjuring up abstract vocabulary. By applying Vygotsky's Theory, which analyzes human activity in terms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medium and object, to the participant's activity in this study, namely writing, we get two activities: one activity in which the subject is the participant, the medium is the subject's native language, Cantonese, and the object is the composition; and another activity in which the subject is the participant, the medium is the subject's second language, English, and the object is the composition. Based upon Vygotsky's Theory, which states that the medium determines the content of the activity,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ctivities which have different medium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composition.

1 問題と目的

話すことは、自分の表現したいことを即時に表すように相手から求められることが多い活動であるが、書くことは、表現したいことを読み手に示すまでは準備、編集、推敲をする時間を持つことが多い活動であると思われる。作文産出過程のモデルとして示されることの多い Hayes & Flower (1980) のモデルは、作文過程は既有知識の検索、構想、モニタリングや読み返し、評価修正などが絶えず起こ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作文のプロセスは非単線的なダイナミックな過程である (内田 1999)。

作文過程の研究の中でも、第二言語学習者としての日本語学習者の作文過程を対象とした研究は大竹・園田・広江 (1993)、石橋 (2002) があげられる。大竹他 (1993)、石橋 (2002) は発話思考法を調査方法として用いているが、発話思考法とは自分の思考の道具としての、心の中の言葉である内言 (ヴィゴツキー 2001) を口に出して音声化する方法である。

大竹他 (1993) は、英語母語話者である中級・上級の日本語学習者の作文過程について調査した。そして、学習者が母語を使うことにより認知負荷の軽減が可能な場合は母語を用いることを述べた。石橋 (2002) は中国語母語話者である中級・上級の日本語学習者の作文過程について調査した。母語は上級ではほとんど使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が、中級では使用されており、表象の言語化である「リハーサル」、「リハーサル」中や紙に書いているときに起こる「繰り返し」、文章構造、内容の「計画」、書き下ろされた語・句・文に対するメタ言語的な発話、文章算出過程での書き手のメタ認知的な発話で用いられているとした。

石毛 (2010a; 2010b) でも英語母語話者である初級～中上級の日本語学習者の作文過程の調査がなされており、学習者達は母語である英語を、文・語彙の産出、作文に対するメタ的な指摘、読み返しで用い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になっている。

以上の研究からは、母語は学習言語の作文過程で負荷を軽減するために有効に、またメタ的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とが示唆される。これらのような学習言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の作文プロセスを明らかにする研究は、学習者がどのような点でつまづいているのか、また何を有効に用いている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あると言え、作文の指導に役立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しかし、学習言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の作文過程において母語をどのように用いるのかという検討はなされているが、日本語を学ぶより前に学習した言語についての検討はなされていない。海外日本語学習者の 5 割以上を東アジアで占めている (国際交流基金 2010) ことから、日本語学習者は日本語を学ぶより先に英語を学んでいることが予測される。先述のとおり学習者が何を有効に用いている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作文指導に役立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られ、その用いているものの一つであろう英語の使用方法を分析することは、意義があることであると思われる。そこで、本研究では日本語学習者が日本語の作文過程でどのように母語と日本語以外の学習言語を使用している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具体的に

いうと、参加者の母語である広東語と学習言語である英語が、日本語の作文過程にどのよう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のかを検討する。

2 方法

2.1 参加者

広東語を母語とする日本在住の大学生 1 名であった。就学前より英語学習を始め、小学校 3 年までは広東語で授業が行われる学校に在籍していたが、小学校 4 年時に授業が英語で行われる学校に転校後は、小学校、中学校、高校の授業は主に英語で受けていた。大学入学後に日本語学習を始め、実験時には学習期間は 3 年 9 ヶ月であり、日本語能力試験 2 級に合格済みであった。実験の約 1 ヶ月後、2010 年 7 月に行われた日本語能力試験 N1 に合格しており、日本語能力が高いレベルの学習者であったと言える。また、本研究では特に分析対象としなかった中国語は、小学校から高校まで学習し、日本留学中に日中翻訳、日中通訳の授業を受講していた。

2.2 調査時期、実施場所

2010 年 6 月（来日 10 ヶ月目）、実験者の研究室で実験は行われた。

2.3 作文のテーマ

参加者は、「大家族と小家族」「男と女」「車と自転車」「田舎の生活と都会の生活」「高校生活と大学生活」「マカオの食べ物と日本の食べ物」「マカオの家と日本の家」という 7 つの比較のテーマの中から 1 つを自由に選択して作文を行うことが求められた。テーマの提示が多いのは、テーマによる書きにくさをできるだけ排除し、参加者が持つ作文の能力を最大限発揮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ためであった。「自国の食べ物と日本の食べ物」「自国の家と日本の家」「男と女」は第二言語習得における作文の発達を扱った石橋（2002）、「映画とビデオ」、「田舎の生活と都会の生活」「車と自転車」「高校生活と大学生活」は同様の Kobayashi & Rinnert（1992）で用いられたテーマであった。

2.4 手続き

参加者の作文過程における思考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に、本研究では発話思考法とインタビューによる回顧法を用いた。Ericsson & Simon（1980）によると、発話思考法のように課題遂行時に言語報告を求める方法は、注意している情報を直接言語コードに変換して報告するため、認知過程を変容することはないが、回顧法は課題終了後に課題遂行時の思考内容の報告を求めるため、報告者は長期記憶から思考内容を検索することになり、そのときに誤りがおきやすい。しかし、回顧法にこのようなデメリットがあっても 2 つの手法を併用した理由は、発話思考法は負担の大きい方法であり、石橋（2002）でも半数の参加者のデータが使用できなかったためである。そこで、本研究では発話思考法をメインの方法として使用し、発話思考法

で記録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参加者の思考を補完するために、回顧法を用いた。

発話思考法を行いやすくするための条件として、高橋（1993）は参加者の不安感・緊張感を取り除き、課題に集中しやすい環境づくりをあげ、具体的な方法として実験者の自己紹介や雑談をあげている。本研究の参加者は実験より以前に実験者と面識があり、授業や授業外の活動でラポールが形成されていたため、参加者は特に高い緊張状態にはない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た。

そして、作文時にどんなことを考え、どのようにふるまうのかを知るために調査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説明し、そのため、作文を行う時に考えていることを日本語でも広東語でも英語でもよいので、できる限り話すよう依頼した。発話思考法を第二言語の作文過程ですぐに使用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と思われたため、まず繰り上がりの必要な四則計算、母語での作文、そして日本語の作文で1時間練習を行った。作文の課題にも関わらず、最初に四則計算を練習で用いたのは、思考を口に出すという行動が、作文より繰り上がりのある四則計算のほうが日常でも起こりやすいと考えられたからである。

練習後、実験を行った。実験はビデオとICレコーダーで録画・録音され、実験者は母語使用や辞書使用に関してノートに記録を行った。まず作文用紙が渡され、テーマが提示された。辞書や携帯の変換機能の使用など、作文に参加者が必要とするものは全て許可されていた。時間・長さの指定はなかった。実験に入る際に、参加者が沈黙してしまった際は、話すようにカードで指示するという教示がなされた。作文は約22分で終了し、長さは305字であった。実験後、母語使用や辞書使用に関するインタビューがなされた。

2.5 分析方法

まず、参加者の書いた作文と実験者の記録ノートを補助資料とし、発話プロトコルの作成を行った。発話プロトコルの日本語部分は実験者が作成した。発話プロトコルの日本語以外の部分については、作文中に実験者がメモをし、作文を書いた直後に参加者本人に文字起こしと翻訳をしてもらった。その後、中国語（普通話）と日本語を理解する英語母語話者にチェックをしてもらった。その段階で中国語（普通話）の発話が新たに1箇所記録されたため、さらに中国語（普通話）と英語と日本語を理解する広東語母語話者2名に、チェックをしてもらった。

次に、作文時に見られた、日本語以外で行われた思考活動を取り上げ、分析・解釈を行った。

3 結果と考察

3.1 母語である広東語で行われた思考活動の分析

母語がどのような場面、目的で使われているのかを知るために、参加者

のプロトコルを見てみる。広東語の使用が見られたプロトコルを、以下に全て提示した。下線部が広東語、直後に（）で示されたものが直前の広東語を作文終了後に日本語に翻訳したものである。

プロトコル 1：作文開始から 1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男同女（男と女）。車、自転車。田舎の生活と都会、高校生活と大学生活、マカオの家と日本の家、マカオの食べ物と日本の食べ物、おー、男同女（男と女）、男同女（男と女）、男同女（男と女）男（男）、男（男）、同女（と女）

プロトコル 2：作文開始 1 分から 2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男同女（男と女）、男（男）、點寫呢（どうやって書きますか）男同女（男と女）、車と自転車。車と自転車。高校生活と大学生活。大学生活。日本の食べ物と、あー。救命（助けて：普通話）高校、高校、生活、

プロトコル 3：作文開始 2 分から 3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と、大学の生活。男同女（男と女）、男同女（男と女）、男同女（男と女）、男仔（若い男性）、女仔（若い女性）、呀（あー（困っている声））、嗯（うん、こうしよう）、男同女（男と女）、男と女は、女は、平等、では、ない。それはなぜですか。

プロトコル 4：作文開始 4 分から 5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男同女（男と女）呀（あー（困っている声））平等ではない、それはなぜですか。それは、え、それはなぜですか。欧米の国は、アジアの国より男女平等といわれている。けど、それも、事実ではなく、事実ではないんです。男は、いつも、たくましい、とか、たくましいとか、強い、強い

プロトコル 5：作文開始 6 分から 7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男同女（男と女）、いつもたくまし、くて、たくましくて、強い、イメージをしているから、よく、男のほうが、advantage、ad、ad、advantage、advantage、advantage、advantage（辞書を使う）、ああ、有利な立場、のほうが、有利な、立場、それも事実ではないです。ではない、それはなぜですか。（指で作文を指しながら読み返す）けど、

プロトコル 6：作文開始 7 分から 8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それも事実ではないんです。男、はいつもたくましくて強いイメージをしているから、のほうが、有利なたち、有利なたち、は、びょう、平等ですが、あ、男同女（男と女）平等ですか、欧米の国はアジアの国より男女平等といわれているけど、それも事実ではないんです。なぜかという、なぜか、それも事実ではないんです。（消す）、それは、なぜかという、男は

プロトコル 7：作文開始 8 分から 9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いつも強いイメージをしているから、男のほうが、いい、いい、考え方は、
考え方、男同女（男と女）、平等、平等ですか？欧米のほうが、アジアより
平等といわれているけど、それも事実ではないんです。なぜかという、
男はいつも強いイメージをしているから、男のほうがいい、考え方、ああ、
あら、欧米の国はアジアの国より、（読み返し）

プロトコル 8：作文開始 19 分から 20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くる、事実を、はっきり、しめし、しめし、しめし、しめっている、しめ
って、いる。男同女（男と女）平等ですか、欧米の国はアジアの国より男
女平等といわれているけれど、それは事実ではないんです。それはなぜか
という、男はいつも強いイメージをしているから、のほうが強いと考
えている人もいますからです。あ、昔から、男は、昔から、昔から、いつも…
しているから、のほうが…です。実は、今女の社長さんや上司になる女が
多いので、女の地位がどんどん高くなりました。どんどんあがっ、あがっ
ています。

まず、使用時間を見てみると、プロトコル 1～7 は作文過程 22 分のうち
の前半であり、特にプロトコル 1～3 に母語使用が集中していた。したがっ
て、この参加者の場合は書き始めに母語を多く使用することが示された。

さらに、どのような目的で用いられていたかを見る。まず非常に多
かった「男同女（男と女）」の使用についてインタビューでたずねてみた
ところ、プロトコル 2 の半ばぐらいまでは、「男と女」は面白いテーマで書
きたいと思ったが、どうやって始めたらよいかわからず、頭の中でなかなか
日本語にならなかった。また「高校生活」はつまらないテーマだと思った、
という回答が得られた。さらに、プロトコル 2 に点寫呢（どうやって書
きますか）プロトコル 3 において嗯（うん、こうしよう）のような母語が
見られたことから、この参加者において母語は作文の方針を導いていく、メ
タ言語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が示された。

3.2 学習言語である英語で行われた思考活動の分析

学習言語である英語がどのような場面、目的で使われているのかを知る
ために、参加者のプロトコルを見てみる。英語の使用が見られたプロトコ
ルを、以下に全て提示した。下線部が英語である。

プロトコル 9（プロトコル 5 の再掲）：作文開始 6 分から 7 分までの発話
プロトコル

男同女（男と女）、いつもたくまし、くて、たくましくて、強い、イメ
ージをしているから、よく、男のほうが、advantage, ad, ad, advantage,
advantage, advantage, advantage（辞書を使う）、ああ、有利な立場、の
ほうが、有利な、立場、それも事実ではないです。ではない、それはなぜ
ですか。（指で作文を指しながら読み返す）けど、

プロトコル 9：作文開始 12 分から 13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ゆうしょうな、oh my god, ああ、男と女は平等ですか、（読み返し）それも事実ではないんです。なぜかという、男はいつも強いイメージをしているから、強い、男のほうが、男のほうが、強いと考える人もいますからです。のほうが、強いと考えている、人も、いる、からです。実は、今、今の、女は、女が、

プロトコル 10：作文開始 18 分から 19 分までの発話プロトコル

きます。そして、最近、専、専業、主夫もある、もいる。もいる。そして、最近専業主夫もいる。（辞書を使う）prove, prove, prove, prove, prove, はっきり示す、ああ、それは、女の、地位が、増えて、

プロトコル 8 と 10 を見ると、英語の advantage および prove は、その直後に辞書を用いて日本語の「有利な」、「はっきり示す」という語彙や句に翻訳され、作文に書かれていた。さらに、advantage の使用についてインタビューでたずねたところ、後の prove と同様に、このような言葉は広東語より英語が出てくるという回答が得られた。「このような」が何を指しているのか考えてみると、advantage や prove は抽象的な語彙であると言えるだろう。参加者が高校での学習を英語で行っていたことを考えると、抽象的な語彙が広東語より英語で出てくるという現象も考えうる。さらに、この知見を裏付けるものとして、作文開始 5 分後に「イメージ」を辞書で調べ、英語の image との間に意味の違いがないか確認するという活動が見られていた。

では、プロトコル 9 で見られた oh my god は抽象的な語彙ではないが、なぜ用いられたのかを検討してみる。インタビューでたずねたところ、oh my god は、急いでいて緊張しているときに出るとのことであった。さらに、oh my god に相当する広東語はあるが、使用が年配者に限られており自分は使わない、このような場面においては oh my god または擬音語を用いるという回答が得られた。つまり、母語ではあらわせない感情を表すためにも学習言語は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とが示された。

4. まとめ

以上のように、この参加者においては母語である広東語は主に作文の進め方や内容を検討するためのメタ的言語として用いられ、学習言語である英語は、抽象的な語彙を産出するための助けや、作文中の感情を表すもの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とが示された。母語と学習言語の使用方法を比較すると、母語のほうがより負担の高い活動で使わ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いえるだろう。このことは、プロトコル 2 において学習言語である中国語（普通話）が「救命（助けて）」と感情を表すものとして現れているが、作文の進め方や内容の検討の助けには用いられていないことから示唆される。

このような母語や学習言語を用いた作文活動は、ヴィゴツキーの媒体理論から捉えると、学習者（主体）-母語または学習言語（媒体）-作文（対象）と考えることもできる。媒体理論とは、人間が外界の対象に働きかけるときには、媒体が活動そのものを形作るため、人間の活動は主体-対象という二者関係ではなく、主体-媒体-対象という三者関係を最小のものとして捉える考え方である（田島 1996）。媒体が活動を形作るということから、母語と学習言語のように媒体が異なる活動は、作文を書いていくという大きな流れの中でも、違った役割を持った活動として行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がヴィゴツキーの理論からも示唆される。

以上のような知見が本研究では得られたが、本研究はあくまで事例研究であり、一般化するには多くの参加者での研究を進める必要がある。また、本研究の参加者は日本語能力レベルの高い学習者であり、文章全体を見ても抽象度の高い作文を書いていた。そのため、「有利」「はっきり示す」という言葉を書くために手助けとして英語を用いたが、文章全体が抽象度が低ければ、このような言葉を用いる必要はない。つまり、日本語能力レベルによっても、学習言語の使用が異なる可能性がある。したがって、異なる日本語能力レベルの参加者でも、同様の調査を行う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さらに、本研究の参加者は就学前から英語を学んでおり、小学校 4 年以降の授業を英語で受けていたが、就学後に英語を学び始め、英語はあくまで外国語として学ぶという環境の学習者であれば、oh my god のような英語の使用がない可能性もあるだろう。このように、本研究は参加者が限られていたため考察に制約が生じてはいるが、本研究の結果は、先に学んだ言語が今学習している言語の作文にどのように影響するのかという研究に今後寄与していくもの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付記

本研究は日本の科学研究費若手研究（B）「第二言語作文のプロセスモデルの構築」（研究課題番号 21720189）の助成を受けたものである。

参考文献

- 石毛順子 (2010a) 『『第二言語作文のプロセスモデルの構築』パイロット調査報告』、『アカデミック・ジャパニーズ・ジャーナル』、第 2 号アカデミックジャパニーズグループ、84-89
- 石毛順子 (2010b) 「母語使用の観点から見た英語母語話者の日本語作文過程」、『日本教育心理学会第 52 回総会論文集』、日本教育心理学会、p506
- 石橋玲子 (2002) 『第 2 言語習得における第 1 言語の関与』、風間書房
- 内田伸子 (1999) 『発達心理学』、岩波書店

- 大竹弘子・園田愛・広江浩一(1993)「THINK-ALoud プロトコルを用いた日本語学習者の作文過程及びストラテジーの分析」『1993 年度日本語教育学会秋季大会予稿集』、105-110
- 国際交流基金 (2010)「2009 年海外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結果 (速報値)
< http://www.jpf.go.jp/j/japanese/survey/result/dl/news_2009_01.pdf > 2010 年 9 月 23 日参照
- 高橋秀明 (1993)「プロトコルからわかること、わからないこと」、海保博之・原田悦子編『プロトコル分析入門』第 3 章、新曜社
- 田島信元(1996)「ヴィゴツキー 認識の社会的構成論の展開 II 共同性論の系譜」、『別冊発達』、第 20 号、74-94
- ヴィゴツキー L. (柴田義松 訳)(2001)『思考と言語』、新読書社
- Ericsson & Simon (1980) Verbal reports as data, *Psychological Review*, 87, 215-251.
- Hayes, J. & Flower, L. (1980) Identifying the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processes. In Gregg, L. & Steinberg, E. (Ed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writ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Kobayashi, H. & Rinnert, C. (1992) Effects of first Language 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ranslation versus Direct Compo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42, 183-215.

視覚教材からジェンダーを考える

Reconsideration of Gender Issues in Japanese Visual Teaching Materials

畑澤桂子 (HATAZAWA Keiko)

香港城市大学インストラクター I

Dep.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structor I

青山玲二郎 (AOYAMA Reijiro)

香港城市大学専上學院講師

Community College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cturer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gender inequality as represented in the visual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i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materials we examine are “Photo Panel Collection IV Social and Ceremonial Occasions” and “Photo Panel Collection V Daily Life” published by Japan Foundation in 1997 and 1998 respectively. A strong imbalance between the depictions of women and men has been observed, with a clear tendency to show women in domestic activities while setting men in professional situations. In addition, we have found no depictions of single parent households in these materials. We argue that these imbalances create a biased picture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that the use of these teaching materials not only gives overseas learners a preconceived impression of Japanese society but also reinforces stereotypical gender roles.

1 はじめに

ことばとジェンダーについて、日本語教育でも教科書分析、談話分析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り、性差による差別や規範の問題に着目した研究が行われ、多様で豊かな日本語を考えるための提言がなされている。

本稿では、言語教育に使用される視覚教材に注目し、その中にジェンダーがどのように現れているかを分析する。また、その分析結果から視覚教材に表れるジェンダーが学習者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るかを考察し、日本語教育の中でこれらの視覚教材をどう扱うべきかについて触れていきたい。

2 視覚教材の特性と問題点

語学教育では様々な視聴覚教材が活用されている。学習者にとってはテキストや説明だけの授業より、視覚、聴覚を活用して学習を進めることで、表現や単語が示すものを瞬時に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強く印象に残るものとして効果的だ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である。

視聴覚教材の一般的特性として石田(1996)は次の点を挙げている。¹

- 1、学習意欲を高め、動機づけを強化する。
- 2、経験の限界を拡大する。
- 3、現実を再構成する。
- 4、多数の人々に共通の経験を同時に与える。
- 5、繰り返しの利用が可能である。

上記の特性は、学習者に視覚、聴覚を通して学習者の理解を深めるという点で大きな助けになる半面、そこに現れるジェンダーによる役割や、固定化を多くの人に、繰り返し認識させてしまうという再生産の可能性を持つものでもある。

石田はジェンダーについては言及していないものの、視聴覚教材を利用する際の留意点として、「視聴覚機器、教材の限界を知ること」と「教師が主体性を持つ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²私たちは使用する教材が教授者や学生の認識に大きく作用すること、使用する人の経験や観点が内容に少なからず反映することを念頭に置きながら学習者に向き合う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3 『日本語教育用「写真パネルバンク」』

本稿では考察の対象として、視覚教材－国際交流基金日本語国際センターの編集発行した『日本語教育用「写真パネルバンク」』（2000年）を用いた。理由は①社会生活全般を系統的、また広範に紹介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②写真パネルを一般的・平均的日本人の生活を紹介するためのものとして位置づけ、説明文がついていること。③パネルが大型で視覚的な効果が大きいと思われることの3点である。

『日本語教育用「写真パネルバンク」』はB4サイズ643枚の写真と教師用解説書からなる副教材であり、画像を収録したCD-ROMも発売されている。写真はテーマ別に分けられており「Ⅰ衣食住と道具」「Ⅱ社会生活」「Ⅲ自然と余暇」「Ⅳ行事」「Ⅴ日常生活」と5つのシリーズが出版されている。第Ⅳシリーズ、第Ⅴシリーズである「日常生活シリーズ」と「社会生活シリーズ」は、1980年代に国際交流基金が出版した『日本語教育用スライドバンク』の改訂版であり、改訂の理由については「掲載された写真が現代の日本事情にそぐわなくなったこと」とある。前書きには「海外の日本語学習者に対し日本で日常的に目にする事物や場所および日本人の生活習慣、文化的行事等を視覚的に紹介するために作られた」³とあり、当時

（1997～1998 年）の日本社会、日本文化の現状を反映したものと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解説書には、日本事情の資料としての教室への展示、日本事情の授業での使用、授業以外の日本紹介の材料としての使用などを提案し、日本の社会や文化を紹介する教材として利用できることも書かれている。

4 ジェンダー視点からの分析

4.1 分析結果

現在入手している「Ⅰ衣食住と道具」、「Ⅱ社会生活」、「Ⅲ自然と余暇」、「Ⅴ日常生活」の4種のパネルの中から、人びとの社会生活や活動をテーマにした「社会生活」（156枚）と「日常生活」（147枚）を選び、パネルの中の男性と女性の登場回数や担っている労働、女らしさ、男らしさがどのような形で現されているかを場面、人数、労働・活動の内容に分け統計を取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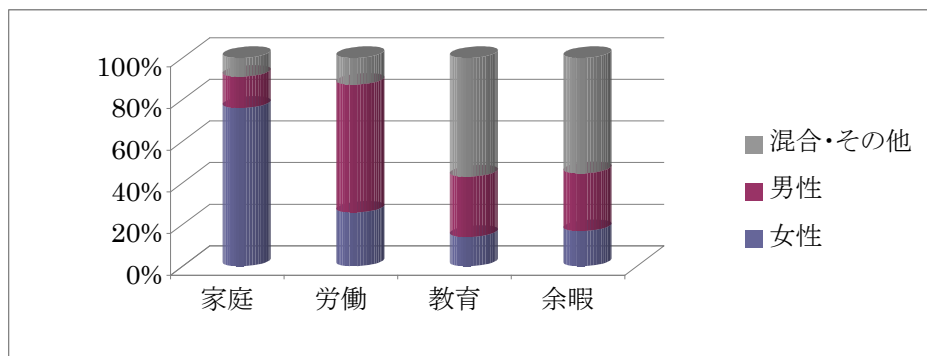
そしてパネルの中にジェンダーによって期待される行動や役割が表れているか、性規範が規定されているかの分析を行った。なお一人だけの活動（たとえば起きる、歯を磨く、傘をさすなど）で他者との関係性が薄い場面、モデルとしての人物がいない場面、遠景で人物の特定や分布が困難なもの、道具、動植物、人物の写っていない公共の場所、自然を紹介したパネルなどは含まれていない。

家庭、労働、学校のパネルにおける男女別出現率（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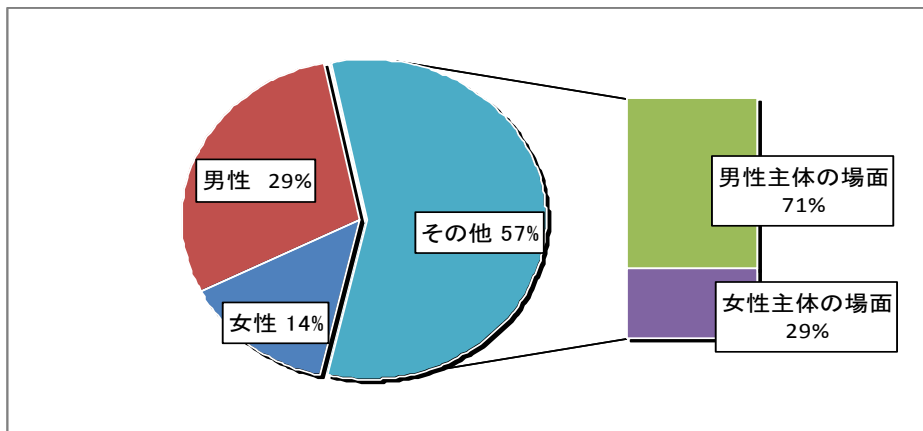
注） 括弧内の数字はパネルの数

	家庭（54）	労働（39）	学校（28）	余暇（36）
女 性	76%（41）	26%（10）	14%（4）	17%（6）
男 性	15%（8）	62%（24）	29%（7）	28%（10）
混合・その他	13%（5）	9%（5）	57%（17）	5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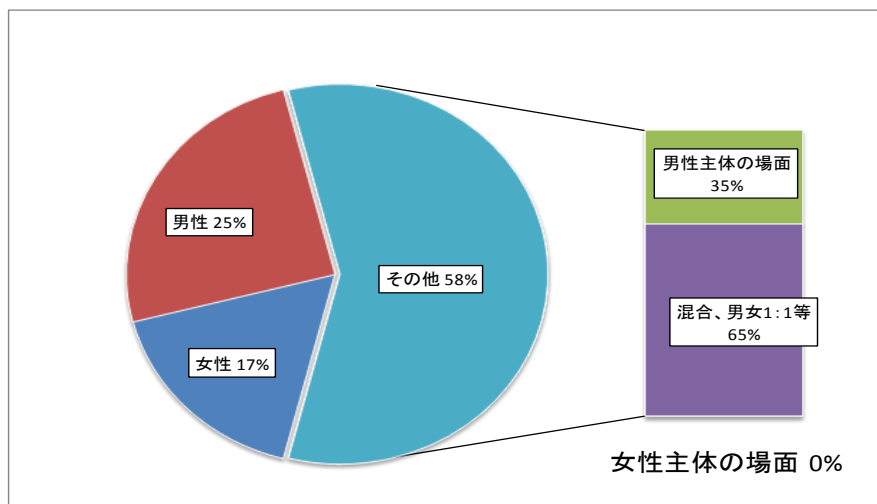
家庭、労働、学校のパネルにおける男女別出現率（図1）



「教育」 家庭、労働、学校のパネルにおける男女別出現率（図2）



「余暇」 家庭、労働、学校のパネルにおける男女別出現率（図3）



今回の調査で「家庭」に分類したパネルでは、主に女性が労働を担っているか場面の中心的人物と考えられるパネルが76%、「労働」に分類した家事労働以外の仕事に関するパネルでは、主に男性が労働を担っているか場面の中心人物と考えられるパネルが62%だった。このふたつのグループには明らかに性役割分業が見て取れた。

例えば家庭での食事の場面では全て女性が給仕をし、男性は食べる側であった。男性の家事労働の内容は「洗濯をする（衣類を洗濯機に入れる）」「衣類を干す」「食器を並べる（食器やはしをならべる）」「布団を干す」「風呂に入る（子供を風呂に入れる）」「クリーニング屋へ行く」「子供を遊ばせる」「ごみを出す」「郵便受けから手紙を受け取る」などで補助的な家事労働がほとんどである。

「労働」に関するパネルでは女性を紹介した9枚のうち、3枚はパート労

働者としての女性を扱っている。男性が主体のパネルにはパート労働者は登場せず、女性労働者のパネルはその3分の1をパート労働者が占めていることから、パート労働は専ら女性が担うものという印象を与える。また「弁護士に相談する」のパネルでは弁護士は女性であるが、後方にはお茶を運ぶ女性も写っている。女性が専門性の高い分野に進出し活躍している場面とも受け取れるが、わざわざ専門性の高い仕事と補助的な役割双方に女性を登場させた意図はどこにあるのだろうか。なお、男性主体の場面にはこのような設定は見られない。（表1及び図1）

そのほか労働のパネルで男性の中に女性が一人だけのものが2枚あり1枚は職場での会議に出席する女性、もう1枚は接待の場面で仲居として登場する女性である。出張、名刺交換の場面は全て男性だった。

「教育」に関するパネルは男女の出現率はその差が最も少なかったが、高等教育に登場するのは全て男性で、女性は小学校、塾のみに現れている。高校、大学、大学の研究室、予備校では全てが男性教員で、女性は学生の一部または補助的労働の担い手となって登場する。

男女共に登場するパネルでは17枚のうち男性が主要な担い手、中心になっているパネルが12枚、71%を占めた。（図2）

「余暇」に分類したパネルでは、男性多数の中に女性が1名または2名の場面は5枚（居酒屋、ビアガーデンなど飲酒の場面4、パチンコ店の場面1）だった。また甘味喫茶、料理教室、スーパー、パン屋、洋菓子屋の登場人物は全て女性である。そのほかの店を扱ったパネルでも花屋、肉屋、果物屋、魚屋、八百屋で買い物をするのは全て女性だった。その他のパネルもゴルフ、ジム、競馬観戦、撮影などは男性のみが、生け花、料理教室、花を植えるなどには女性のみが登場する。更に余暇の「男女混合または1対1」の場面では女性が主体または中心的役割を示すものは1枚も無かった点が特徴的である。（図3）「教育」と「余暇」のパネルでは共に現れる男女の構成に大きな開きは見られなかったが、混合の場面で主体的な役割を担うのは専ら男性で女性は常に補助的な位置にあった。

以上をまとめると、

- ① 「家庭」では女性が中心的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る
- ② 「家庭」での男性の家事は補助的な活動に限られている
- ③ 「労働」では男性が中心的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る
- ④ 「労働」では男性の地位が女性よりも高く表現されている
- ⑤ 「教育」における高等教育では男性中心、初中等教育では男女が均等
- ⑥ 「余暇」では余暇の内容が男女で明確に分けられている

という傾向が見られた。

4.2 画像の中にみられる家庭像、女性像、男性像

今回取り扱った写真パネルバンク「日常生活シリーズ」は4つの家庭を想定し、それぞれの家庭生活や社会的活動が紹介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モデルは「サラリーマン」「商店」「教師」「農家」で、近年増加の一途をたどる単親世帯（約140万世帯）や高齢者世帯（約785万世帯）⁴独居世帯などは描かれておらず全て2世代または3世代で構成された家庭である。家庭は祖父母（またはどちらか）と夫婦と子供で構成され、子供のいない家庭は紹介されていない。現在の日本では個人的・経済的事情で単親や単身で生活している人は少なくない。また多様なスタイルの生活を選択する個人も多くなっている。生活スタイルの多様化はそうせざるを得ない社会的背景と選択の幅の広がりを表したものといえよう。しかしパネルに現れるのは極めて一面的な「日本人の生活」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男女の像については結果の表すように家庭生活を主に担うのは女性で、パネルでは共働きの家庭においても女性の家事労働の負担が男性より多いことを映し出している。

また残業する男性、仕事で夕食を共にできない夫・父の姿を表す場面も含まれていて、「仕事に頑張る男」「夫（または父）不在の家庭」の一端を紹介するパネルも見られる。

現実にはこのような家族、夫婦が多く、日本人の生活スタイルのあり方が度々議論になっているが、それが紹介だけに留まり、現実の問題点への言及がなければそれは現実を追認するものにしかない。

5 本教材を使うことによる影響

『日本語教育用「写真パネルバンク」』では、「女性は家の中で家事、男性は外で労働」という典型的な性役割分業が表現されていることが以上の分析からわかった。この教材は海外の学習者を対象にしたものであるため、ここでは海外の学習環境でこの教材を使用することによる問題点を考えたい。第一はこの教材が現実の日本社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のかどうかという問題である。第二はこの教材が現実の日本社会を反映していたとしても「男性はソト、女性はウチ」という性役割分業を無批判に映像で学習者に伝えてしまう可能性の問題である。

① 写真パネルバンクは日本社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か

制作者は日本社会の現状をできるだけ実態に即して映し出そうと意図したのであろう。しかしそこには制作者自身の中にある「男性はソト、女性はウチ」という性役割分業がそのまま表現さ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性役割分業は男女共同参画（Gender equality）の精神と真っ向から衝突するものである。⁵「写真パネル」の第一刷が1997年であることや当時の社会状況を考えれば理解できる部分もあるが、増刷時はすでに2000年である。社会の変化を反映して改版も考えられたはずである。写真パネルバンクの前書きにあるように、この教材は日本社会を体験できる可能性の少ない海外学習者に向けて制作されたものである。実際に海外の学習者の中には、日本

では全ての女性が学校を卒業したら専業主婦になると信じているものも少なくない。社会の変化は急速で現実を完全に反映することは難しいが、限られた情報しかもたない海外学習者に向けて情報を発信する時には、細心の注意がな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② この教材を使うことによる再生産

また例えこの写真パネルが現実日本社会を反映していたとしても、「男性はソト、女性はウチ」という性役割分業を示した教材を使用することは、性役割分業の価値観を再生産することにならないだろうか。

この教材が対象とする海外の学習者は様々な文化圏に住んでいる。その中には「男性はソト、女性はウチ」という伝統的価値観を強く保った文化圏も多く存在する。そこでこの教材を無批判に使用すれば、異文化に触れようとして努力している学習者に「ああ日本も同じ価値観なんだ」と更に強固に性役割分業を教えてしまう事になる。

また逆に女性の社会進出が進んでいる地域においては、「男性はソト、女性はウチ」という写真を見せ続ける事が日本や日本語への興味の促進につながるだろうか。香港では日本語学習者には女性が多く、日本語教師も女性が多い。多くの学習実践は「女性が女性に教える」という環境で行われる。そのような場所においてこの教材は魅力的なものとなりえるだろうか。

6 結論と今後の研究

以上指摘したように、今回取り上げた写真パネルには日常生活の中に浸透している性役割分業、イメージの中の性役割分業が再生産さ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これらの写真パネルに表された性差によって、学習者は、期待される表現や行動が制限され、あるいは制限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差別されて、不公平だ、不快だと感じることもあるだろう。またこのような表現や行動を学習者に押し付けることに抵抗を感じる教師もいるだろう。

社会に位置づけられた規範を無自覚に受け入れることに疑問を持ち、ことばとジェンダーの関係の中から私たちの置かれている社会と男女のあり方を問い直す姿勢が、視聴覚教材にも求められている。多くの写真が同じような意識の基に作られており蓄積された集合体となっているため、このシリーズ全体が学習者や教師に与える男女の社会的関係の印象は極めて大きい。今回は写真パネルを量的に分析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傾向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しかし数字の多少だけで、差別の度合いが大きいか小さいかを判断することは勿論できない。一枚一枚の中に含まれている男女の社会的関係には、性役割分業という言葉では片付けられない多くの意味が込められている。

人は性別、年齢、人種、国籍、出身地、職業など様々な背景を持つ。これらの要素は密接に、また複雑に作用し合いながら人間関係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そして私たちが相互に情報の送り手、受け手となり社会の構成員と

なる時、言語は人と人との関係を築く大き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ると言えよう。

中村（2011）は「言葉を使う行為（ディスコース）」を、文より大きな単位の相互行為であり、「主語 - 動詞 - 目的語」のような抽象的な「言語体系」ではなく言語の使用者（参加者、話し手、聞き手）の関係（上下関係、親疎関係）、場面の公私（儀式かおしゃべりか）その言語使用の働き（情報伝達かあいさつか）を分析に含む社会構造を反映するものであり、我々の知識、人間関係、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構築する社会的実践である（例えば、上司に敬語を使うことが上司と部下という上下関係を再生産するなど）という二つの特徴を示した。⁶そして、言葉を使うことを構築主義の視点から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従来『ことば』は私たちが情報や考えを伝達するための『道具』のように考えられてきた。（中略）しかし、研究が進むにつれて、構造をあきらかにするためには、『ことば』が使われている社会を考慮する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きた。どのような状況で、誰が誰に対して、何の目的で使ったかがわからなければ『ことば』の意味さえ説明できないのである」⁷

人はことばを通じ社会に影響を与え、また与えられながら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や権力関係を作ってゆく。ジェンダーがことばによって作られ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や支配関係を映す重要な構成要素であることは先行研究においても指摘されている。

今後は、言葉は相互の関係を築く社会的行為であるという観点から、教材を完成されたものとして無自覚に使用しないために、取り扱った写真パネルの質的分析を進め、教授者と学習者が批判的に教材に向かい合う視点を築く一助としたい。

¹ 石田敏子『日本語教授法』（1996）大修館書店 pp256-257

² 前掲 pp258-259

³ 国際交流基金日本語国際センター『日本語教育用「写真パネルバンク」』（2000）日本出版貿易「V．日常生活シリーズ」解説書前書き p 1

⁴ 厚生労働省平成 15 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
 〈<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k-tyosa/k-tyosa03/index.html>〉

（アクセス：2010 年 10 月 15 日）

⁵ 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平成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律第七十八号）
 我が国においては、日本国憲法に個人の尊重と法の下での平等がうたわれ、男女平等の実現に向けた様々な取組が、国際社会における取組とも連動しつつ、着実に進められてきたが、なお一層の努力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る。

一方、少子高齢化の進展、国内経済活動の成熟化等我が国の社会経済情勢の急速な変化に対応していく上で、男女が、互いにその人権を尊重しつつ責任も分かち合い、性別にかかわらず、その個性と能力を十分に発揮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男女共同参画社会の実現は、緊要な課題となっている。

〈前文抜粋〉

-
- ⁶ 中村桃子『ことばとジェンダー』（2001）勁草書房 pp52-53
⁷ 前掲 pp ii - iii

参考文献

- 石田敏子（1996）『日本語教授法』大修館書店
遠藤織江（2005）『女とことば』明石書店
クレア・マリー（2003）「言語とジェンダー」
『AERA Mook NO.78 ジェンダーがわかる』朝日新聞社
国際交流基金日本語国際センター（2000）
『日本語教育用「写真パネルバンク」』日本出版貿易
壽岳章子（1979）『日本語と女』岩波書店
中村桃子（1997）「女はことばによって作られる」
『AERA Mook No.30 日本語学のみかた』朝日新聞社
中村桃子（2001）『ことばとジェンダー』勁草書房
日本語ジェンダー学会（2006）『日本語とジェンダー』ひつじ書房
Eckert, Penelope, and Sally McConnell-Ginet (2003) *Language and gender*.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Robin Tolmach, and Mary Bucholtz (2004)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
Text and commenta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総合大学における第二外国語としての 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

A Report on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s Universities

韓 冰 (Han Bing)

上海電機学院 外国語学院講師

College of Japanese, Dalian University, Lecturer

江 春華 (Jiang Chun-hua)

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語学院講師

College of Japanese, Dalian University, Lecturer

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eaching Japa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main purpose is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henceforth,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and point out the problems. Moreover, it proposes a direction for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ith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economies of East Asia,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is experiencing a boom in China. But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rate of graduates, universities have excessively enlarged the scale of Japanese-language departments. As a result,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en initiated withou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aims. Secondly,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an effective education and a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of the students because of a stress on “quantitative education”. Thirdly,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becomes a means of satisfying the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JLPT). Fourthly, the curriculum has not been efficiently designed for the bachelor course. Fifthly, specialty and Japanese-language are separated.

Therefore, the direction of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reforms should be as follows: setting flexible educational aims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each college; developing a sense of unity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by communicating face to face, and changing from “quantitative education” into “qualitative education”;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education method; converting to language education that values culture; and improving the specialty. The direction is an idealistic theory to the end. To realize it, we

should compare the current state of each university. The concrete method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ill be the subject for a subsequent study by the author.

はじめに

グローバル化が進み地域経済が発展する中で、中国において日本語人材に対する社会的ニーズが高まっている。同時に、中国の大学教育においてもかつてない「日本語ブーム」が続いている¹。

中国の総合大学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活性化に伴い、日本語教育分野における研究も活発化を見せている。しかし、この分野の研究を見渡すと、学士課程における日本語専攻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がほとんどであり、第二外国語としての日本語教育（以下「2外日本語教育」と略称する）についての研究はまだ少ないのが現状である。特に、総合大学の学士課程における2外日本語教育の研究はほとんどないと言っていいほどである²。

本論文は総合大学における2外日本語教育に焦点を合わせている。まず、総合大学における2外日本語教育の概念を明確化し、そしてその問題点を洗い出し、最後に改革のあるべき方向を提示しておきたい。

1 総合大学における2外日本語教育の問題点

1.1 2外日本語教育の概念

グローバル化（Globalization）が進み、英語教育（第一外国語教育）の必要性が声高に語られている一方で、ローカリゼーション（Localization）の発展に従って、初修外国語（＝英語以外の第二外国語）教育に対するニーズが多様化している。東アジア地域経済の邁進につれ、日本語人材に対する社会的需要が高まり、それに応えるように、中国の大学での日本語学科の設立は年々増える傾向がある。統計によると³、中国の大学の内、2007年までに265校が日本語学科を設けており、2008年度には新たに26校が教育部に日本語学科設立を申請している。そのような現状の中で、日本語教育も多様化している⁴。

劉・喬・韓（2008）によれば、中国の大学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①外国語としての日本語専攻、②一般外国語教養（高校に引き続き、日本語を学習する、現在では通称「大学日語」）、③第二外国語、④日強班（副専攻として日本語を強化するコース）の4つに分け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そのような分け方は一つの分類の仕方であろうが、問題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例えば、②の一般外国語教養、または一般教養外国語教育については普通、第二外国語を指している。ここで言う、高校に引き続き「大

学日語」を学習する学生たちは、日本語を第一外国語に位置づけるか、それとも第二外国語に位置づけるかははっきりしていない。また、④の日強班は、ソフトウェア学部や機械学部などの学部で設けられるコースであり、これらの学部は科目の関係で普通、英語を第一外国語として位置づけている。ここで言う日本語を副専攻とする日本語強化コースは、日本語をどう位置づけるか、なお教育目標に沿って、議論する余地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本論では外国語教育を第一外国語教育と第二外国語教育に分け、日本語専攻以外の日本語教育を第二外国語教育として位置づける。そ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語学科の中の日本語専攻以外は、すべて研究の対象となる。

1.2 総合大学における2外日本語教育の問題点

1.2.1 教育目標の欠如

中国の総合大学においては、就職率が大学、学部を評価する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る。学科の設立やコースの編成は市場主義に左右されやすい。良く言えば、社会的ニーズに適した学科の設立であり、悪く言えば、教養たる教育ではなく、市場たる教育である。

近年「日本語ブーム」が続いている理由は、就職に有利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ほかならない。多くの日本企業があらゆる形で中国に進出し、日本語人材の需要が一気に高まったのである。その波に乗った中国の大学は、日本語学科を新設したり、日本語教育を多様化したり、あらゆる可能性を手探りしている。例えば、「機械＋日本語」、「ソフトウェア＋日本語」、「看護師＋日本語」など、各学部で日本語教育をあたかも第一外国語教育のように位置づけている。本来それらの学部での外国語教育は、学科科目の関係上、英語を第一外国語とすべきである。しかし、多くの大学はむやみに日本語教育の規模を拡大し、むしろ日本語が上座に居座ることになった。

それは大きな問題ではない。英語に取り替わる日本語で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と反論されるかもしれない。問題は教育目標がはっきりしないまま、むやみに日本語教育を開講し、教育成果が上げられないことである。どんな人材を育成し、どんな能力を養成し、どんなカリキュラムを編成すべきか、議論をせずに、ただ開講すればいいというのは本末転倒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1.2.2 質的教育の欠如

教育の結果から言うと、本当に効果的な教育であるのか、質的な向上ができたのか、必ずしも教育目標が達成したとはいえない。本来外国語教育は少人数クラスでの学習が望ましい。しかし、各学部は就職率を上

げるため、学生に必修科目として、日本語を勉強させている。日本語学科も各学部の要望に応えるために、もともと教師の人数が少ない日本語学科から教師を派遣するなど、言うまでもなく物理的な無理を生じる⁵。その解決は、物理的な問題が解決しない限りほとんど不可能であろう。結局、一人の教師に多くの学生という現象が生じる。多いところでは100人を超える学生が聴講しており、教師さえもそれは外国語教育かと疑ったりもする。

「量的教育」は、「多量生産」でコストは抑えたものの、「品質」は使い物にならないほど「不良品」が多い。

1.2.3 標準化の欠如

教育目標が欠如のまま、教育に当たると、当然多くの問題が生じる。標準化の問題がその一つ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はただ初級、中級、上級レベル的に分け、テキストを選別し、年級別に教えればいい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であろう。多くの学部から日本語能力試験 2 級の合格をあたかも目標のように立てているが、ほとんどの授業は試験対策に追われてしまい、外国語教育と呼ばれるまでほど遠い。

1.2.4 一貫性の欠如

教育目標が欠如のまま、もちろん教育の一貫性が保てるわけがない。学士課程四年間のカリキュラムを効率よく配分し、効果的な教育をするのは当たり前の話である。しかし当たり前のことすらできないのが現状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また、教育方法も一貫性が欠如している。どんな段階でどんな教育方法が適しているのか全く議論されてい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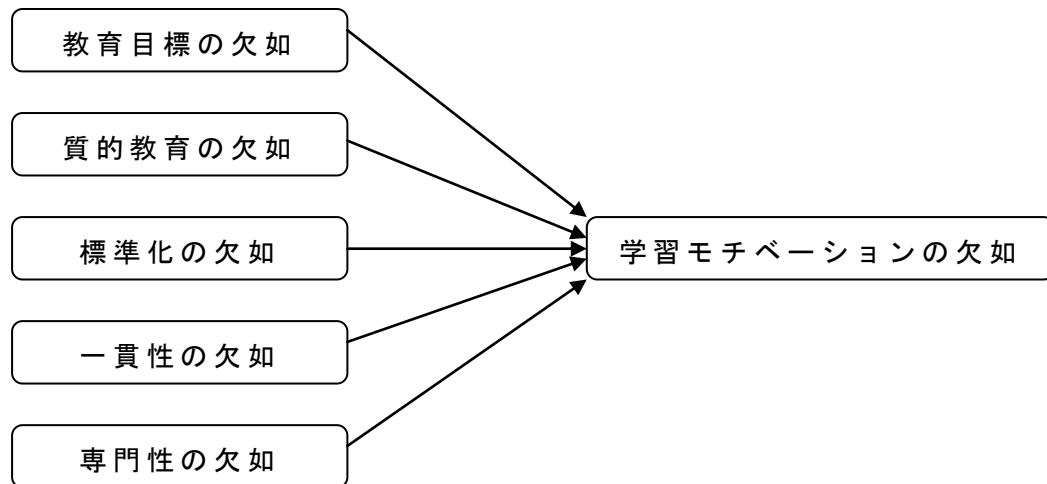
1.2.5 専門性の欠如

各学部は自分なりの専門を持っている。日本語教育の場合はほとんど専門に関わらず、語学教育が中心になっている。それも教育目標欠如の問題の表れである。「専門＋日本語」であれば、専門を活かせる日本語教育が望ましい。専門と日本語が切り離されれば、教育の効果が半減するであろう。

以上に挙げる問題点のすべては教育目標の欠如がその根源になっている。その悪影響としていろいろな問題が遍在しているだけである。そして、それらのあらゆる問題の帰結は学生の学習モチベーションの低下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まず、教育目標がないまま、学生が専門知識を身につけるにはただ日本語能力試験 2 級に合格すればいいという目標になる。日本語能力試験 2 級にどんな日本語能力が要求されるか分からずに、試験勉強に追われる。その結果、なかなか合格率が上げられない。もし運がよくいざ合格すると安心して勉強しなくなる。また、「量的教育」はなかなか学習効果が上げられず、多くの学生は途中で挫折してしまう。そして、標準化、一貫性の欠如は学生にとって、学習地図が見えず、学

学習意欲が喚起されない。最後に、専門性の欠如は学生にとって一体将来何に役に立つか理解されず、自分の将来の姿が見えない。昔日本語をかじったことがあるだけではなかなか学習意欲が持ちにくいであろう。図1はそれらの問題点と学生の学習モチベーションの関係を表している。

図1 総合大学における2外日本語教育の問題点と学習モチベーション



出所：著者作成

2 総合大学における2外日本語教育改革の方向性

2.1 教育目標の確立

2外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従来の「話す」、「聞く」、「読む」、「書く」、「訳す」という五つの基本技能だけでは物足りないだろう。外国語教育の基本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円滑化することであ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円滑化には、言語能力のみならず、異文化理解、社会的コンテクストの習得も必要であろう。そして、言語能力と文化的知識の到達目標を段階的に立て、学習効率を上げるカリキュラムの編成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あろう。

以上は一般論だが、各学部コースの特徴に合わせて、柔軟に教育目標の設定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われる。例えば、ソフトウェア業界において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ほとんど専門用語で行われ、専門用語が分からない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ならないほどである。そうすると、専門用語の教育は早い段階で導入し、教育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看護師業界においては、人間として温かみの溢れ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重要となる。そうすると、社会的コンテクストに対する理解などの文化的なファクターが決め手となる。

したがって、教育目標の設定は一律ではなく、コンティンジェンシー的に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あろう。

2.2 質的教育への転換

全学生に一律の必修単位という学習内容を課す従来のやり方を改め、量から質への転換を図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興味を示す学生を引きつけ、少人数の学級で教育に当た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少人数制外国語教育は学習効率があげられるだけではない。少人数の一对一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学生の間一体感を喚起し、信頼関係を成し得る。それは語学勉強の大きな心理的要素であり、教師にとって信頼関係の結びつきも大きな教育目標であろう。

また、効率的な面から見ると、外国語の勉強は「その日勉強したものはその日使う」のが基本である。少人数のクラスは、学生の積極性を十分に引き出すのに適している。その場で質問し、その場で答える。その場で教え、その場で応用する。それらの双方向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なお効率の良い外国語教育ができるであろう。

劉・喬・韓（2008）によれば、少人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いては、CA（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アプローチ）が適応しやすい。「CA は概念シラバスや機能シラバスを取り入れ、教室活動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中心主義を特徴とする。言語を場面や文脈に結びつけながら実際の伝達能力を養成する教授法である。実際の教室活動でもできるだけ現実の場面に近付け、どんな場面で、どんな言い方をして、どのように目的を達成するかを考える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る。具体的にはタスク、ロール・プレイ、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など現実に近い形態の練習を行い、学習者中心の授業も特徴としている。」⁶

2.3 標準化・一貫性への転換

標準化とは学士課程における2外日本語教育の一貫した教育カリキュラムを整備することであり、初級から上級に至る授業水準の明確化と体系化を図ることである。一貫性とは意欲のある学生が四年間を通して体系的に学ぶことができる環境を整備することである。すなわち、それは意欲ある学生が、所属学部の範疇を超えて、卒業要求単位数を超えて、日本語を第二外国語として履修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体系化することである。

標準化には二つの要素が含まれるが、一つはカリキュラムの標準化、もう一つは教育方法・アプローチの標準化である。

カリキュラムの標準化は、学士課程の四年間において一貫したカリキュラムを充実させるだけではない。初級、中級、上級においても段階づけて、精選された教育課程を通じて、授業の標準化を明確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教育アプローチの標準化とは教育方法を統一することである。現代の外国語教育から見渡すと、従来の文法中心から会話中心へ転換している。

それは従来の歪みを修正する動きであり、決して会話中心の外国語教育に偏っ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われる。

初級、中級においては、伝統教育に回帰することを提唱したい⁷。「話す」、「聞く」、「読む」、「書く」という四つの基本能力をバランスよく配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四つの基本能力の支えとなるのは、やはりベーシックコースでの文法の教えであろう。それゆえに、ベーシックコースでの教育は、会話+文法という両輪をうまく作動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われる。要するに、基礎をしっかりと教えながら、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も養うという目標が望ましい。文法は「読む」、「書く」の基本能力を大きく左右するので、ベーシックの段階でしっかりと教え込む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伝統的教育方法への回帰は、AL（オーディオリンガル・メソッド）の復活を意見するであろう。劉・喬・韓（2008）によれば、AL は構造言語学に基づき、言語は科学的に分析、記述でき、言語の習得は習慣形成によって獲得するものであるとする⁸。AL はたびたび批判されながらも、2 外日本語教育に欠かせないと考えられる。

CA、AL アプローチはどちらが優れている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学習段階に応じて使い分けるべきであろう。初級、中級においては、AL 中心のアプローチが適しており、上級においては、CA 中心のアプローチが適しているというシナリオが考えられるであろう。

2.4 言語「文化」教育への転換

2 外日本語教育は「語学」教育から言語「文化」教育へ転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言語と社会との関係は切り離せない。外国語教育においては、発音、語彙、文法などの言語的な知識以外に、社会的、文化的場面（コンテクスト）の中で、発話を行う時、その発話が妥当かどうかを判断す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が求められる。限りなく自然な外国語を発話するのは並大抵なことではないが、そのような能力を養成するには、社会的コンテクストを理解する必要がある。たとえ理解できなくても、せめて知っておくことが大事であろ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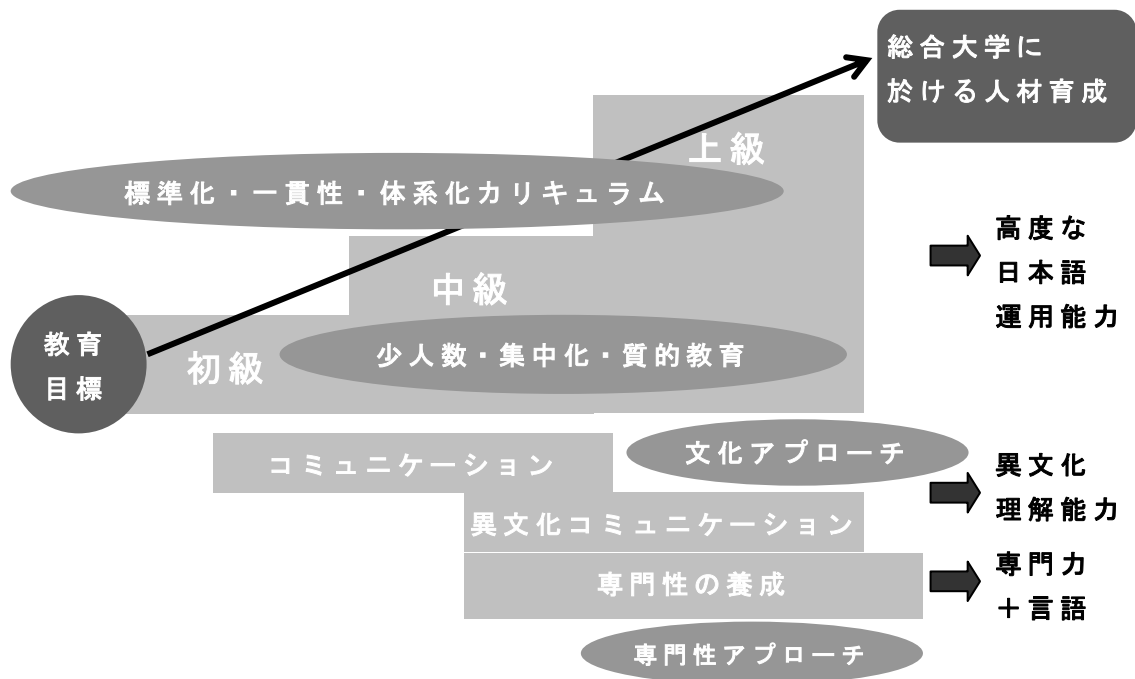
2.5 専門性への転換

「語学」教育から「専門+日本語」教育へ転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総合大学にふさわしい外国語教育の理念は、それぞれ創造的な、個性的な「自分」を作り上げることであろう。各学部の専門に結びついたオプショナルな日本語教育は、学生にとって自分のキャリア・パスを広げることであり、学習モチベーションが高められる。しかし、「専門+日本語」教育をこなすには、高い壁を乗り越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専門に精通し、日本語が分かる教師という人的資源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解決のためには各学部と緊密に連結し、効果的に専門科目を日本語教育の中に織り込んでいく必要がある。

3 総合大学における 2 外日本語教育改革の展望

以上の議論を踏まえ、図 2 は総合大学における 2 外日本語教育の方式をモデルとして提示したものである。

図 2 総合大学における 2 外日本語教育のモデル



出所：著者作

このモデルの中に 6 つの基本要素が含まれている。すなわち、①「教育目標」、②「標準化・一貫性・体系化カリキュラム」、③「少人数・集中化・質的教育」、④「高度な日本語運用能力」、⑤「文化アプローチ」、⑥「専門性アプローチ」である。

このモデルの特徴は各学科の特性に応じて、コンティンジェンシー的に考えることである。以上の 6 つの基本要素のうち、①、②、③は「不変的要素」である。すなわち、どの学科においても、それらを確立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要素である。④、⑤、⑥は「可変的要素」である。すなわち、各学科の特性に応じて、柔軟に編成できる要素である。例えば、ソフトウェア学科を中心とする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てみよう。

第一に、教育目標の明確化。すなわちどんな人材を育成するのかを明確にすることである。ソフトウェア学科を中心と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場合、もっぱらソフトウェア開発に従事する人材の育成では物足りない。中国と日本のビジネスの現場で、ある程度の日本語を駆使し、高い専門的能

力と知識を持って、架け橋になれる人が望ましい。そうすると、「可變的要素」の優先順位がおのずと決まってくる。「⑥→④→⑤」となるであろう。

第二に、標準化・一貫性・体系化カリキュラムの確立。教育目標が明確化し、「可變的要素」の優先順位が決まってくると、それらに対応するカリキュラムの編成を細かく織り込んでいく必要がある。ソフトウェア学科の場合は、早い段階で専門用語を駆使する日本語の学習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

第三に、質的教育への転換。高い専門的能力と知識を持ち、中日間のビジネスに従事する職種の適性としては、高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を備えることであ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の養成に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科目を設立するより、少人数で一对一の授業を通じて能力を養成したほうがよほど効果的である。

以上は、モデルの中心となる「不變的要素」にいか「可變的要素」を織り込んでいくか、ソフトウェア学科の例を中心に簡単に説明したものである。もちろん、モデルを適応するには、具体的な、きめ細かな研究、検証が必要であろう。

まとめ

本論は総合大学における 2 外日本語教育の問題点を明らかにした。そして、その改革の方向性を私見としてモデル化してきた。さらに、そのモデルの適応において、ソフトウェア学科を例にとり、その具体案を提示した。もちろん、本論で提示した改革の方向性はあくまで理想論であり、実現するには恐らく各大学の現状に照らし合わせ、対応を図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あろう。また、本論は改革の方向性しか示しておらず、具体的な道筋は今後の課題として研究していきたい。

注釈

¹ 宿久高（2008, pp7-8）は、「日本語ブーム」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ここ 20 年、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急速に発展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周知のとおりである。調査による正確の数字ではないが、最近の情報によると、学部生教育だけでも日本語教育機関として日本語学科を設置した大学は今年までで 358 大学にも昇り、教員数は 3000 人、学生数は 17 万人を超え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いる。日本語人材の需要量が増える一方であり、「日本語ブーム」が続くことは中国の大学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活性化をもたらしている。」

² 先行研究を見渡すと、日本語教育と言え、ほとんど学士課程の日本語専攻に焦点を合わせている。例えば、宿（2005;2008）、修剛（2008）などが挙げられる。また、近年社会的に日本語人材の需要が増えるに従って、「専門＋日本語」コースの設立が目立っている。すなわち、何らかの「専門＋副専攻としての日本語」強化コースである。それらの議論については（劉・喬・韓、2008）が挙げられる。さらに、総合大学の学士課程における日本語専攻の研究は、宋（2005）が挙げられる。

-
- ³ 朱建華（2009）、「今年高校新增专业透析」、『中国教育報』、2009年1月21日。
⁴ 詳しくは、宋（2005）を参考にされたい。
⁵ 総合大学においては、専門学科の設立が重んじられ、外国語教育は重要視されていない。あくまで副専攻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る。英語はともかくとして、日本語のような世界共通言語ではない言語においては、規模の拡大は許されない。
⁶ 劉・喬・韓（2008）、p.677。
⁷ 詳しくは宿（2008）を参考にされたい。日本語人材、使い物になる深みのある日本語を身に着けた人材を育成するには、伝統的な学習方法、指導方法こそ改めて重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
⁸ 劉・喬・韓（2008）、p.677。

参考文献

1. 修剛（2008）「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改革—日本語専攻を中心に」、『日本語言文化研究 第三輯』（宋協毅主編）、大連理工大学出版社、13 - 25
2. 宿久高（2005）「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発展と課題」、『日本語言文化研究 第二輯』（宋協毅主編）、大連理工大学出版社、20 - 31
3. 宿久高（2008）「日本語教育改革と伝統への復帰」、『日本語言文化研究 第三輯』（宋協毅主編）、大連理工大学出版社、7 - 12
4. 宋協毅（2005）「総合大学におけるマルチ型日本語人材育成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語言文化研究 第二輯』、大連理工大学出版社、549-561
5. 劉玉琴・喬国鈞・韓蘭靈（2008）、「日本語学習の強化コースのデザインについて—大連理工大学ソフトウェア学院日本語強化班を例に—」、『日本語言文化研究 第三輯』（宋協毅主編）、大連理工大学出版社、675 - 686

香港におけるピア・ラーニングの実践 ー大学及び生涯学習機関での取り組みー

An Observation of Peer Learning in Hong Kong: Cases in a University Class and a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

水戸淳子 香港大学日本研究学科 Language Instructor
MITO Atsuk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Language Instructor
瀬尾匡輝 香港大学專業進修学院 学院助理講師
SEO Masak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PACE,
College Assistant Lecturer

Abstract

Ikeda and Tateoka (2007) defined peer learning as a way in which learners learn from their peers through dialogues. They also considered collaboration among peers as a key concept in such learning. Murphey (1996) proposed “Near Peer Role Models”,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learners are highly motivated to learn from their peers if they have similar backgrounds such as ethnicity, age, gender and interests. However, Tanaka (2006) reported that Chinese learners tend to have a firm belief that languages should be learnt from the native speakers or learners of higher level. Based on these discoveries, this paper reports two cases of peer learning practices in Hong Kong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implications of such practices in this setting. Firstly, a peer-learning activity in a university class is reported, in which students created their own original Haiku and presented them in class followed by Q&A sessions and other commenting activities.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peer learning which took place in such activities and discuss its merits by analyzing the students’ dialogues. Secondly, the paper reports on a practice in a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 in which the students discussed social issues as depicted in Japanese movies and dramas. The authors determine how the students stimulated and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through data-analysis of classroom discussions and weblogs. Lastly, the points that appeared important in these two practic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possibilities and implications of such activities are discussed.

1. はじめに

池田・舘岡(2007)はピア・ラーニングを「学習仲間(peer)同士で学びあう学習」と定義し、対話を通して学習者同士がお互いの力を発揮して協働的に学ぶ学習方法とした上で、その目的は、「作文や読解などの課題を遂行するという狭い意味での学習の目的」だけでなく、「仲間といっしょに学ぶことによって人と人との社会的な関係を築くことを学び、さらには自分自身というものに気づき自分自身を発見していくという広い意味での学習の目的」(p. 51)があると述べている。また、そこで起こる学びを、学習活動の主体である学習者を中心にし「学ぶ対象(学習課題)」「他者」「自己」を角とする三角形で捉え、学習者が学習課題を勉強することだけに留まらず、他者との対話による「学ぶ対象」への理解深化・拡張、および他者理解、内省を通じた自己理解が「スパイラルとなって進化する」(p. 63)ものと捉えている。

一方でこういった学習活動には学習者の言語学習における信念や信条といったビリーフの問題が絡むことも指摘されている。ピア・レスポンスを実施し、ビリーフ調査を行った田中(2006)は中国人学習者が教師(または日本語が上手な仲間)に教え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意識が強い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その一方で、Murphey(1996)は Near Peer Role Models(NPRM、自分と社会的経験や地位、職業、年齢などが近い模範的な存在の重要性)を提唱し、学習者の社会的経験や地位が近ければ近いほど、お互いに刺激し合い学べると述べている。このように、ピア同士の学びをめぐるは、様々な議論がある。

本稿では香港の大学及び生涯学習機関でのピア・ラーニングの実践を報告し、ピア・ラーニングの有効性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い。大学における実践からは、創作俳句を題材に行った発表活動を中心とした取り組みを報告し、ピア・ラーニングのメリットがどのように現れていたかについて検討する。また、生涯学習機関における実践からは、上級日本語コースで映画を使い社会問題を取り扱った活動を紹介し、学習者の対話の分析から、どうお互いに刺激し合い学びあったかを報告する。

2. 大学における、発表活動を中心に設計したピア・ラーニング

香港大学日本研究学科での「Productive Skills」という授業の一環として行われた創作俳句の発表を中心とした取り組みを取り上げる。この授業の対象は、初級後半の学習者で、理解・使用可能な日本語が増えてきているものの、教師の「足場掛け」環境下での日本語使用に慣れており、また教室外での実際の日本語使用がほとんど／あまりないという背景を抱えている。筆者はこのような背景を鑑み、教師の「足場掛け」が減らされた環境下で、学習者が教室内での実際の活動に参加する中で、教師からではなく、学習者同士で学び合える協働学習活動の設計を試み、発表活動を中心とした授業を実施することにした。

発表の題材として創作俳句を選んだ理由は、①この活動に入る前の日本語の音声についての実践的な練習の中で、リズム練習の題材として俳句を使用していたことと、②俳句は個人の経験、見方、感性に基づいた「縮約された文学作品(徳井

1997)」であるため、その世界を共有するために闊達な言葉のやりとりが引き起こされるだろうというねらい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

2.1 創作俳句発表活動

以下の流れで行った。【 】は学習活動の単位を示す。なお、このクラスの人気は 20 名であった。

<準備の活動：発表前>

- ①【グループ】教師が用意した資料にある俳句・短歌・川柳¹について、4～5名のグループでピア・リーディングを行い、詠われている内容やその良さ、面白さについて確認し合い、また、疑問点についてグループでまとめる。
- ②【クラス全体】疑問点について共有化し、教師からもフィードバックをもらい、紹介された歌についての内容や鑑賞のポイントを確認する。
- ③【グループ】資料にある俳句・短歌・川柳の中から、自分が好きなものを1つ選び、グループ内でその理由も含めて発表し、仲間からフィードバックをもらう。
- ④【個人(宿題)】発表用に、自分の俳句を創作し、その背景・説明についても150字～200字程度にまとめて書く。また③で発表したことも記述化する。
- ⑤【教師とのセッション】④で書いたものの内容を教師と確認し、フィードバックをもらう。また、口頭発表練習も行い、音声的な面からのフィードバックももらう。
- ⑥【クラス全体】発表後のQ&Aの準備として、発表者への質問の仕方、司会進行の仕方を練習する。
- ⑦【個人(宿題)】発表の練習

<発表活動>

- ⑧【クラス全体】発表活動：発表者は自分が創作した俳句およびその背景説明を発表する。発表後、Q&Aを行う。司会も学生が交替で行う。発表活動後、クラス全体で振り返りを行う。

<発表後の活動>

- ⑨【個人(宿題)】発表原稿がまとめてある創作俳句集(教師が準備)を受け取り、それらを読み、発表者各人へコメントを100～200字程度にまとめて書く。
(⑨は学習者と教師とのメールでのやりとりの後、教師が編集し、「～さんへのコメント集」として各人へ送付される)
- ⑩【個人】発表者はそれぞれ、⑨(自分宛にクラスの全員から送られたコメント集)を読む。

①から⑩の学習活動の内、④⑤⑥⑦を除いた残りの活動の中では何らかの形でのピア・ラーニングを意図した。①～③はグループの中での活動であり、後半、クラス全員の前で発言・発表するためのリハーサル的な意味合いがある。また、これらの一連の学習活動は、学習者が「やりとり」「聞く(独話)」「話す(独話)」「読む」「書く」の5技能を総合的に活用できるように構成した。なお、⑧の発表はク

ラスの全員が順番で行い、Q & Aを含めた時間は1人約5分であった。また、教師は、発表活動時は、司会も学習者達に任せ、タイム・キーパーの役割だけを行い、Q & Aでは他の学習者と同じように質問もした。

2.2 仲間との相互作用のメリット

池田・舘岡(2007)は「仲間との相互作用による学びのメリット」として、「リソースの増大」「相互作用による理解深化」「情意面から見たメリット 社会的関係性の構築と学習への動機づけ」の3つを挙げているが、実際の場面ではこれらが「同時に複合的にあるいは連続的に」(p. 57)参加者の間で起き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リソースが増えたり理解が深まったりということが同時に、あるいはある面が別の面を引き出しながら、たえざる相互作用の中で交換されているプロセスそのものがピア・ラーニング」(p. 60)と述べている。

ここでは、発表活動以後の⑧⑨(⑩)の活動について、上記の3つのメリットがどの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たのか、仲間同士のやりとりの全体のダイナミズムを視野に入れて見てみたい。

以下の資料Ⅰ(活動⑧の音声データの書き起こし)と資料Ⅱ(活動⑨で学習者が書いたコメント)は、学生Aさんの発表についてのデータの一部である。

資料Ⅰ (活動⑧の発表時の書き起こしデータ)

Aさん： (省略)…私が創ったのは、「人生で 最も幸せ 夢がある」です。先日日本の人気ドラマ、「ルーキーズ」を見ました。「ルーキーズ」は熱血新人教師の話です。高校の野球部の部員たちが甲子園を目指す夢に向かうのをその先生が全力で助けるという学園ドラマです。そのドラマを見て、感動しました。本当に夢を目指して頑張るのは大変ですが、夢が実現できたら、嬉しいです。「人生で 最も幸せ 夢がある」はそんな気持ちを表しています。以上です。

Bさん(司会)：質問はありませんか。

Cさん： Aさんの夢は何ですか。

Aさん： えー、私の夢は、自分の会社をできます…、作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Dさん： どんな会社ですか。

Aさん： もしお金があったら、アパレル④…、ファッションの会社が欲しいです。子ども[の時]からきれいな物が好きですから。

(途中省略)

Eさん： すみません、さっき、ちょっと言ったの、アパレル、アパレルファッション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Aさん： ああ、アパレルは、英語で apparel です④。

Fさん： 難しい！

Gさん： apparel?

Aさん： ええ！服やアク…、アクセサリという意味です④。

Hさん： ああー。

(以下、省略)

[] 内：筆者による加筆

資料Ⅱ（活動⑨(コメント集)）

・わたしはAさんの発表を聞いて、とても感動しました。人生に夢があったら、勇気も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そして、夢を実現するために、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そうすれば、人生も意味があるでしょう？また、Aさんの話を聞いて、わたしも元気になりましたよ。（Iさん）

・Aさんの作った俳句にみんなも共感すると思います。子供のとき、教師になりたかったです。でも、今の夢は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ることです。夢を実現するために、今一生懸命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Jさん）

・私も夢があります。夢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いろいろな準備をしています。でも、人生ではときどき問題が起きるので、あきらめたくなる時もあります。でも、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Kさん）

まず、「リソースの増大」についてだが、リソースを広義に捉えれば、互いが発表したもの・書いたもの全てが互いにとってのリソースになっている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活動⑧⑨での仲間による産出物全てがリソースだと言う事もできるが、リソースを狭義に捉え、それを日本語の知識として見るなら、資料Ⅰの④にあるような、語彙についての知識の増大が⑧⑨の活動データから多く探し出すことができた。

「相互作用による理解深化」は、資料Ⅰの一連の学習者同士のやりとり、資料Ⅱのコメントにあるように、お互いがお互いに興味を持って、質問したり、働きかけたり、自分のことについて伝えたり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これらの活動において促進され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また、資料Ⅱにあるように、これらの活動が、自分についての内省・自身についての理解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ることもうかがえる。

「社会的関係性の構築と学習への動機づけ」については、活動後にフォローアップ・インタビューなどをしていないので、直接的なデータはないが、⑧の発表活動において、出てきた分からない語彙や表現についてクラス全体で助け合う場面が多く見られ、また、活動⑧⑨(⑩)での相互理解から、クラスメートとの関係性がより深くなったと推測できる。また、資料Ⅱは、発表者の「夢」についての発表に対してクラスメートから返されたコメントであるが、「私も頑張ります」という内容のコメントなどから、学習への動機付けが高められたことも感じ取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ように、これらの活動では、お互いがお互いの学習のリソースになりながら、相互理解・自己理解が相互に誘発されるサイクルになっており、池田・舘岡(2007)が指摘する「仲間との相互作用による学びのメリット」が豊富にある活動であった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

2.3 まとめ

今回の活動では、個人の差はあるが、全体的に活発な言葉のやりとりが交わされていたと思われる。以下の点が功を奏したように思う。

- ① クラス全員の前で発表する活動の前に、グループでの発表活動を行った
これにより、学習者は心理的に準備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ように思われる。

- ② 発表後のQ & Aとともに、その後、発表原稿を見ながらコメントを書く形で、発表者へフィードバックする機会があった

聞き取りやすぐに質問やコメントを考えることが苦手な学習者も、その後、書かれた物を見て、じっくりコメントを考えて書くことができた。

- ③ 題材を創作俳句にした

俳句は、発表者個人の経験や見方に基づき感性で表現する作品であるので、オリジナリティが高く、また、縮約された言葉で表されるため、聞く方にとっては、発表者がどんな世界を切り取ったのか知り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強く起き、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活発化された。

今回、データを伴って検証したのは、一連の活動の一部分だけに過ぎなかったもので、今後はフォローアップ・インタビューなども含めて、この活動の中での仲間同士での学びをより全体的な観点から見てみたいと思う。

3. 生涯学習におけるピア・ラーニング

国際交流基金(2008)の調査によると、香港の学習者の多くが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機関以外で学ぶ生涯学習者であるという。これらの生涯学習者の多くは、成人学習者で、会社帰りに趣味の1つとして、旅行目的や日本の大衆文化への興味から日本語を学習している(山口 2003)。成人教育では、従来の学校教育とは異なり、学習者が主体になり、学びたいと思った本人が誰からも強制されることなく学習する(Knowles1968)。そして、教師が一方的に知識や学習内容を提示す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同士あるいは学習者と教師がお互いに対話していく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しかし、米本(2009)は香港の生涯学習者は趣味として日本語を学習し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カリキュラムは日本語能力試験を基準とし、試験に直結しない学習を困難にしていると指摘する。つまり、新しい文型や語彙の導入ばかりが行われ、学習した文型や語彙を使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ということが軽視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こで、筆者は教師が一方的に文型や文法の知識を与える従来の教授法ではなく、学習者と教師が課題を共有し、対話を通して新しい知見を獲得して現実変革を進めていく問題提起型教育(Freire1970²)を行い、学習者主体の教室活動を行った。具体的には、日本映画やドラマを視聴し、そのテーマについて議論した後、ブログを使って学習者同士が対話を深めていった。香港は世界で一番貧富の差が激しいが(国際連合 2009³)、生涯学習機関で学ぶ学習者の多くは生活にゆとりがあり教養として日本語を学んでいることから、学習を通して地域が抱える問題について考えて欲し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った。

3.1 クラスの概要

ピア・ラーニングを実施したのは香港大学專業進修学院の上級日本語コースである。本コースは週1回3時間、1学期20回の合計60時間で構成される。本コースは日本の映画・ドラマを教材として使用し、日常生活のさまざまな場面でよく使われる表現や言葉を学ぶ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それに加え、映画やドラマの主となるテーマについて日本語で議論を進め、地域が抱える問題について考えた。更に、問題改善のために学習者自身に何ができるのか考える活動を行った。視聴した映

画・ドラマは、『アットホームダッド』や『ハンサム☆スーツ』、『ロス・タイム・ライフ』、『ハケンの品格』⁴などコメディタッチのものが多かった。

本コースを受講するためには日本語能力試験 1 級に合格しているか、本学院で日本語を 6 年間（年間 120 時間、合計 720 時間）受講し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かし、実際には学生の日本語能力の幅は大きい。本稿で報告するクラスでは、日本語能力試験 1 級に合格している学生が 2 名で、ほとんどの学生は 1 級を目指して学習している最中だった。また、2 級を目指している学習者も 2 名いた。

受講者数は 15 人で、うち 11 人が女性である。社会人のためのクラスということで、学習者の年齢や職業はさまざまで、下は 20 代後半の会社員から、上は 60 代の孫がいる退職した女性までと幅が広がった。

3.2 実践の手順

コース実施にあたり、まず教師は以下のことを行った。

- ① コースの最初に学習者に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い、視聴したい日本映画・ドラマのジャンル（コメディや恋愛物）を聞いた。
- ② その中からいくつかの映画・ドラマのあらすじを学習者に紹介し、見たい映画・ドラマを学習者の意見を基に選んだ。

以上のことを行ったのは学習者に興味のある内容の映画・ドラマを選んで欲しかったことと、教室内での学習者の権限を大きくしたいと考えたからである。

その後、クラスでは以下の手順で教室活動を行った。本稿では映画『ハンサム☆スーツ』を取り扱った際の実践を紹介する。映画の本編は約 2 時間あり、授業 2 回分（1 回 3 時間、合計 6 時間）を使って映画を視聴し、教室活動を行った。

教室活動：

- ① 映画のあらすじを読み、人物相関図を書く。
- ② ハンサムとブサイク、どちらがいいか話し合い、どうしてそう思うか考える。
- ③ 映画を視聴する。
- ④ 視聴後、映画のテーマは何だったのか考え、話し合う。
- ⑤ テーマを基に、学習者同士が話し合う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トピックを学習者が考える。

『ハンサム☆スーツ』を取り扱った課では以下のことについて話し合った。

テーマ： 人を見ただ目で判断してはいけない

- a、日本人、中国人、フィリピン人に対してどんなイメージを持っているか
- b、香港にいろいろな人に対する経験があるかどうか
- c、偏見を持たれた、差別を受けた偏見があるかどうか
- d、差別・偏見があることについてどう思うか
- e、どうすれば差別・偏見がなくせるのか
- f、私たち自身どんなことができるのか

- ⑥ 上記のトピックを教室のグループ内で話し合う。
- ⑦ 上記のトピックを基に、ブログに自分の意見を掲載する。
- ⑧ お互いのブログにコメントを書く。

教室活動はできるだけ教師の介入を避け、学習者同士が対話できるように設計した。

3.3 学習者の変化

以上の活動を通して、学習者の意識の変革を追った。教室内の学習者同士の発言の書き起こしと学習者のブログの内容を分析した結果を報告する。プライバシーを守るために、学習者の名前はすべて仮名とする。

まず、教室内の最初の話し合いでは、多くの学習者が香港内で生活をしてきたこともあり、人種による偏見や差別を受けた経験が少なく、そういった問題に対してあまり関心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が伺われた。例えば、30代女性の学習者、リサは「差別はないほうがいいです。でも、現実はある。しょう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クラスでの発言、以下クラス）」と言った。ほとんどの学習者は彼女のこの意見に同調していた。最初の話し合いでは学習者は差別や偏見が存在するのは仕方がないことと考えており、人は変わ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それ以上の話し合いには発展しなかった。

しかし、台湾から30年前に香港に移住してきた50代の女性学習者、ジェーミーが、自分の過去を話したことで、学習者の態度が変わり、深い話し合いへと繋がっていった。

私最初香港に来たとき、もし北京語で話したら、しゃべるとき、北京語でぜんぜん「うーん」って、あの、大部分は、私が英語で話すと、全然違います。
（ジェーミー、クラス）

ジェーミーによると香港がイギリスの植民地時代、彼女が北京語を使い買い物すると、相手にされなかったが、英語で話すと店員の態度が変わったという。それに応じて、香港で生まれ育った学習者、ニックが「生まれてイギリス植民地として生きてきたから、香港人は中国より優れているという考え方があった。だから、北京語を話す人はよくなかった。」と発言した。そして、また他の学習者、シンディーは「その考え方（こそ）が偏見や差別（である）」と意見を述べた。

また、授業後にブログ上でも同様の話し合いが行われた。30代男性の香港人の学習者が留学したときに日本の居酒屋で受けた差別について書いた。

私も差別さ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がわかる。バイト先で毎日嫌なことをされて、バカにされて、初めての日にタイムカードのことを全然教えてくれなくて、ほぼ1ヶ月くらいの給料が全然くれませんでした。
（トニー ブログでの発言）

香港人の学習者の多くはドラマ、映画、アニメ、漫画、音楽といった日本の大衆文化の影響からか、親日的であり、授業内で学習者は「日本人は真面目で、礼儀があり、時間を守る（しゅう、クラス）」といった肯定的なイメージを語っていた。しかし、日本に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る学習者の経験を知り、日本人に対する肯定的なイメージが覆されたようである。そして、どんな国でも、「人がいるところなら必ず偏見と差別がある（しゅう、ブログ）」ということを理解したようである。

学習者はお互いに偏見を持った・持たれた経験や差別をした・された経験を教室内外で対話していくことで、自分の知らなかったことに気づき始めた。そして、学習者は「差別や偏見は人間の先天的な一面で完全になく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しかし、私たちは、自分の偏見を認め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民族的、文化的な違いを認識して、受け入れ、当然、差別や偏見などは遠ざかっていくでしょう（アニータ、ブログ）」や「自分の観察と相手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

すると、差別と偏見は少なくなるでしょう（キット、ブログ）」といったように、自分たちに何ができ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始めた。そして、「差別言葉を使わなくしていこう（ジェーミー、ブログ）」や「自分の孫にはきちんと教育したい（アニータ、ブログ）」など具体的に何をすべきなの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始めた。

3.4 まとめ

本実践では、偏見や差別をあまり意識してこなかった学習者が、映画の視聴や教室内外での学習者との対話を通して、意識の変革が行われ、自分たちに何ができるのかを考え始めた様子がうかがえた。生涯学習機関ではさまざまなバックグラウンドを持つ学習者が共に学習している。その中でお互いの考えや意見を共有し、共に社会問題を考え意識の変革を行っていくことで、社会の一員となり、地域の問題を変えていけ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4. 2つの実践からの示唆

これら2つの実践活動は、対象者や内容が大きく異なるものであるが、学習者間の学びを引き出すように授業が設計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が共通点である。

大学での取り組みは、創作俳句という学習者の個人的な経験や見方、感性に根ざした表現作品を発表することを通じ、互いの理解につなげるという活動である。一方、生涯学習機関での活動は、ドラマや映画の内容を議論の出発点として、香港という地域や世界全体が抱える問題についての、対話を通じた理解を目指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まとめると、両者とも日本語を使って、「他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るという共通点が挙げられるだろう。

池田・館岡(2007)は、ピア・ラーニングにおいての教室を「教室という社会の中で他の学習者といっしょにさまざまな実践的な問題解決を行っていく、そういう現実の実践の場」(p. 48)と述べている。教室にいるクラスメートは、「ただ同じ空間にいるだけの人間」なのではなく、お互いにとっての学習のリソースでもあり、対話の相手でもあり、また、日本語を通じて理解する対象でもあり、そして、一緒に世界を発見したり、世界に働きかけたりして未来を一緒に築いていく仲間でもある。このように考えると、母語や地域的・文化的背景、または年齢といった属性が同じクラスメートであっても、刺激し合えないはずはないであろう。2つの実践から浮かび上がるように、学習者一人一人の経験や意見、見方、感性は十分すぎるほど違う。問題は、それらをいかに引き出し、対話して行く仕組み・過程を教室運営者が用意していけるかであろう。

大学での取り組みでは、グループやクラス全体での発表およびQ & A、そして各人に個別にコメントを書く活動を通して、そういった場を提供した。生涯学習機関においては、クラス内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およびブログでの意見交換が対話の場の機能を果たしていた。このように、それぞれの現場に合った形で学習者同士の対話のフォーラム(場)を作り、機能させるということがこういったピア・ラーニングを目指した授業活動には肝心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言えるであろう。

注：

- 1 主に、日航財団が主催している「全国学生俳句大会」「世界こどもハイクコンテスト」、第一生命保険株式会社が主催する「サラリーマン川柳」、東洋大学主催の「現代学生百人一首」などから紹介した。どれも季語を必要としない自由な形のものである。
- 2 Freire(1970)は教師と学習者の上下関係で、教師が一方的に知識を与え、学習者はその知識を受動的に受け入れる従来の「銀行型教育 (Banking Education)」を否定し、学習者同士そして学習者と教師が同じ立場になり、対話を通して共に学んでいく教育が必要だと述べている。
- 3 2009年11月2日『中国時報』の新聞記事から
- 4 『アットホームダッド』(2004) フジテレビ、『ハンサム☆スーツ』(2008)アスクミック・エース、『ロス・タイム・ライフ』(2008)フジテレビ、『ハケンの品格』(2007)日本テレビ

参考文献：

- 1) 池田玲子・館岡洋子(2007)『ピア・ラーニング入門ー創造的な学びのデザインのために』、ひつじ書房
- 2) 国際交流基金(2008)『海外の日本語教育の現状ー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2006年』
<<http://www.jpf.go.jp/j/japanese/survey/result/dl/gaiyo2006.pdf>>
- 3) 田中信之(2006)「中国人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たピア・レスポンスービリーフ調査から話し合いの問題点を探るー」『小出記念日本語教育研究会 論文集』第14号 21-35
- 4) 徳井厚子(1997)「留学生に俳句を教えるー日本語・日本事情教育の中でー」『信州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90号 1-5
- 5) 山口敏幸(2003)「香港における正規学校教育以外の日本語教育活動の概況」日本語教育学会編『海外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活動の概況ー現職者研修活動および学校外活動を中心にして』27-29 <<http://www.soc.nii.ac.jp/nkg/database/2002chosa/02chosa-04f.pdf>>
- 6) 米本和弘(2009)「生涯教育における日本語能力試験の位置づけー香港の生涯教育の事例研究」『2009年度日本語教育学会秋季大会予稿集』159-164
- 7) Knowles, M.S. (1968). Andragogy, not pedagogy! *Adult Leadership*, 16, 350-352.
- 8)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 9) Murphey, T. (1996). Near peer role models. *Teachers talking to teachers* 4 (3): 21-22.

小川譽子美著『欧州における戦前の日本語講座——実態と背景——』

(風間書房 2010 年 1 月 31 日発刊) 定価 8400 円 ISBN978-4-7599-1775-8

徳永光展 (Tokunaga Mitsuhiro)

福岡工業大学社会環境学部准教授

Fukuok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sociate Professor

本書は、ヨーロッパ諸地域における戦前の日本語教育の状況を主として文献資料によって明らかにした史的研究である。

序章 (1~15 頁) では、研究の目的を「日本側の日本語・日本文化講座及び支援の実態、講座推進の目的とともに当該事業の性質について解明し、日欧交流史や日本語講座史における時代的・地域的展開の特徴について論じる」(1 頁) とした上で、「日本人講師に焦点をあて、彼らが教壇に立った講座の実態、すなわち、着任の経緯、待遇、学習者、科目名、授業時間数、教科書などを詳述し、地域的・時代の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3~4 頁) ことと、「日本語講座推進をめぐる様々な諸要因として、対欧文化事業や日本人講師の活動の実態、文化事業をめぐる世界的趨勢、現地側の反応や評価について論じ、日欧交流史における意義や、すでに研究されつつある同時代の諸外国での日本語教育とは異なる枢軸国での日本語講座の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4 頁) ことを目指すとする。研究地域は、日本が日本語講座支援を行ったドイツ、イタリア、オーストリア、チェコ、ハンガリー、ブルガリア、フィンランド (6~7 頁)、時代は「1930 年から 1945 年までの 15 年間」(8 頁) とし、先行研究には「アメリカやイギリスで行われた敵性語教育としての日本語教育」(8 頁)、「欧州の日本研究者らによる各機関の日本研究史」(9 頁)、「戦間期の日本の文化事業に関する研究」(10 頁)、「国際関係論や日欧文化史の分野」(10 頁) での研究、「大正・昭和にかけて日欧交流に携わった知識人の思想や活動を扱う論考」(11 頁)、「日本人講師、日本語講座を扱った」(11 頁) 論考があるが、本書は「日本の文化事業の一環としての日本語講座支援という視点からその全体像を描くとともに、緊張した日欧関係の中で、日欧双方がどのような戦略を持って語学講座に役割を与えてきたかという視点から日本語講座の歴史を俯瞰し、さらに、同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および語学教育全体を俯瞰した場合、顕在化してくる当該時代・当該地域の特殊性について論ずる」(11~12 頁) としている。また、研究方針については、「現在の視点から、まずは、当時の日本語教育が成立また推進された過程と背景を多面的に復元し、冷静に検討すること」(14 頁) に置き、資料は各種公文書に加え「講師の遺族から提供をうけた、当時の書簡、日記、講義録を活用する」(14 頁) と述べる。

「第 1 章 日本語講座開設の背景：黎明期のヨーロッパの戦略」(17~63 頁) では、「第 1 節 日本語講座開設の目的と展開：ドイツの場合」(18~28 頁) で、ライプチヒ大学、ベルリン大

学、ハンブルク大学、「第 2 節 日本認識と日本語講座：オーストリア、ハンガリー、フィンランドの場合」（28～38 頁）では、ウィーン大学、ブダペスト大学、ヘルシンキ大学、「第 3 節 日本語講座の展開と社会背景：黎明期のイタリアの事例」（38～52 頁）では、フィレンツェ王立高等学校、ヴェネツィア王立商業高等学校、ローマ大学、ナポリ王立東洋学校の事例が紹介される。「第 4 節 総括」（52～63 頁）では、ウィーン大学（1843 年）とハンブルク大学（1914 年）における開設の早さが目に付くこと、開設目的は「1. ヨーロッパに持ち込まれた日本語文献の解説、2. 東洋との交易、東洋へ赴任する貿易商や外交官に必要な知識の提供及び通訳者の養成、3. 非ヨーロッパ言語とされる言語の系統の解明」（55 頁）に整理されること、フィンランドの日本語研究を例に取れば、「進化論と結びついた比較言語学によって、その出自までもが非ヨーロッパと刻印を押されたことをきっかけとして始まったとすれば、当該言語を母語とする言語学者にとって、日本語の研究は、自らの出自を学問的に解明するための理論的検証のために必要な一過程であった」（60～61 頁）こと、「20 世紀に入って教壇に立った講師の多くは、長期にわたる滞日経験を有していた」（61 頁）こと、ヨーロッパ圏で日本研究が当時最も盛んだったのはドイツだった事実が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る（63 頁）。

「第 2 章 文化事業としての日本語講座支援と実態」（65～132 頁）では、「日本側が講座支援をはじめた 1930 年以降に焦点をあて、日本人講師の着任の経緯や給与等をもとに支援の実態、さらに講義科目や学習者の実態を明らかにし、地域的・時代的特徴について論ずる」（65 頁）とし、「第 1 節 支援の基盤と概況」（65～69 頁）では、「国際文化振興会（KBS）の設立、外務省欧亜局文化事業部への国際文化事業第二課・三課の設置により、国家主導の対外文化交流事業の基盤が作られ」（66 頁）、また、「講座を担当する日本人日本語講師に対して助成金が講師手当として支払われた」（69 頁）こと、「第 2 節 日本人講師の着任状況」（70～87 頁）では、ドイツ、イタリア、ハンガリー、フィンランド、ブルガリアにおける講師の着任状況、「第 3 節 講師をめぐる」（88～100 頁）では、渡欧の目的と活動、複数機関で教えるために生じた煩雑な移動、講師の人事権に関してベルリンの日本大使館が関与した状況、「第 4 節 講師謝金」（100～112 頁）では、講師謝金の有無と出所、費目、「第 5 節 教育の実態：授業と受講生」（112～132 頁）では、講座の概略として「日本人講師の担当科目と週当たりの授業時間数」（113 頁）、並びに使用教科書、講座の内容として「教授者の活動報告や回想録」（118 頁）も踏まえ、受講生数と職業が概観され、研究手段として学ぶ学習者の動機は、「1. 専門領域で日本の研究が紹介されているため 2. 中国研究の文献を読む手段として」（126 頁）の 2 点に、趣味として学ぶ学習者の動機は、「1. 時間的余裕のある富裕層 2. 女子学生や医学部の学生（戦時下） 3. すでに複数の非印欧語をこなすポリグロット」（126 頁）の 3 グループに集約されるとしている。なお、学習動機に影響を及ぼしたと思われる対日観についてまとめると、「1. 日露戦争における「小国」日本の勝利によって、帝政ロシア下にあった北・東欧地域の人々

の間に形成された対日観 2. シベリア流刑囚、第一次世界大戦時の捕虜として日本人と接したときの直接体験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対日観 3. 同盟機運の中で醸成された対日観」(131 頁)の3点となるという。

「第3章 日本人講師の事例」(133~168 頁)では、「1930年代以降教壇に立った延べ35名にのぼる講師の中」(133 頁)で、「第1節 日本語教授経験を有して渡欧した講師：村田豊文」(133~146 頁)、「第2節 語学教育に徹した講師：岩倉具実」(146~154 頁)、「第3節 注目された講師：桑木務」(155~168 頁)の3名を取り上げ、「教授活動に関する記録や学習者の証言記録をもとに、当時の日本人講師の実像に迫る」(133 頁)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る。

「第4章 日本語講座の諸相」(169~278 頁)では、「第1節 対欧文化事業と日本人講師」(171~192 頁)において、「日本語講師たちは、欧州学問事情に通じた文化事業の実践者であり、当時の日本文化事業に対する明確な視点を持ち、KBS 関係者を逆に啓蒙する立場にあった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192 頁)こと、「第2節 講座の目的」(192~214 頁)は日欧間の情報不均衡是正、国際世論調整、枢軸機運高揚の3点に集約されること(214 頁)、「第3節 対外広報宣伝活動としての文化事業」(214~232 頁)において、「近代の西欧を経験した知識人たちが、西洋文化への反発から自己の固有文化への回帰、精神文化の回復を求めていく中で、国際社会における対等性獲得という使命が共有され、国際派知識人の中から、国内外で必要性を説いて回る者、交渉力とともに資金を有した実践者が現れたことにより、新たな日本研究制度が確立にいたった」(231 頁)こと、「第4節 日本語講座開設に対するドイツ側の認識」(232~254 頁)において、「日本から政治的に利用されることや、日本側によって押し切られた形で講座を拡張することには難色を示しながらも、現在の担当者らの地位を安定的なものに近づけること」(253 頁)は認めていた事実、「第5節 総括」(254~278 頁)では、「1. 事業としての性格と評価」で「対欧文化事業としての日本語・日本学講座支援事業」(257 頁)と「文化広報活動」(255 頁)の限界、「2. 講師の活動と評価」で「当時の日本語講師たちは、実践力養成を目的とする今日的な語学教師の条件ではなく、むしろ当時の文化宣揚者として模範的な条件をそなえていた」(262 頁)こと、「3. 他地域との相違」では、「ドイツを中心とした枢軸国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特徴」(266 頁)に「広報宣伝・同盟気分高揚」(270 頁)が見られたこと、「4. 現代の言語教育思想：安全保障としての言語教育」では「日本が「文化による世界平和への貢献」を継続していくためには、それを支える日本語教育の優れた供給体制を構築し維持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278 頁)としている。

結章では、「当時の実態分析は、今日の課題把握のためにも、今後、各地域、各分野の共同のもと各視点から推進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たい」(279 頁)とするが、本書が広範な未刊行資料を日欧双方から入手し、分析した結果として生まれたことは極めて高く評価されるべきであろう。

なお、著者・小川誉子美氏には、本研究により慶應義塾大学から博士(政策・メディア)の

学位が授与されたが、欧州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史が氏によって益々切り開かれていくことを念願してやまない。

何志明著『從日語看日本文化』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發刊) 定價香港ドル 80 ISBN978-962-996-450-4)

高橋李玉香(Rita Takahashi)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高級講師

Community College of City University, Senior Lecturer

讀閱此書，心中放下心頭大石。原因簡單，終於有一本徹頭徹尾以通識教育的觀點來剖析日本社會文化及語言的「入門書」，可說是對“日本”有興趣的學生及讀者來說，這書的面世確是一大喜訊。這書的內容由淺入深，內容豐富，全書共九章，二百零六頁。何志明博士以平易近人的筆法，加上適量的文獻考證，使其立論說明更具說服力，對日本這個不可思議，不易理解的國家，有著濃厚興趣的人士來說，閱畢此書後，該能獲益良多吧！

何博士從首章如何認識日本，以日語內容為起點，漸把讀者帶進日語文字、歷史與構造的世界。接下的內容有分析日語中的禮貌表現和意識形態。其後進一步向讀者介紹日本人如何提出一己要求及婉轉拒絕他人美意之表現等。何博士並在第六章詳述日語表現上經常出現的道歉文化及責任承擔問題。在此章內容內，何博士花了共 37 頁之多，詳細闡述日本人的道歉策略及上司勇於承擔下屬錯誤的日式管理階層意識形態及深層意義。著者引用不少曾在日本發生的列車意外個案例子，以輔助說明日本大企業管理層的責任承擔的方法和決策。透過此種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例子來剖析日本人的道歉模式及意義，使讀者容易產生共鳴。著者更在此章的第六節內比較香港和日本管理層的道歉及承擔責任方法的異同。立論中旨公正，見解精闢。從港日兩者之間的差異可看出文化社會背景異同，確實導致國際企業之間對意外事件有不同的承擔責任方法及理念。

何博士在第七章客觀介紹及分析傳統文化人類學者對「日本人論」的看法及批判。例如他列出了著名學者別府春海對集團模式存在的 13 個具體問題。(書內 131 頁-137 頁)他指出傳統「日本人論」及其精神已面臨當今日本社會的挑戰。他指出日本人已經開始步入個人主義的年代，為集團奉獻自己力量的年青人漸漸減少。90 年代末，日本自泡沫經濟爆破後，日本傳統的價值觀念受到無形挑戰。日本已進入了利己的時代。著者強調如讀者希望深切了解和觀察日本，該以客觀角度來分析日本人的言語和行為，這樣才能真正了解「日本人」的深層思想和行為模式。其餘的篇章重點放在日語表達形式較多，例如第 8 章的日語「曖昧」的表達方式和第 9 章的「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日語」。這兩章的內容和說明，簡潔地綜合了外國學習日語人士的疑問。對學習日語時間不太長的學習者而言，這兩篇章的內容可讀性非常高。

綜觀何志明博士在他的「從日語看日本文化」一書內，充分表達了著者對通識教育的理解和想法。他以由淺入深，立論鮮明的方法來介紹日本文化和社會的基本特徵，可說是此書的一大特色。

我誠意向各位對日本語、日本文化及日本社會有興趣的讀者推薦此書。閱畢此本資料詳盡，見解精闢一書後，定必獲益良多。

「アジア日本研究」第 1 号

日本語・中国語論文執筆基準

1. 題名:
日本語論文の場合は日本語および英語、中国語論文の場合は中国語および英語の両言語による題名を記す。
2. 執筆者の氏名:
 - 漢字圏の執筆者の場合は、漢字およびアルファベット、または漢字およびカタカナで表記。
 - 漢字圏以外の執筆者の場合は、アルファベットおよびカタカナまたはアルファベットだけで表記。
3. 執筆者の所属機関・役職名:
日本語(漢字、カタカナ、ひらがな)および英語、または中国語および英語で記述。
(例) 香港大学日本研究学科准教授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Associate Professor
4. 要旨:
日本語論文の場合は 300 語の英語要旨を、中国語論文の場合は 800 字の日本語要旨をつける。
5. 用字・用語の統一
 - ローマ字の表記はヘボン式とする。
 - 重要語などを示す場合、ゴシック体とするか、アンダーラインを引く。英語綴りの場合は、イタリック体とする。
6. 章節
章節記号は以下の例に従う。
章 1, 2, 3,
節 1.1, 1.2, 1.3
小節 1.1.1, 1.1.2, 1.1.3

または

第一章
第一節
一
(一)
7. 脚注
 - 脚注は文末脚注を用いる。
 - 文末脚注番号は、本文の該当個所に肩付き数字で、句読点の前に^{1 2 3}といれる。
8. 図表、写真
 - 図表は原則として電子ファイルを電子メールに添付して提出する。
 - 図表、写真には、それぞれの通し番号を付し、表題をつける。
 - 本文中に挿入する場合は、本文中に適当なスペースをとり、図表、写真の番号を付す。
 - 図表、写真を、他の出版物から転載する場合は、事前に当該図書の出版社から転載許可を受け、その図表、写真の下に、当該図書の著者／出版年／書名／出版社名を記入する。

9. 参考文献の記述方式

- 原則として参考文献目録をつける
- 参考文献目録は記述されている言語によって分類し、日本語論文の場合は、まず日本語の参考文献を著者名あるいは編者名の 50 音順によって並べる。次に日本語以外の文献を列記する。並べる順番は、英語の文献の場合はアルファベット順、中国語、韓国語の文献の場合は執筆者の判断にしたがって順番を定める。中国語論文の場合は、まず中国語の参考文献を執筆者の判断にしたがって並べ、次に中国語以外の文献を列記する。並べる順番は、日本語の場合は著者名あるいは編者名の 50 音順、英語の場合はアルファベット順、韓国語の文献の場合は執筆者の判断にしたがって順番を定める。
- 日本語文献の場合は、原則として次の記載方式による。
 - 1) 著者名
 - 2) (刊行・発表年)
 - 3) 「論文名」
 - 4) 『著書名または雑誌名』
 - 5) 発行機関
 - 6) 頁(例)

朴裕河(2006)『和解のために』、平凡社

田嶋陽子(1992)「駒子の視点から読む『雪国』」、江種満子・漆田和代編集『女が読む日本近代文学—フェミニズム批評の試み—』、新曜社

李美静(2006)「在日台湾人子どもの読解力の測定—中国語母語話者と日本語母語話者の読解力を比較分析する—」、『日本語教育論集 世界の日本語教育』第 16 号、国際交流基金、19—33
- 英語文献の場合は、原則として次の記載方式による。
 - 1) 著者名
 - 2) (刊行・発表年)
 - 3) “論文名”
 - 4) 著書名または雑誌名
 - 5) 発行地及び発行機関(雑誌の場合は不要)
 - 6) 頁。なお、4)については、イタリック体で書く。(例)

Lie, John (2001) *Multiethnic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pier, Susan (2007) “Meet me on the other side: Strategies of Otherness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Rachael Hutchinson and Mark Williams (eds.) *Representing the Other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 Critical Approach*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38–53)

MacLachlan, Patricia L. (2004) “Post Office Politics in Modern Japan: The Postmasters, Iron Triangles, and the Limits of Reform,”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0:2, 281–313
- 中国語文献の場合は、原則として以下の記載方式による。
 - 1) 著者名
 - 2) (刊行・発表年)
 - 3) “論文名”
 - 4) 《著書名または雑誌名》
 - 5) 発行機関
 - 6) 頁(例)

程希(2002)《当代中国留学生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張力(2008)“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教育成就和未来展望”《中国发展观察》第 10 期。
- ウェブページを参考文献として掲載する場合には、URL を記し(アンダーラインを引くか<>で囲む)、参照した日付を記載する。
(例)

香港・マカオ・広東日本研究大学聯合 <<http://ualliance-hmg.org/>> 2010 年 5 月 1 日参照

10. ワードプロソフトは原則として Microsoft Word を用いる。

Asi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English Submissions and Style Guide

The *Asi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AJJS) invites original English manuscripts from scholars of Japan regardless of membership status in the University Alliance for Japanese Studie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Guang Dong Province (UAJS). Once the manuscript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however, the author must apply for membership or sub-membership in the UAJS. All English manuscripts submitted for consideration must be original. We will not accept previously published material, or materials designat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Manuscripts should be within 6000 words, or 15 A4-size pages at 400 words per page with double spacing, inclusive of footnotes and reference lists. In addition, English manuscripts must be preceded by an abstract in Japanese consisting of 800 characters.

Submissions are by email and should be attached as Word files (in a Windows XP or later version). Authors may use other electronic formats if these are compatible. Please attach a PDF file of the manuscript in addition to the Word file if you are using non-traditional font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 blind review process, we require all authors to take care in eliminating any personal references from the document. Title pages with author details should be in a file separate from the manuscript and labeled clearly as “Author Title Page.” Manuscripts should not show the author’s name in text or file headings. Where authors must refer to their own publications, the author’s name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author” in both citation form and reference list to ensure anonymity.

Illustrations, graphs, and tables should be separate from the text, and attached to email as electronic files (TIFF, JPEG, etc) with resolutions of 300dpi or greater. Captions should be included with all such attachments. Where necessary we will communicate individually with authors on desired placement of inserts in the manuscript. Please note that in case of publication we require authors to verify that they have permission to use any attached imag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ormatting and writing style expected for manuscripts, refer to the AJJS Style Guide.

Submissions can be made to the Editors of AJJS at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AJJS Style Guide

English manuscripts for the *Asi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AJJS) should be prepared carefully

prior to submission so as to minimize written errors and comply as closely as possible with AJJS formatting and stylistic guidelines. Double spacing,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 font, and 1-inch margins throughout will be appreciated.

In general, manuscripts will be expected to follow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5th edition (2003) except where otherwise specified in this guide.

English spellings will follow American English conventions (consult Webster's Dictionary) and other languages will be rendered in Roman script with italics. Specifically, Japanese words will follow Hepburn Romanization (for example, long vowels or vowel combinations other than "ii" should be written with macrons, "o" should be used for the particle rather than "wo" and "e" instead of "he"). Japanese names 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order of Japanese usage, with surname preceding given name, except where an author has established a popular alternative order.

Numbers in text should be written out between one and ten unless appearing as part of a series (the first of 3 reasons) in the same sent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or in graph/table form. Ages (15 years old; a 15-year-old girl) and currencies (24USD; US\$24) are further exceptions to this general rule.

In text citations should make use of parentheses to follow author surnames with year of publication and relevant page number: Fuller (2009: 74) argues.... Reference lists can be formatted with full author names as follows:

Lie, John (2001) *Multiethnic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pier, Susan (2007) "Meet me on the other side: Strategies of Otherness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Rachael Hutchinson and Mark Williams (eds.) *Representing the Other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 Critical Approach*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38-53)
MacLachlan, Patricia L. (2004) "Post Office Politics in Modern Japan: The Postmasters, Iron Triangles, and the Limits of Reform,"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30:2, 281-313

Websites should be referenced along with their date of access.

Double quotation marks "..." should be standard and always enclose periods and commas. Only use single quotation marks to cite within double quotation marks. If quotations run past 4 lines of manuscript text they should be set as indented block extracts, without enclosing quotation marks, and with final citations in parentheses following the final period in the block.

Foot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These should be marked with superscript numbers always following the nearest period.

編集後記

香港・マカオ・広東日本研究大学聯合が立ち上がってから一年あまりで創刊に漕ぎ着けたことは大変喜ばしく、まずは論文著者の皆様と匿名にもかかわらず投稿論文を精査してくださった査読者の諸先生方に御礼を申し上げたく存じます。

また、大学聯合の立ち上げ以降、日中間には続けざまに様々な問題が浮上し、環境が最良だったとは言いがたい中で教授活動と平行して編集にあたった事務局と編集委員の労苦にも感謝いたします。

本論文誌は、海外で長期刊行されている日本研究の論文誌が少ない現状を鑑み、日本国外からの客観的な視点を日本研究に提供したいとの熱意の元で編集いたしました。今後は香港・マカオ・広東地域における日本研究者の発表の場として充実させるだけでなく、日本研究の新たな潮流を生み出す力を持つような研究を多数世に送り出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日本は未曾有の震災に見舞われ復興の途上にありますが、私共大学聯合会員一同は各種の研究及び教授活動を通じて日本の復興に微力ながら貢献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第二号の刊行に向けて編集委員一同努力を続けて生きますので、益々の応援のほどを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学術誌編集委員会)

アジア日本研究

第 1 号

発行年月日 2011 年 6 月 21 日

発行者 香港・マカオ・広東日本研究大学聯合
The University Alliance for Japanese Studie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Guang Dong Province

住所 Flat C, 5/F., Block 6, Sceneway Garden, No.8 Sceneway Road,
Lam Tin, Kowloon, Hong Kong.

(事務連絡先) TEL : 852-26096479 (兒島慶治)

著作者 香港・マカオ・広東日本研究大学聯合
The University Alliance for Japanese Studie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Guang Dong Province

ISSN 2223-5841

Asia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No. 1

[RESEARCH PAPERS]

The Shirakaba School and Japanese Naturalism:

Focusing on Shiga Naoya and the I-novel XIE Chongning 1

Motivation of Advanced Japanese Life-Long Learners in Hong Kong:

An Investigation of Motivation through the Background History of
Learners' Language Learning SEO Masaki 11

Rethinking the Meaning of Loyal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ūshingura 1/47* and *Red Cliff* YAU Shuk-ting, Kinnia 26

An Examination of Murou Saisei's Efforts to overcome his Inferiority

Complex through a study of his Fairy Stories LIU Jinju 42

[RESEARCH NOTES]

A Case Study on the Usage of Cantonese and English by a Macanese

Student of Japanese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Composition in Japanese ISHIGE Junko 55

Reconsideration of Gender Issues in Japanese Visual Teaching Materials HATAZAWA Keiko

AOYAMA Reijiro 64

[PRACTICAL/ SURVEY ARTICLES]

A Report on Japanese-Language Education

HAN Bing

a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s Universities JIANG Chun-hua 73

An Observation of Peer Learning in Hong Kong:

MITO Atsuko

Cases in a University Class and a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 SEO Masaki 83

[BOOK REVIEWS]

小川 誉子 著『欧州における戦前の日本語講座——実態と背景——』 TOKUNAGA Mitsuhiro 93

何志明 著『從日語看日本文化』

TAKAHASHI Rita 97

Manuscript Contribution Rule 98

Editor's Note 102

June 21, 2011

The University Alliance for Japanese Studies in Hong Kong, Macau and Guang Dong Province